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国档案 - 高层决策写真



前言

《中国档案》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的调查，将红色归档，为黑色立案。

这部作品以国计民生为主导，揭示了一个不光关系到四省 1.5 亿人生死存亡，还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的大问题。这是一场生与死、清与浊、善与恶、红与黑的反复较量，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善恶如水，清浊立判。

1997 中国在行动，2000 世界大瞩目--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曾说过错话，郭沫若也说过错话。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早有预见，邓小平英魂难安。在这个问题上，江泽民痛心疾首，李鹏果断决策。朱镕基执政伊始，便将其定为本届政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在这个问题上，万里一言惊人，宋健九次走出中南海。曲格平为此鞠躬尽瘁，解振华因之殚精竭虑。中央电视台频频曝光，新闻三十分零点出击，各大传媒争相报道。这是当前中国和国际社会最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也是一个全国人民和全人类都在拭目以待的一个世纪末的最大焦点。

这部作品不光忠实地揭示了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一些鲜为人知的丰功伟绩与真知灼见，还以忠实、生动、富有哲理性的笔触极具震撼力地记录了在浊水臭浆之中苦苦呻吟和挣扎着的不幸的人们，无情地揭露和鞭挞了那些图财害命的人，歌颂了与之斗争的一群治污者和一群为民请命的记者们，以良知和深情，喊出了人民和时代的心声--人民祈盼“清”官，中国拒绝“污”吏！

这部作品是当代最火爆的著名作家哲夫继发行逾百万册的长篇系列小说《天猎》、《地猎》、《黑雪》、《毒吻》和最近出版的《哲夫文集》十卷本之后，重整旗鼓，再探新高，潜心推出的又一部力作，作品的纪实性与文学性并重，亲身感受，口述实录，资料翔实，可读性强。写人状物，生动形象，跃然纸上。更为可贵的是行文诡谲多变，铺张扬厉，文采斐然。忧国忧民，夹叙夹议，微言大义，富有极强的思辨色彩，文中有些段落如同格言，可圈可点。

一、历史新闻

毛泽东说过什么

曾经和潘朵拉一样很善于制造灾难的黄河，
如今已经大难临头，原本与潘朵拉共谋，无异于
与虎谋皮，所以黄河最终还是喝了潘朵拉这个女
魔的洗脚水，被这个邪恶的妇人吮吸得血脉枯
干，被这妇人折磨得奄奄一息，已经是一匹徒有
虚名的野马，或曰黔驴。

毛泽东对绿化的重视由来已久。

毛泽东生前也在追踪潘朵拉，他老人家的追踪，是从一座倒金字塔开始的。

从理论上讲，这样一座倒金字塔是无法矗立的，可事实上，这座倒金字塔从过去一直矗立到现在，并将不断发展壮大它的塔身，就这样一直矗立到永远。

按照人类正常的思维习惯，找一个塔尖并不难，难的是造一整座金字塔，然后把这个塔尖放到合适它的位置上去。可历史偏偏要为难人类，常常是先有了一个塔尖在那里倒立着，然后才去构筑它的塔身，让这座塔看起来有些奇怪。

可历史就是这样的，正如人类的过去是一个婴儿，历史的过去也是个婴儿，是需要不断长大，先前是小的，后来才长大一样；所不同的是人类的婴儿是用双脚走路的，而历史的婴儿是用头颅走路的，从这一点上讲历史也是一座倒金字塔。

当我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领袖的几卷宏文中，试图摘取一段有关环境保护的权威性论述，以显示自己的博学多才时，竟然从中一无所获两手书咄咄。

毛泽东生前对于绿化十分的重视，因为老人深知，只有美丽的绿色才可以有效的遏止潘朵拉的甚嚣尘上。所以老人家对绿化的重视由来已久，如“绿化祖国”，“实行大地园林化”，“要使我们祖国的河山全部绿化起来，要达到园林化，到处都很美丽，自然面貌要改变过来”。“真正的绿化，要在飞机上看见一片绿，种下去还未活，就叫绿化？活了一片绿，也不能叫绿化，要粮食到手，树木到眼，才能算数”。等等。这些都证明了老人家是在有意无意的追踪潘朵拉，抑止潘朵拉。

潘朵拉最喜欢让水土流失，进行各种捣乱，为了防止这种局面的发生，老人家在水土保持方面，也投以关注，说“必须注意水土保持工作，决不可以因为开荒造成下游地区的水灾”。“为什么一、二、四乡有水旱灾，第三乡没有水旱灾呢？因为一、二、四乡是段田，那一带的山都是走沙山，没有树木，山中的沙子被水冲入河中，河高于田，一年高过一年，河堤一决便成水患，久不下雨又成旱灾。第三乡多是山田，田高于河，虽田亩很小，却雨不怕水，晴不怕旱”。等等。

毛泽东给淮河的题词是：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毛泽东对黄河说的话最多，因为喜欢播种灾难的黄河是潘朵拉这个邪恶女人的共谋，所以老人家对此最为关注，1952年10月31日视察黄河时和河南省的负责同志说：你们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1953年在南巡路经郑州途中与黄河水利委员会王化云等人的谈话中说，历代王朝都治理黄河，但都没有治好，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把黄河治理好。又说黄河是养育中华民族的摇篮，又是连年征战、乱砍乱伐造成的一条害河。俗话说，黄河九曲十八弯，富了前后套，害了山东和河南。它一出三门峡，就像一匹收不住缰绳的野马，放纵奔腾，搞不清会在那里闯乱子，使多少万人民的生命财产毁于一旦，现在到了我们手里，一定要驯服它。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能让它出乱子，不然，我睡不着觉。

曾经和潘朵拉一样很善于制造灾难的黄河，如今已经大难临头，原本与潘朵拉共谋，无异于与虎谋皮，所以黄河最终还是喝了潘朵拉这个女魔的

洗脚水，被这个邪恶的妇人吮吸得血脉枯干，被这妇人折磨得奄奄一息，已经是一匹徒有虚名的野马，或曰黔驴，已经远没有了过去那种拂扬着金色鬃毛，狂蹄万钧，挟雷走电，一泻千里，势不可阻。相反的倒是上游截流，下游断流，黔驴技穷，马瘦毛长，虎落平阳，苟延残喘，潜伏爪牙，百般忍受，一年断流已经超过 240 多天。

过去老人家因为黄河水太多，放纵奔腾，易闹水患而睡不着觉，现在恐怕得为丰腴的黄河日渐枯瘦，日渐羸弱，污染越来越重，水越来越少，而睡不着觉了。

毛泽东也说过错话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也说过错话，郭沫若也说过错话，有一次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面对着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充满无限自豪和憧憬地指点江山，安排着北京市的未来，对当时的北京市市长，以命令式的口气要求说——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

毛泽东对综合利用的说法似乎不是很多，只有片言只语，1972 年 6 月 12 日在《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关于官厅水库污染情况和解决意见的报告》上说：综合利用很重要，要注意。1970 年 5 月 29 日又指示——综合利用，大有文章可做。

在那个“一句顶一万句”的毛泽东时代，老人家竟然也有这么多对绿化、水土保持、综合利用方面的论述，这都可以算作是间接的对环境生态的一种关注，是对自然灾害的关注，也可称之对潘朵拉的追踪，可谓难能可贵。

那时对环境保护的概念，似乎还模糊不清，对综合利用的那两句最高指示，也似嫌太过直白了一些，还说过其它什么鲜为人知的话吗？

在那样一个历史时期，在那样一个还不曾完全打开潘朵拉盒子的昨天，对彻底的、高速的打开工业发展这只魔盒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我们大多数人们都头昏脑胀的认识不清，估计不足，不知道后果的严重性，他老人家又能知道多少呢？

新中国成立之初，意气洋洋的毛泽东，心系天下苍生，气贯万里长虹，雄心勃勃，准备大展宏图。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这位引导革命从旧中国走到新中国的伟大领导人、出色的政治家、浪漫主义诗人、出生于湖南韶山冲的农民的儿子，对未来新中国的工业憧憬，充满农民式的朴素感情和诗人式的革命浪漫主义。所以在建国初期，有一次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面对着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充满无限自豪和憧憬地指点江山，安排着北京市的未来，对当时的北京市市长，以命令式的口气要求说——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

如果真如老人家的意愿，那么今天的北京城，就相当的恐怖了。

北京虽然侥幸逃脱了处处都是大烟囱的恐怖的命运，可是中国却没有逃脱大跃进的厄运，相信人定胜天的老人家，使自然生态环境在大跃进中遭到了空前的破坏和浩劫，砍掉森林大炼钢铁，填海造平原，围湖要良田，开拓处女地，一句“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使中国的人口一下翻了几番……

时至今日，如果我们的老人家确切地知道工业污染给环境和民生带来的可怕危害，一定会瞠目结舌，嘿然无言，痛定思痛，抚膺自愤，一定会批评和自我批评。

但这似乎也无法抱怨老人家当时不够远见卓识，在当时的情况下，整个时代都在呼唤中国工业经济的大幅度的增长，为了尽快的富国强兵，巍然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急功近利出了多少个鞍钢，多少个大庆，多少个匆促上马的工厂。

记得当时有这样一些图画，说资本主义经济如何如何萧条，就画一些林立的不冒烟的大烟囱，鸟在烟囱里做窝育雏；说社会主义经济如何如何繁荣，就画许多高楼大厦，画许多林林总总的冒着五颜六色浓烟的大烟囱。

不是连中国多才多艺的文学巨子郭沫若先生，也曾被潘朵拉的盒子外在的美丽而迷惑，在早期一首诗歌中，充满了激情的歌吟过轮船上那些大烟囱中冒出的滚滚浓烟，溢美至极的称之为：啊，巨大的烟囱中，盛开着 20 世纪文明的黑牡丹。

似乎那个时代的人对现时的认识都只能命定地停留在那个时代，不论是伟人还是超级的大知识分子，概莫能免。老人家如此认识，郭老先生如此认识，也就一点不让人觉得奇怪了。假定我们的老人家和我们的郭老先生目前健在，目睹现实的一切，相信具有智慧和良知的他们，一定会痛改前思，再发宏议。

当然，这已经不再可能，只好姑且存疑。

毛泽东一句鲜为人知的话

似乎应该这样来塑造这个塔尖，似乎也应该

这样来描述这句话的出处——在很久很久以前，

老人家就说过：这和打麻将一样，上家的废物，就是下家的原料！

最近，与曲格平教授交谈中，曲格平教授明白无误地告诉笔者一句话，这一句话十分形象生动，如同一个金光闪闪的金字塔的塔尖，光照环宇。

不论历史翻过了多少页，时至今日，我仍然不得不信服毛泽东出类拔革的具有非凡智慧和超人洞察力的大脑，这样的大脑从古迄今，正如一座金字塔只能有一个塔尖一样，或者还会有另一个领域中的金字塔，但在这个既定的领域中似乎只能有这样一个塔尖，这似乎也是谁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

似乎应该这样来塑造这个塔尖，似乎也应该这样来描述这句话的出处——在很久很久以前，老人家就说过：这和打麻将一样，上家的废物，就是下家的原料！

老人家作古已经多年，我不会靠说一些颂扬死人的话来从中博取什么好处，我只是十分惊讶地发现，这句话是如此地浅显易懂，又是如此地深刻精辟。

首先是老人家所用的比喻，在打麻将成风的泱泱十二亿人口的中国，简直可以说是妇孺皆知，老幼均悉，连文盲傻汉听了也会明白无误，可谓无人不晓。

更重要的是，老人家所生动预见的和当今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现在正在做的，竟是惊人的相似。目前发达国家都在围着环保问题“打麻将”，他们现在从事研究治理污染的最主要最先进也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便是努力把上家排泄出来的废物，一点不剩地都提取出来，以便做下家的原料，你打一个“三饼”，我就吃一个“三饼”，你出一个“红中”，我就碰一个“红中”，绝不会任其自流，弄得满世界满桌子都是“条条饼饼”。

这是一只古老而崭新的已经被人们彻底打开的潘朵拉的盒子，从盒子里释放出来的东西阴差阳错，张冠李戴，狗尾续貂，胡乱搭配，不成其为模样。

正像时下有人所说的那样：什么是污染？污染就是物质的错位，也就是说错把盐面和碱面放进水里，误将“白板”碰了“红中”。重金属不待在自己的容器里，逃逸到了天空和河流之中；煤本来该待在地下或是煤场，可不幸在火中化成了烟，走到天空去和白云结伴。蛋白质流离失所，水土背井离乡，森林走进了城市，走兽误入了海底，鱼虾爬到了岸上，东西全都放错了地方，自然就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了。

这个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只要有资源存在，依附资源而繁荣经济而昌盛社会的人类生命似乎是可以无限延续的。遗憾的是地球上的资源在人类的功用下，以可怕的速率在天天每每的浪费和消耗，却不会再生也无以补充。有限物质要派无限的用途，便必须尽可能地做到物尽所用。只因为物质错位，只因为东西完全放错了地方，就将其一古脑地倒掉，既污染了环境又浪费了资源，岂不可惜？

奇怪的倒是那些故意打开潘朵拉盒子的人，那些明知故犯的现在时的地方长官和企业家们，他们为了自己升官发财，为了利润和效益，打开排污闸，打开潘朵拉的盒子，不加任何处理地释放出污水、废气、废渣等等一些可怕的污染物，给自然生态环境和人类的生命健康都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和损害。

他们一方面是污染者，一方面是被污染者，他们一边在抱怨上游污染了他们自己下游的河流，一边又努力掩饰他们自己对更下游河流的严重污染；似乎别人污染他们所在的河段是万万不对的，而他们污染别人所在河流却是理所当然的。

这是一只黑色魔幻主义、现代功利主义以及实用主义相结合的新式的潘朵拉的盒子，在那只盒子的上边，端坐着一个满头金发的神情邪恶的女人，是她制造了这样一个可怕的盒子，可是打开这只盒子的却不是她，而是人类的自私自利。

大而化之的自私自利便是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老人家早就给本位主义下了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可谓一针见血：没有全局观念，拉山头，搞宗派，老子天下第一。

老人家的过人聪明便体现在擅长省略过程，统带全局，直奔主题，百万军中取上将之头如探囊取物，直追定义，所以老人家才会有那样一句鲜为人知的话流传至今，在那个时候似乎也只有或是只能有这么多对环境的认识了。

似乎这句惟一的话，说的还是有关综合利用的，虽然只有一粒思想的子弹，老人家却命中靶心，打了十个环，因为根治污染源的最好办法，便是综合利用了。

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自然资源本来就很有限，上家打出去的“八条”，每每是下家码牌的必需原料，只因丢在牌桌上，便不肯捡起来吃掉，只寄希望于摸牌，一而再，再而三，四个“八条”全被上家打光了，你还有什么和牌的希望呢？

所以老人家才谆谆告诫人们说，要想多有赢牌的机会，就得吃上家的废牌！

中国环保的希望乃至根治世界性的环境污染和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最好办法，似乎便是变废为宝，综合利用，吃上家的废牌了。

于是，我们荣幸地有了一个金光闪闪的塔尖。

二、时代呼唤崇高

周恩来总理有何高见

有人为了杀上梁山当好汉，不惜以牺牲环境
为代价挣下买路钱，一边昧着良心污染着环境，
一边心虚的安慰自己说：是他自己要被仁义道德
招安的，他那种高尚不要也罢，连个儿孙也没有
留下！

周恩来——在这个拒绝崇高趋向平凡的年代里，我们不得不怀着一丝幸灾乐祸的羞愧，来面对这样一个高尚的名字。

重提这个名字会使每一个日益世俗日益功利的我们稍稍感到一点不安和欣慰，不安的是这个名字太高尚，他每每使我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的卑微而感到羞愧；欣慰的是我们现在，似乎用不着像他那样认认真真地去做每一件事，坦坦荡荡地面对每一个周围的人，无私无垢地走完每一条人生的路。

事实似乎证明，那样的高尚做起来一定相当的累人，以至累他一生，累他一生操劳连身后事都没有儿孙辈出面料理，这样活一辈子，也不知他图了个什么？

那种玉洁冰清的操守，那种无私无垢的德行，那种至善至美的人格，那种无私奉献的高尚精神，让今天的我们一方面觉得汗颜不已，一方面又觉得匪夷所思。

那种操守、德行、人格，不光让时下的年轻一代觉得难以理解，甚至连我们这些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年已不惑的人，也因自惭形秽而戴上有色世俗的遮阳眼镜，望着天上那一轮光明，无端的怀疑起那光明的真实性与可信性来。

太阳朗照在天空中，并没有须臾的离去。

有人望着太阳，一面偷来大把的阳光温暖着自己，一面厚颜无耻地指着流出的汗水说：伯夷本来是无罪的，可他怀揣着玉壁，那玉壁使他有罪，你就是那个怀璧的人。因为你光明得让我们不安，因了你的光明而显出我们的幽暗，让原本平凡的我们显得更加平凡。这样一来你让我们心里很是为自已难过，而事实上你也是一个平凡的人，要想扯平这一点，只有把你从神坛上拉下来了！

于是，便有人把太阳从天空摘下来，像一只梨子一样切开，让人们看表皮上的那些小小的疤痕，猜想是怎么长出来的？榨出白色的清淡如水的汁，苛刻地品味内在的优劣，找出藏在里边的几粒黑红的核，看还有没有萌发的可能。

他却远离人们，冷静地站在天空上，注视着现实的一切，回忆着自己。

周恩来说：要把你们逼上梁山

如果你们污染了空气，惟你们是问。你们年轻人要学习，要抓这项工作。现在给你们加一条，要搞综合利用；不仅要搞轻工业。还要搞冶金、化工。要把你们逼上梁山。

早在 1969 年，周恩来就不止一次地提到“公害”问题。

1970 年 6 月 26 日接见卫生部军管会负责同志时，周恩来总理就说：卫生系统要关心人民健康，特别是对污水、污气，这两种容易污染。美苏讹诈是吓人的。原子核武器试验都污染不了多少。平常情况下污水、污气要严重得多。前几天接见几个日本留学生（《苏联是社会主义吗？》一书的作者），他们说，日本不但陆上污水多，海边的污水也多，不少地方的鱼都死了。美国有的内河完全污染了。

周恩来总理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想了想又补充说：主席讲预防为主，要包括空气和水。要综合利用，把废气、废水都回收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不搞，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要搞。如果污水、污气都解决了，人民的身体健康了，就什么财富都可以创造。这是多大的财富！从卫生的观点看，必须解决。

最后周恩来总理这样表达自己的看法：我看最大的灾祸是污水、污气，其次才是车祸。听说美国的车祸死亡的人数超过了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死亡的人数。何必搞那么多小汽车？我看自行车多一点有好处，这是很大的健康。

在那样一个混乱的年代，总理一天要应付解决的重大事情成阵列队，盈千累万，却仍然没有疏于关注环保问题，那时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中国的许多领导人根本就不知道环保为何物。仅凭这一点，你就不得不佩服周恩来总理的卓越的智慧和超前的意识。

同年 8 月 7 日接见抓革命、促生产座谈会的代表时，总理在讲话中再次忧心忡忡地强调说：废液是个大问题，要搞回收，综合利用。不然，让废液流掉可惜。废气能玷污呼吸，废液能把鱼害死。发展大工业小工业，都要注意，变有害为有利。否则，很容易把水污染了。

总理觉得强调得还不够，就列举了别国的一些事例说，废水污染很严重，美国和加拿大搭界处的几个湖，完全成了死湖，鱼都死了。日本炼油，还有别的东西——它是资本主义的第二工业国了，污染也很厉害，原子弹的玷污是暂时的，工业上的污染则是天天有。

周恩来总理环视周遭人等，生怕这些年轻人文化水平低听不懂自己的话，恨不能手把手教他们，于是连命令带规劝道：综合利用就是变害为利。没有不可利用的东西。但是资本家怕投资多，利润少。我们社会主义就是要讲综合利用，废物利用。轻工业不能危害人民，要造福于人民。如果你们污染了空气，惟你们是问。你们年轻人要学习，要抓这项工作。现在给你们加一条，要搞综合利用；不仅要搞轻工业。还要搞冶金、化工。要把你们逼上梁山。

19 对年，周总理陪同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一世，参观北京石油化工总厂，在路上总理看到胜利化工厂烟囱里冒着黄烟，周恩来见了皱起浓眉，当即就说：你们要树雄心立壮志，一定要消灭掉！

到了北京石化总厂时，又说：我刚才看见的黄烟有毒，要想办法消灭掉！

在听到厂领导说要想办法烧掉某些有害的物质时，总理指示说：烧掉是下策，放空跑掉是下下策，应当把它综合利用起来！

当参观污水处理厂灌溉水稻时，总理再次指示说：你们一定要消灭黄烟，污水处理一定要达到人能喝。只给你们提这两条。

送走外宾后，总理指示说：综合利用是大问题，要立志超过世界水平！

1972年1月31日，周恩来又说：我们再不搞综合利用，后一代就要骂死我们，骂我们蠢才。

1972年，文革期间，周恩来力排众议，不受任何干扰和影响，力主沉浮的派团参加了1972年6月5日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人类环境会议。

周恩来总理说：要通过这次会议了解世界环境状况和各国环境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并以此作为镜子，认识中国的环境问题。

他又针对当时的左倾认识说：还是实事求是嘛，我们也有环境问题，不好回避。

西方环境不像你们讲的那么差，我们这里也没有这么好，污染到处都是，一些地区很严重。北京就有污水，冒黑烟，不能只把公害说成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顽症。

从1970年到1972年期间中国发生了几起严重的污染事件。

于是中国第一届环保会议在1973年召开，由周恩来主持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党、政、军、民、学的万人大会上，把环境保护推向了社会。

同时，成立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计委代管。

中国的环保事业就这样艰难地、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和领导下，像婴儿学步一样，蹒跚上路了。从那时算起，迄今已有30年了。

时代呼唤崇高

内心的焦虑已经烧烤得人们体无完肤，想要
不顾一切狂奔的念头使人们更多地想起了周恩来，对操守、德行、人格回归的呼唤，已如春雨，润物细无声了。我们试图学习他的伟大和平凡，唤归他的神圣和崇高。

如今，人们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污染和环境污染，面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持续性不断恶化，对周恩来高尚人格的向往和怀念便被统统激活，对已经觉得陌生的操守、德行和人格的话题便重新被捡起，呼唤崇高回归的声音像骨头梗在喉咙里，太多世俗的思考和对自身行为的思前虑后，使人们暂时还吐不出这块骨头。

面对曾经的周恩来总理的言行和德行，时至今日，我们的一些中国领导人和一些地方首脑，不得不为自己过去对某些问题的认识的肤浅和矫枉过正感到羞愧，不得被前总理的良好德行和高尚操守以及他非凡的人格力量和国际主义精神所深深撼动。使思想卑微行为有失检点的我们，菟丝草一样又在怯生生地试图走近他，缠绕他，仰望他，久久徘徊在他的周围，逗留不去。

但内心的焦虑已经烧烤得人们体无完肤，想要不顾一切狂奔的念头使人们更多地想起了周恩来，对操守、德行、人格回归的呼唤，已如春雨，润物细无声了。

我们试图学习他的伟大和平凡，唤归他的神圣和崇高。

周恩来早在70年代初，就提醒和告诫我们一些领导人和所有的人说：我们可不要做超级大国，不能不顾一切，要为后代着想。对我们来说公害是个新课题。工业化一搞起来，这个问题就大了。

不妨设想，假若我们的总理还活着，他会怎么说？怎么做呢？

然而，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也不能改变斯人已逝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

惟一真实的是周总理生前的社会实践和他身体力行的榜样的力量，已经在毛泽东倒立起的那座金字塔的塔尖上，添上了一段操行和德行皆备的人格的身。

这段塔身充分显示了作为一个中国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和对子孙后代生存环境的负责精神与持之以恒一往深情的关爱与呵护。

这是一段造福恒久功德无量的金字塔的不朽的塔身。

它将与中国和人类的未来同在。

最容易上瘾的毒品是金钱

当年总理想要逼那些“年轻人”上梁山，那些年轻人当年确实也被总理逼上了梁山，可他们上去就不肯下来，发现“梁山”上十分的美妙，为了长期能待在梁山上，他们沦为一伙打家劫舍为富不仁污染地方为害百姓的人。

我还记得在那个年代里，市、县、乡、镇，几乎都设有废品收购站，上到废铜烂铁牙膏皮，下到干骨头、碎玻璃、烂塑料什么无所不收。

一只牙膏皮可以卖二分钱，一斤废塑料一毛二分钱，一斤五分钱，废金属自然被送进工厂冶炼，其它的废料则变成了再生塑料，再生布，再生纸什么的。

那时，街上根本见不到什么废酒瓶烂报纸塑料袋，任何一可能卖钱的废物都被人们很自然地送进了废品收购站。

那些林林总总的废品收购站体现的就是当时中央领导人综合利用变废为宝的思想，也体现着中国人勤俭节约持家的好传统和好习惯。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那些废品收购站从城市悄然消失，代之的是一个一个垃圾点，和一些在垃圾堆上挑挑捡捡的人，只有他们才知道什么废物可以卖小钱，什么废物可以卖大钱，所以他们捡废物都是挑挑捡捡的，捡值钱的废物，不值钱的就不捡，不是为了变废为宝，而是为了挣钱。

至于拿废物到什么地方去换钱，绝大部分的城市人是不知道也不屑于知道的，似乎在市面上也追寻不到，城市人养成了大手大脚的习惯和乱丢废物的习惯，再也没有了破烂换钱变废为宝的意识，人们把许多可以再生的东西都毫不痛惜地随便丢弃掉，这一方面过量的消耗了物质，一方面又严重的污染了环境。

周恩来总理如果泉下有知，知道了现在人们的所做所为，知道了现在的天空和江、河、湖、海被污染成了什么样子，知道那些已经长大的“年轻人”成天都在做些什么想些什么，一定会愤怒难过得什么似的。

当年总理想要逼那些“年轻人”上梁山，那些年轻人当年确实也被总理逼上了梁山，可他们上去就不肯下来，发现“梁山”上十分的美妙，为了长期能待在梁山上，他们沦为一伙打家劫舍为富不仁污染地方为害百姓的人。总理如果活着，就一定会“惟你们是问”，把他们从“梁山”上揪下来，丢进臭浆废水里。

老的“年轻人”目前已经权高位尊，待在梁山不肯下来，新的年轻人觉得冲上梁山做好汉大难，就穿太空服跳霹雳舞，冲着老一辈的好汉们大扭

屁股。

从老一辈嘴里道听途说来的周恩来，使这些年轻人感到百思不得其解——在一点也不饿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吃掉了红卫兵扔掉的半个馒头，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位上，竟然还穿着打补丁的内衣，操劳主持了几十年的中国家政，却没有为自己多拿哪怕一瓶醋钱！

面对这样一位杰出的人物，那些腐化社会，毒害环境的人，那些为发财而置操守、德行、人格于不顾的人，那些拒绝崇高的渗透，无视良知的呼唤，还在我行我素其奈我何图财害命挣昧心钱的人们，有何颜面继续苟活于这个已经被人为的双重侵害折磨得体无完肤，远不如从前那么光风霁日山青水秀的大千世界上呢？！

有人一边拿着国家的钱、集体的钱，慷慨地腐化着自己、堕落着自己，毒化着社会的风气，一边撒着两片不屑的油嘴说：哼，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一辈子连瓶醋钱也没有捞着，瞧他高尚的，都高尚得有些假了！

有人为了杀上梁山当好汉，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挣下买路钱，一边昧着良心污染着环境，一边心虚的安慰自己说：是他自己要被仁义道德招安的，他那种高尚不要也罢，连个儿孙也没有留下！

如果以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两大污染问题，就教于富有良好操守和高尚德行乃至伟大人格的具有远见卓识的周恩来总理，他一定会这样认为——当今社会有两大污染问题，一个是贪污腐败的社会污染，一个是生态环境的污染，这是两个同等重要的有着内在联系的息息相关的问题，指望着单纯解决某一个问题的做法，都从根本上遏止它们的势头，只有双管齐下才是惟一正确的方法，舍此恐无它法。中国能否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目前面临着关键一战。

西方有句格言：最容易上瘾的毒品，是金钱。

我们中国的老祖宗，对“富”有许多种认识，有豪宅大院，人丁兴旺，广置田亩房产，便是富。《说文解字》上对“富”的解释是：备也，厚也。食有三年粮，穿有三年衣，行有香车宝马，内有三妻六妾相待，有丰厚的物质储备，便可以算是富了。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君子取财有道。致富手段多多，但致富的方式却有所不同，古人云：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为下。本富者，农桑也，末富者，商贾也，奸富者，盗贼也。连司马迁也说：由穷变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如今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老实实在土里刨食的农桑者，最为世人所不齿，因其费力而不讨巧，致富太慢太难太累，没得捷径可走。

当今有些想发财想红了眼的中国人，前赴后继，死而后已，为发财致富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不择手段地发展一区一地一己的经济，残酷地鱼肉自然，破坏生态，污染环境，为广进财源，不惜广图世人之财，害大众之命，冒天下之大不韪。

他们使奸耍滑，阳奉阴违，偷排偷放，对抗国家的三申五令，已经沦为古人所不齿的奸富和倚市门者，还自以为得计，以为自己奸富得有本事，倚市门倚得有水平。说他们奸富和倚市门，其卖是抬举了他们，他们鼠偷猫窃、坑蒙拐骗，所作所为，其实连盗贼也不如，连倚市门卖笑的娼妓都不可比。

盗贼只不过是打家劫舍，图有数之钱财，害有限之性命而已。倚市门

卖笑的娼妓，出卖的也无非是自己的灵肉，污染和伤害的也不过是她们自己的身体和心灵，虽然有伤社会风化，相较前者，危害却也有限。

一位朋友说到这个社会现象，十分有趣，记在这里以博有识者一笑，他认为，现在时的那些娼妓已今非昔比，往往来自偏远地区，有一定文化良知，还懂得从良和见好就收，每每从嗜嫖成性的大款们身上挣够一笔大钱，便会金盆洗手，银盆洗脚，回老家去，或开店铺，或办工厂，自己当起老板，安居乐业，对分流社会财富，发展落后地区的经济，也无形中起到一些作用。

那些对抗国家关停和必须达标排污命令的有关污染企业，明知故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将污水偷排偷放，为图天下之财而不惜害大众之命，他们破坏的是人类共同的有限生存空间，污染的是人类共有的每况愈下的自然环境，劫掠的是人类共享的不会再生的地球资源，毁灭的是与人类共存共荣的今天和明天。

欲速则不达，心急吃不到热豆腐，致富亦然。《樗斋漫录》上有句话，很可以发人深省：欲富者，贫相也，欲贵者，贱相也，急欲富贵者，夭相也！

意思是说，挖空思想要发财致富的人，恰恰是终生贫困潦倒之相，削尖脑袋想要变高贵的人，往往正是生世卑微低贱之人。急功近利，不择手段，想要空手套白狼，获取富贵的人，更是一种不祥之兆，乃是少年早夭，中年暴卒之相。

富润屋，德修身，富而无德者，只润屋不修身，是为浊富。

清人张潮认为：为浊富者不如为清贫。为富不仁的发财致富，图财害命的出人头地，是缺德带冒烟的短期行为，不光会严重损害别人的生存利益，还会祸及自己，殃及子孙，最终受到社会审判和自然规律的惩罚，种瓜得瓜，恶果自食。

如果说环境污染只是诸种物质的错位，那么社会的腐败则可以说是诸种精神的错位，正如一句俗语所一针见血描述的那样——吃什么补什么，你最馋吃什么就说明你身体内最急需补什么——于是我们悲哀而无奈地看到，不是我们想呼唤他，而是因为我们社会和时代的肌体需要它——钙对人的背离结果是让人得软骨病。

面对离我们而去的周恩来，对照他的德行、操守、崇高和神圣，我们不得不为长期缺钙的自己和长时间错位的社会担心，希望日益功利日益世俗的社会，即刻充满一种神圣操守与崇高德行的人格力量，借以卓有成效地遏止对社会浮嚣无理的侵害野心，异常有力地制止对自然贪婪无度的扼杀手段，坚决挥斥急功近利的鼠目寸光，无情揭露披着地方主义和集体经济外衣的极端的自私自利和本位主义，毫不手软地绞杀诸种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式的短期行为。

在这个棘手的问题上，连崇高这样的字眼，似乎都显得有些苍白无力。

三、邓小平魂归何处

邓小平说：如不解决污染，劝不抵过
70年代，秀山秀水甲天下的桂林漓江污染严

重，邓小平同志对此曾愤怒地进行了批评，一针见血地指出：如不解决污染，功不抵过！

曾几何时，邓小平同志不幸逝世的消息使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他的骨灰被撒向祖国的江河湖海，体现了这位划时代巨人对中华民族铭心刻骨的一往深情，然而当那些伴着鲜花的如瑞雪般扑向他深深挚爱着的华夏大地的骨灰在落入祖国的江河湖海时，迎接这位世纪伟人的，不是山明水秀的旖旎风光，竟是被污染了的海岸线和江河溪流。

这般污染的江河湖海，如何能接纳邓小平同志的骨灰？

悠悠一缕英魂，岂能融入肮脏之中？魂兮，何以依归？

这位具有百科全书一样渊博学识和非凡头脑的中国现代化之父，面对如此一片被污染了的广大天空广大疆土和广大水域，会有怎样一番感慨？

我们只知道这位四川籍的中国人民的儿子，生前非常热爱祖国的自然风光，曾经走遍了大江南北，黄河上下，淮河两岸，黄浦江边，海河之滨，珠江之畔，也不止一次地饱餐过西湖、东湖、太湖的秀色，领略过五百里滇池奔入眼底的绝胜的自然风光，足迹几乎遍及祖国所有的山山水水。

如今的西湖、东湖、太湖，以及滇池和别的一些湖泊，碧波荡漾，荷花飘香的过去已经成为了过去，浊臭的水面上没有唱晚的渔歌，只漂着三三两两的翻着白色肚皮的死鱼，出没着成片成簇的幽灵般漂来荡去捞之不竭的水葫芦。

著名的淮海战役就发生在淮河流域，当年是共同对敌，如今却起了“内江”，沿河无数条污水管道日夜唱着五颜六色的骇人的小曲，喷吐着肮脏的口涎，成万吨的污水不舍昼夜地排放，上游污染下游，下游又污染更下游，使沿淮地区亿万亩良田减产，深深地损害和创痛了淮河流域一亿五千万劳动人民的身心，以至使沿淮百姓群情激愤，民怨沸腾。

这位自然之子，他生前最热爱的一件事，就是到大海里去游泳。

然而，有一种红色的海藻，因为大海中富含大量的污染物而超常的繁殖，使海水都变成了红色，这些赤潮驾着连天的海潮扑向辽阔的海岸线，所到之处使沿海地区渔民们养在所有网箱中的鱼虾都死于非命，经济损失达到吓人的高度，而这种赤色灾难正在随着海洋中污染程度的不断加重而频频地发生着。专家们惊呼：再不治理海洋污染，近海无鱼的日子不会很远了！

也许生前的邓小平最喜欢这样一首诗：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时至今日，长江的上游和下游的阿哥阿妹，已经不能再同饮一江水，因为有些长江下游江段的水，已经被污染得不可以做饮用水了。

黄河断流已经超过了二百八十天，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

至于其它一些湖泊和河流则无须一一赘述，也好不到哪儿去。

用一句模糊的没有前置和后续的不负责任的话来说，不知是从哪一天哪一时哪一刻开始的，我们中国这艘古老而巨大的艘艘战舰，充满活力一往无前甚至有些洋洋得意地航行在铺天盖地的经济大潮中，在它那鼓荡着八面来风的船帆上和高傲的理想的桅杆上，张扬着一个生猛可畏的信念——发展经济，让肥水快流。

当充分的被焕发了青春抖擞起精神的中国这艘巨大而又古老的艘艘战舰，挟持着沿海特区经济大潮铺天盖地席卷向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淮河流域乃至整个华夏大地时，它曾充满火热的创造激情和无与伦比的生命活力。

太过长久的饥渴使它张开喉咙大声呼吼着，太过长久的羁绊使它的手脚无所顾忌地挥舞着，在它那桅杆一样高昂起的骄傲的头颈上，舵手吹响了号角。

号角声声，引得千帆竞发，村办的乡办的镇办的中小型企业匆促上马，有条件的要上没有条件的创造条件也要上。它们共存共荣，如同无数只孳生的形形色色的小舢板或是皮艇子，肆无忌惮地悍然驰入了中国所有的江河湖海，安营扎寨。

它们的无所不包的落后的生产方式和无所不在的满不在乎的吃喝拉撒，公然污染了所有能够污染的天空、海洋、森林和大江大河大湖大水，甚至连一条微不足道的小河沟和一个小湖汊也不肯轻易放过。

林林总总的烟囱日夜不息地在天空中盛开着惊心动魄的世纪末工业文明的光怪陆离的“花朵”，这些光怪陆离的“花朵”曾经在昔日被那些因惊喜而短视的诗人大力的讴歌过，现在它们长大并成了气候，却使人们忧心忡忡，整个人类都在抱怨和诅咒它们，如同抱怨和诅咒那些布满河道的大小小的污水管，那些污水管自由自在地喷吐着肮脏的五颜六色的欲望的口沫，欢快地不舍昼夜地在清澈的河流中濡染着一幅幅浸透着昧心钱的变形画，蚕食着两岸山川草木和妇孺百姓的民生和健康，蚕食着全社会的良心和良知，也蚕食着整个人类的明天和希望。

这种杀鸡取卵式的肥水快流，最终的结果是使其流出了血和脓。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那种浓烟蔽日，浊水横流，摧枯稼田，拉朽森林，万箭齐发，百舸争流的热火朝天的情形，似乎刻意再现当年大跃进时的生动景象。

当然，这也许只是一种中国式的巧合，但这种巧合仍然发人深思。

所以，当我们人类连最后一块遮羞布也索性撕去时，便从里到外都活脱出一副为富不仁、大模大样、义正辞严、巧取豪夺的嘴脸。

透过它们聚敛着各色不良财富的船头，我们似乎隐隐约约地看见一面猎猎招展着的象征图财害命和劫掠成性的交叉着白骨和骷髅标识的黑色欲望的旗帜，在褻渎着人类社会的良知。

它们理直气壮地直接和间接地奴役和践踏了所辖之地的几乎所有的人文景观和自然风光，直接的侵害如同当众往你家的水缸里扔脏东西，往你饭碗里投慢性毒药，当众强暴你凌辱你还美其名曰：这是经济发展的需要。

还会说：何况，毒害你的又不是我一个人，有许许多多多个厂子哩！

甚至还会有人好心好意地劝慰你说：王老二，你勿要怕，这水里的污染物是有些毒性的，不过跟个烂鳊人一样，发作起来慢得很，把不准它在你身上跟攒钱似的要攒好一阵子才发得了财，怕是你天生穷命，到死也发作不起，得发作在你儿子孙子身上，那个时候你已经死翘翘的，他们发财倒霉关你屁事，你还怕个啥呀！

间接的侵害则如同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如果小平同志还在世，会对此做何感想？

邓小平魂归何处

污染的江河湖海，何以安葬邓小平同志的英

灵？归不归，胡不归？江河湖海，满目疮痍，一片

肮脏。悠悠英魂，辗转徘徊，魂兮魂兮，何以依归？

70年代，秀山秀水甲天下的桂林漓江污染严重，邓小平同志对此曾异

常愤怒地进行了批评，一针见血地指出：如不解决污染，功不抵过！

邓小平的一句话，国务院亲自主抓漓江治污，一举关闭了沿漓江 27 家污染企业，使漓江得以至今如少女的眸子也似清纯依旧，使桂林的山水至今仍然称甲天下。

好一句“功不抵过”，这板子高高地举起，狠狠落下，打在了见小利而忘大义的那些短期行为的地方官员的屁股上，不知他们现在觉得疼吗？

邓小平 1983 年 1 月 12 日说：要大力发展农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提高农作物单产，发展多种经营，改革耕作栽培方法，解决农村能源，保护生态环境等等，都要靠科学……。

1982 年在全军植树造林总结经验表彰先进大会上的题词是：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

1982 年对林业部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造林运动情况报告的批语曰：这件事，要坚持 20 年，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扎实。为了保证实效，应有切实可行的检查和奖惩制度。

邓小平是这样说的，可是急功近利的人们却不肯听。

严酷的现实似乎不得让我们痛定思痛地下这样一个结论——张扬着这类旗帜的船只，不论它们的包装是何等的华美，身价是何等的不菲，形象是多么的卓尔不群，底蕴里就如同是一只为富不仁的海盗船。

因为它们的繁荣太过短暂也太过昂贵，是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

在这个生猛可畏的欲望的鼓动下，正如一句调皮话所说，急功近利的人们恨不得把北京的前门楼子也装上两个轱辘推出去卖了。

毫无疑问，种种迹象表明，事实上它们已经成为中国当今社会一个显性的不可忽视的致命的威胁，抑或是整个人类文明社会和自然生态肌体中一个狰狞可怖的癌肿。

历史似乎总是这样，凡属违反历史发展规律的，或迟或早总会受到惩罚，所以正当这艘中国号舰艇率领着数以万计的舰艇以超速度的发展向强国如林的世界经济前沿做新一轮冲刺时，作为主力舰重要板块之一的广大淮河流域，忽然军情紧急，巨大的舰艇竟然被些小小的舢板掣肘并严重地拖了后腿。

长久被蚕食被欺凌被损害着的淮河流域，被沿淮数以万计的造纸厂和化工厂以及这个厂那个厂污染着，正在痛苦而绝望地挣扎着、呻吟着、腐烂着、发臭着。

淮河流域广大地区的国计民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严重损害，这种损害程度在与日俱增，日益蔓延并迅速加重，淮河已经呼号着频仍地向所在地方政府和中国的神经中枢以至全社会都发出了求救信号。

事实上，这种污染的威胁绝不仅仅在淮河流域，包括长江和黄河以及中国境内几乎所有的河流湖泊，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污染问题。

这难道是我们的错吗？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谴责，他们振振有辞。

这难道不是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吗？这难道不是脱贫致富的需要吗？

难道我们想过好日子也有什么错吗？

难道我们这些小企业就没有生存的权利吗？

需要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需要的。

他们像哲人一样思索着说。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存在的。

显然黑格尔没有他们聪明。

原本黑格尔在这一精彩结论中，已经含蓄地淡化了人类与生俱有的那种大言不惭和恬不知耻的内心独白，加入了自然调和主义的色彩，可是现代人再次强化并顽劣地显现了人类的这一个最为致命的弱点。

简单的存在似乎已经不足以使人类获得心理和生理上的满足，万类万物皆为鱼肉，只有人类现在时的无厌的对财富的欲求才是挥舞得呼呼生风的货真价实的合情合理的刀叉，才是真正的生猛可畏的用来宰杀自然生态和人类自己的血腥的砧板。

人类像墨索里尼一样，总是有理。

中国人是讲风水的，风水在这里有迷信的成分，但似乎也有科学的因素。

有好山好树的地方必有好水，有好水的地方必有好山好树。

一方水土育一方人，山好水好的地方，必然钟灵毓秀，人杰地灵。

所以，秀丽的湘潭韶山冲出了个高大英挺的毛泽东。

因此，峻峭的巴山蜀水中走出位短小精悍的邓小平。

这里虽然有偶然的因素，也寓有必然的成分。

偶然与必然好似一对伉俪情深的夫妻，这是一对富有日月精神，春秋经验，恩爱甚笃的夫妻，这对夫妻行房之时，暗结的珠胎山青水秀，生下的也只能是个天然飘逸自然风光的山水儿女，绝不会是个汞中毒的痴呆婴儿或是个铬中毒的残肢儿童。

是谁弄脏了我们的锦绣中华？是谁污染了我们的花花世界？

只要污染了生态环境，经济再发达，社会再繁荣，财政收入再丰厚，污染者也不是有功，而是有过，是要打屁股的，板子是现成的：不解决污染，功不抵过！

上对不住我们的列祖列宗，下对不住我们的后代儿孙，抚往事而不追昔，厚当今而薄子孙，真有点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豪迈之气，难道我们果真要“前不见古人兮，后不见来者”？最终落个“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下场吗？

谁之前车？谁之后辙？谁在助纣？谁在为虐？

谁之功？谁之过？谁之罪？谁之是？谁之非？

今人之事，后人自有评说，不怕评说者，不妨姑妄行之。

这样的江河湖海，何以安葬邓小平同志的英灵？

归不归，胡不归？江河湖海，一片肮脏。

悠悠英魂，辗转徘徊，魂兮魂兮，何以依归？

四、江泽民一言定邦

江泽民一言定邦

环境保护是一项崇高的事业，是积德的事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从事这项事业是很光荣的。

江泽民总书记在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做了很重要的讲话，他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贯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最早源于环境保护，现在已成为世界许多国家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经济的发展，必须与人口、环境、资源统筹考虑，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决不能走浪费资源、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

据种种资料表明，中国的人口，从1949年至1981期间，平均每隔6.4年就增加1亿人。1982年，平均每分钟出生33人，到1987年，每分钟出生的人口达到40余人。

2000年世界人口预计将超过60亿，中国人口预测数各有不同，但平均各类预测数据的最终，也将达到13.50亿人口。

人类面临的窘境是——人类数量的不断递增和地球面积的无法扩大——中国的版图面积只有那么大，而人口的数量却以几何级数的方式在膨胀，如何有节制有限度地合理高效地利用有限的地区空间和有限的资源储备，尽量减少和遏止各种能源的浪费，有计划地开采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有限的地下矿藏，尽量减少和不断加强森林和绿色植物以及各种绿色生命原素的储备，从一点一滴做起，努力提高每一立方米阳光、空气、水的可利用率和素质，拓宽和强化人类的生存空间。

保护地球的臭氧层已经出现空洞，不经空气过滤的阳光，成为可怕的光明极处的阿波罗杀手，这个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驾着太阳的金色的战车，隆隆地滚动起白炽的火焰的轮子，辗过时空驿道和人类脆弱的神经——在北欧一带，强烈的未经大气过滤的这位太阳杀手，投射出万束细小的金箭，铮然有声地从没有臭氧层遮拦的空洞飞向人间，射瞎了数以万计的各种动物和男人女人的眼睛，让他们和它们永远的待在黑暗中，并因此引发出许多种从来未出现过的新的畸形的疾病，惨不忍睹。

人类的无节制的生育和工业的无节制的发展，创造出大量的城市污染和工业污染，大量城市垃圾未经处理四处掩埋和倾倒，大量城市废水不经处理便流入各种各样的河流，工业生产的三废更是肆意横行，大气污染、河流污染、生态污染连年加剧，使自然生态环境濒临危境，使人类的身心和健康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据专家研究证明，人类的80%以上的癌症与环境污染有关。

中国每年排入大气中的烟尘约1400万吨（约占全世界1亿吨的14%），二氧化硫约1500万吨（约占全世界排放量的1.46亿吨的10%），30个大城市平均浮游灰尘量0.6毫克/立方米大气，超过日本10倍。到2000年，按国家规定，中国要消费12亿吨煤。按目前我们对煤的使用技术和方法，12亿吨煤将要产生出24000万吨煤灰，4000万吨烟尘和2400万吨二氧化硫。它们将打扮成不同的嘴脸和模样，混杂在风、霜、雨、雪、雾、露、水的自然形式之中，散落在中国土地上，散落在生长着秀木佳禾的山川河流之上，也散落在生息着中华民族12亿人口的和平居民们的乡村城市之中。

由发电厂、金属冶炼厂和汽车排泄到空中的二氧化硫和氧化氮生成的硫酸和硝酸，以雨、雪、雾形式出现的所谓酸雨，是目前对人类威胁最大的一种空气污染。

1986年，中国汽车工业排出的二氧化硫已占世界第三位。华东、中南、

西南都是迅速发展中的酸雨区。上海 1980 到 1983 年的 3 年间酸雨量增加 6 倍。

自然的规律和法则是这样的：人类对自然生态的无度的侵害和掠夺，对自然的平衡过分的破坏和干预，迟早是要受到自然规律和自然法则的无情的报复。

现在，五大自然圈都已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地球上的岩石、水、土壤、空气、自然生命都已经被改变了天然的原始纯良的属性，被各个不同地打上了人类科学的烙印，南极、北极也不能幸免于难。人类创造的化学制品已经突破了 500 万种，并以每年 2000 余种的速度在增加。超分贝的噪声、超标准的放射性原素、未经处理的垃圾、污水、错位置放的重金属、大量残留在泥土和植物间无法在短时期衰减的农药、还有大量石油制品跑、冒、滴、漏的造成的污染等等，比比皆是，触目惊心。

十多年来，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省份，大搞拆船工业，没有技术队伍，没有防污设施，各种废油、重金属、酸性物质、含菌垃圾、玻璃纤维、废塑料等，被直接倾倒排入所在港内，严重地污染了江海，损害了海产养殖业、浅海生产、渔业和盐业生产。

从整体上来看，赚少亏多，利少害多，是一件不“积德”的事情。

从以上那些数字不难看出，这个邪恶的潘朵拉真是无所不包也无处不在啊！

江泽民总书记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 60 年代，1993 年 5 月 7 日，在会见中国环境与发展合作委员会外方代表时的讲话中，江泽民总书记说：中国有句古话，“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是中国最美的城市，从环境角度看，你们看杭州怎么样？我衷心希望，杭州不要污染，当然，其它城市也不要污染。从我个人的经历看，我在工厂、研究单位工作过，对环境污染深有体会。我当过动力厂的厂长、原子能发电厂的厂长。发电厂的大气污染很厉害，不上电除尘不行。60 年代我任厂长时，发电厂就安装了电除尘。目前中国的领导人中，很大一部分是念工程技术的。我是念电机的，李鹏总理是念水电的，朱镕基副总理是念电机的，邹家华副总理是念机床的，都与环境保护有关。我们都在基层工业部门工作过多年，对环境问题有切身的体会。

江泽民总书记接着又进一步说：以前我读过不少英国小说，知道伦敦是有名的雾都。1988 年我任上海市市长时，访问过伦敦，发现伦敦不是雾都，泰晤士河的水很清，很干净，可以钓鱼。上海有一条河，叫苏州河，1945 年我在上海念大学时，河水较清，现在变黑了，污染很严重，中国将投资 16 亿元人民币治理苏州河，河水经过处理排入大海，希望也能在苏州河钓鱼。

苏州河的污染由来已久，那么黄浦江又怎么样呢？

江泽民总书记在第四次环保大会的报告的结束语中，又语气深长也是意味深长地说：总之，环境保护是一项崇高的事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从事这项事业是很光荣的。

污染环境该送给那些给潘朵拉充当帮凶的人们！

是积德还是缺德

说不定哪一天还会一个不留神，有如海洋红

藻大量繁殖引发的赤潮和太湖蓝藻肆虐产生的

水质恶变，性喜在污染水面生长的水葫芦，也可

能会引发一场全国性的江河湖泊大面积被水葫芦入侵占领的可怕的生态灾难。
环保是一项崇高的“积德”的事业。

江泽民总书记可谓一言惊人，把环境保护这件事情，提到了一个最基本的也是最根本的，同时又是最古老也是最新式的一个高度，将环保这一颗最难踢的黑色皮球，一脚劲射，从单纯的政府行为的场地，直接踢进了中国这个尘封已久的礼仪文化大国最尊崇最神圣也是最核心的那个部分，一举踢进了那张德行、操守、人品、良心、良知、民主监督的恢宏大网之中。

已经有种种不同的资料显示，世界上人类所得的种种疾病，80%以上与水是分不开的，人类生命除了需要阳光和食物的充电外，更主要的是水，充斥人体的80%是水，如果没有充足的水份的填充，人类生命便不复存在，人类像鱼儿一样离不开水。没有水源的地方绝不会有人类生活的足迹，古楼兰的湮没无闻，以及广大的沙漠地带所以没有人烟成为不毛之地，便是因为没有水的缘故。

每个地区能有多少人休养生息，主要由水源决定。许多古老城市的荒弃，许多古老村落的废弃，80%都是因为没有了水源，而许多新兴城市的崛起，新建村落的形成，新的工厂群落的建立，也都是因为附近有充足的水源，才兴旺发达的。具有悲剧意味的是，人类永远都在择水而居，永远都在不停地迁徙，因为只要是有人烟的地方，不论有多么充沛的水源，不论有多么良好的自然环境，用不了多久，都会一点一滴的为之消失，没有消失的也会被污染得不成样子。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小城市都依傍在江畔河边，所有的乡镇村落都如婴儿般偎依在水的怀抱，水是城市乡镇的命根子，是人类的命根子，更是自然生态万类万物的命根子，没有水就没有了生命。

在山西有个山村名叫响泉村，从这个泉水淙淙作响的村名，便不难想见当年这个村落处处清泉石上流的景象，可是如今却没有一滴水，连活命都不可以，所以最终这个村子里的人们不得不做彻底的迁徙，从干旱的山上搬到了有水的山下，择水再居，重新开始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使人忧虑的是恶性循环，如果不改变村人竭泽而渔的恶习，用不了多久，这里的水源还会枯竭，他们又将迁徙于何处呢？

这样典型的例子，大大小小，比比皆是，窥此一斑，便可见全豹了。

整个地球的所有的的水，海水占到97%，冰川水占到2.2%，淡水、包括地下水占到0.76%。世界年降水量共约570万亿吨，陆地保持量约170万亿吨。其中，河水年流量47万亿吨。万类万物维持生命都需要水。每年一个人要回万吨水来维持生命。

算起来，每人每年直接饮水4000吨，剩下的让给动植物6000吨，以维持生物链和食物链的生命平衡和生态平衡。地球能够给人类的生存用水的上限量为50万亿吨，大体上每人每年平均可分享1万吨水，正好就是上述的4000万吨水加上6000万吨水的数字。中国的人口量和水源量放在一起算一算，每人每年的平均可用水量，只相当于世界相应的平均量的1/4，可谓先天大大的不足。

先天不足，这还不算，还要加上后天失调。

中国目前每天排出工业污水约为8000万吨，其中80%未经任何处理直接排入江河湖海，全国火力发电，每年直接排入江河的粉煤约1000万吨，

每年排放的工业废渣 3 亿多吨，对大气和水质构成严重污染。工业废水、灌溉水、生活污水，成了目前对我国饮用水构成最大威胁的三大排放源。工业排出的废水，带有种种新的成分复杂的化学污染物，使水源水质严重恶化。生活污水中含有极其复杂的生物和化学的污染元素，对饮用水造成的危害非常大。灌溉水回到河流和蓄水层时，会大大增加溶解性固体的总含量。中国的 78 条主要河流，有 54 条已经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在 5 万余条支流中约有 70% 已经污染。全国近十多年污染水年增长率约为 7.9%，预计 2000 年受污染的清水将达到 25040—37560 亿吨。

中国的第一个污水处理厂，直到 1980 年才在北京的东郊启用，上海、杭州、宁波等城市每年都有 30 亿吨污水注入江河湖海，预计到 2000 年将会从从容容地翻上一番。目前，中国的渤海、黄海的油污染已经超过标准近 50 倍。

云南省素负盛名的“五百里滇池”，当年围湖造田和别的一些名目的侵害，使滇池的面积锐减，现在滇池的面积已经不足 300 平方公里。更可怕的是近年来，大量工业废水和城市污水的注入使滇池变成了一个腐臭的水塘，为治理污染花外汇从国外引进的一种名叫水葫芦的水生植物，非但没有遏止已有的污染，还带来了另一种可怕的生态植物灾难，性喜肥沃臭水的水葫芦大量繁殖，成堆成批生长出来的绿色的水葫芦叠罗汉似的壅塞了滇池的水面，捞之不竭，取之不尽，兼之这种水葫芦，猪也不吃，牛也不食，一无是处，生命力却异常的顽强，一心一意要在滇池安家落户。

这些滇池的水葫芦是潘朵拉的盒子，说不定哪一天还会有一个不留神，把这个盒子拿到别的地方打开，使它们族类的情影出现在所有中国的江河湖泊，有如海洋红藻大量繁殖引发的赤潮和太湖蓝藻肆虐产生的水质恶化。

性喜在污染的水面上自由生长的水葫芦，说不定真有那么一天会波及全国各地的江河湖泊，引发一场全国性的江河湖泊大面积被水葫芦侵占的可怕的生态灾难。

滇池有关管理部门，光是每年用来雇人捞取水葫芦清理水面的费用，就使当地政府皱眉蹙额，更别说要恢复滇池的清亮洁净。恢复清亮需要花费 32 亿元，相当于北京市年财政收入的 16 个亿的一倍，这笔钱从哪里出？

从本世纪初到 70 年代，全世界农业用水增加 7 倍，工业用水增加 20 倍。全世界目前已经有 63 个国家和地区缺水。中国是世界上的贫水国，占有水资源排在世界第 84 位，是实实在在的缺水大国。更让人忧虑的是到对世纪初，世界淡水量的需求将是 70 年代的 3 倍多。我国目前人均年用水量为 490 立方米，仅相当于美国的 1/5，苏联的 1/2。等到 2000 年，我国的总需水量为 700 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用水占 80%，而供水量只有 6000—6300 亿立方米，缺 600 - 1000 亿立方米。以华北、辽宁等地区的情况最为严重。掠夺性的地下水的开采已经使京津唐地区十水九空，北京市东郊的地面沉降严重，水质恶化，水位下降，地下水枯竭的前景在即。

环境保护从来就不是一国一地的事，更不是一种单纯的政府行为，而是全民全社会的公益事业，是人人有责的事，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

“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做法，是损人利己的事，是缺德带冒烟的事。而依照民间老百姓的说法，那种损人利己缺德带冒烟的人，甚至连他们生下的孩子，都是不长屁股眼的。

当然，这就有点急了眼骂人的意思了。

1993年6月4日，江泽民在会见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伊丽莎白·多德斯韦尔女士时，重提苏州河并谈到了黄浦江，不无忧虑地说：我在上海担任市长期间，深深体会到，上海这个大城市越是发展，污染问题就越大。50年前我在上海念大学时，黄浦江的水是非常好的，但现在的黄浦江的水，特别是苏州河的水污染严重。我们现在有一个工程，苏州河的水经处理排入大海，我们希望苏州河也能像英国伦敦的泰晤士河那样，河里有鱼。5年前我看到有人在泰晤士河钓鱼，不知道那河里的鱼是否好吃，但鱼毕竟是一种生物，说明泰晤士河的水质变好了。

他又接着说：目前中国有11亿多人口，这是个大问题，上海市人口1200多万，每天蔬菜、肉类、蛋类的供应运输量很大，造成污染。夏天上海人吃西瓜，西瓜皮一天不处理，就会产生很不好的气味，因此垃圾处理是个问题……发达国家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臭氧层遭破坏，影响了全球气候，更需要全球合作。我很羡慕你这个工作岗位，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你的工作就是积大德，造福于子孙，造福于人类。中国政府与联合国环境署以往的合作是成功的，中国政府愿意进一步加强这种合作。几天前，国务院发出通知，禁止犀牛角和虎骨的贸易。我的祖父是个老中医，我童年时代，知道点中医里的虎骨酒、犀角丸是治病的。我们有西医，讲究中西医结合。禁止犀牛角和虎骨的交易，除行政命令外，还要加强对广大群众的环境保护教育，加强保护野生动物的教育，普及西医和研制中医药的替代品。

谈话中提到联合国副秘书长兼环境署执行主任伊丽莎白·多德斯韦尔女士职业时所说的“你的工作就是积大德”，可以说是江泽民总书记关于环境保护是一项“积德”的事业的最早一次提出。

不积德是不行了

一言惊人的江泽民总书记，从此便被载入了中国环保的经典史册，成为了中国环保金字塔上富有独创性的、用心良苦意味深长的一截塔身。有了这截权威的塔身的存在，和人民群众这个神灵的合法介入，不积德看来是不行了。

然而，真的有那么一天，当我们想骂人的时候，也许已经没脸骂，连骂也无法骂出口来了，因为环境问题是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遭到侵害，濒临危殆边缘的。

绿色植被的大面积的消失，使水土大量流失，形成了沙漠化，据联合国调查的一些数字显示，全世界的沙漠化已占陆地总面积的16%。在我国的新疆，清澈的罗布泊湖已经干涸。盲目地开垦土地，没有节制地滥用水源，无度地放牧，使大片绿色无暇生息，不断被砍伐的红柳、胡杨，使绿色防风林带遭到严重破坏，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像侵略大军一样，已经浩浩荡荡的举步南侵，昔日秀丽壮美的塔里木河下游一带，已经被黄沙逐步占领，渐渐成了不毛之地，地下水大幅度下降，沙漠化的侵袭正以惊人的速度一片一片地蚕食着大西北。

艾比湖是世界上十分著名的风景，阿拉山口迤迤往东南行，便可以看到一片碧波荡漾的湖水，这是镶嵌在新疆东南部的一颗明珠——准噶尔盆地西南部的汇水中心，湖周围有47万多亩丰腴的耕地，有13个民族，几十万人，千百年来，他们围湖而居，靠水吃水，以此为生。50年代，湖的面积1620

平方公里，80年代末，不足500平方公里。30多米宽的胡杨、红柳的防沙林带也挡不住风沙大军的入侵，越过防护林的风沙，荒漠化像巨兽一样肆虐地张着血盆大口，吞噬着美丽神奇的汇水中心，吞噬着风景壮观的准噶尔盆地，准备将南疆惟一的灿烂明珠吞入自己的腹中。

据称，长白山森林面积正以每年3.5公顷、500万立方米的速度消失，伊春林区年产原木500万立方米，而当地居民一年就烧掉300万立方米。1987年，举世震惊的大兴安岭火灾，烧遍了101万公顷土地，烧毁了70万公顷林木、85万立方米木场存料，把拥有6万人口的漠河城，一下子烧成了一片焦土瓦砾。

具有天然动植物园之称的云南的生态环境的形势也不容乐观，德钦县白马雪山的滇金丝猴，随着最后一块高纬度低海拔的针叶林的被砍伐而可能永远消失，吃木头财政的当地政府，时刻在贪婪地、眼红地盯着那些已经在白马雪山生长了上千年的原始森林，希望用它们来换取每年的财政开支。这里的山上的土壤植被只有薄薄的一层，森林生长在上面，是大自然神奇功运的结果，如果砍伐掉，很快就会流失水土，裸露出岩石，人工造林在这里只是一句空话。如今，过量的采伐已经使大量的水土流失，裸岩出现，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这个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天然的动植物园，就会变成一片到处都是裸露着岩石的荒山秃岭。

有这种行为和思想的人们，显然不是在积德行善，而是在人为地制造生态灾难。

1994年7月8日，江泽民总书记接见了参加“中国21世纪议程”高级国际圆桌会议部分代表，他在讲话中说：中国以极其认真的历史责任感对待环境与发展问题，也就是你们说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对可持续发展是非常重视的。联合国环发大会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我们就编制了“中国21世纪议程”。除了历史责任感，中国现在的许多领导人都是学工程、学自然科学的，我们认识到了环境与发展关系。在发展中不注意环境的改善，是很难可持续地发展下去的。中国有句俗话，“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刚才许多人都提到中国政府要把“中国21世纪议程”同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有机结合，特别是纳入“九五”计划。我认为这很好，表明了中国政府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决心。

江泽民总书记和以他为首的党和国家政府，显然是下定了“积德”的决心，一门心思地不仅只是要造福当代，更主要的是要造福子孙后代。

过去我们的老祖宗以为，头上三尺必有神灵，而这些神灵是爱憎分明的，是不容许你贪赃枉法、暗室欺心、恃强凌弱、无法无天的。做了坏事终归会有报应，做了好事迟早会有奖励，而惩恶扬善的就是三尺之上的那个神灵。

有那个神灵在头上时，好人做积德行善的好事时，无须自己四处对人张扬，自有那个神灵心知肚明。坏人做缺德带冒烟的坏事时，也有一番计较，知道自己的所做所为都让那个神灵看在眼里，记在缺德簿上，限时遭报，心里总有些怕怕。

可是自从卫星上天，那个神灵就落地了。

没有了神灵，积德的也没有了个依凭，只好自己自个儿凭了良心和良知做事，得自己好生管着自己。

没有了神灵，缺德的也就全没了顾忌，肆无忌惮地由着心性胡闹，而

且生下的小孩子，不光个个都有屁股眼儿，而且还能让这屁股眼儿从小就屙金尿银，吃好的玩好的，让其过好日子，上贵族学校，买托福出国留学去，日子过得很是滋润。

反正好坏也没有神灵与人们做个计较，所以好的也就好得不那么理直气壮，好得不那么自觉自愿，甚至连好坏也分不清了。坏的也就坏得扬眉吐气，只要自己可劲捞足，让上司看好，升官发财，有钱有权，就没有办不到的事情。

当然，江泽民总书记所说的“积德”，是慎重加了引号的，自然不是单纯针对民间对积德缺德的那种说法，而是一种社会性的泛指，是泱泱大国五千年美德文化的一个集大成的泛指，包罗一切，自然也并不排斥民间关于积阴德的说法。

民间的老百姓对治理污染不力的那些地方党政干部，有一种规劝式的说法也是很有意思的，说：不讲迷信，也得讲点党性；不讲党性，还得讲点良心。

我不知道，那些连良心也不讲的人，还会讲点别的什么吗？

江泽民总书记所讲的“积德”二字，用心可谓良苦，意味可谓深长，可谓兼收并蓄，囊括了五千年中华文明宝库中所有的一切尖端攻坚技术。

1985年，全国300多个大城市排出5188万吨垃圾、345吨粪便，而无害化清运只占清运量的3.6%，大量未处理的垃圾。粪便裸弃于城郊或是倒入江河。深埋垃圾是近年来的一大发明，但埋而不深，多是堆成一座垃圾山。一座垃圾山可使周围50公里左右的全部水源被污染，这样一来，北京附近将有25万平方公里土地被污染。大量的城市垃圾使土壤垃圾化、渣化、沙化，使农作物受污染。仅以北京为例，郊区20万亩菜地，每亩年平均承受上万斤垃圾，已经严重渣化。有的农田瓦砾的含量已达25-50%，形成了一层垃圾层，不仅破坏了土壤的结构，使保水、保肥能力下降，而且使大量的病菌、虫卵在菜地农田中传播。

据1986年一个统计数字，世界上约有2.5亿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中国占其中的1亿，全世界每年有25万人死于肝癌，而中国就占其中的10万。污染的环境不分青红皂白地使部分人超前患病，超前死亡。

那些为害一方污染一方的执迷不悟的怙恶不悛者，你可以不讲迷信，也可以不讲党性，还可以不讲良心，但你总要为你自己，为你的子孙后代积点德吧？

江泽民总书记的“积德”说，将单纯政府行为有效地转变为一项全民公益的事业——虽然头上三尺没有了神明，可是你的周围到处都是人民群众。

群众的眼睛比神灵的的眼睛还要雪亮，群众的记性比神灵的记性更好，好坏群众心里都有杆秤，虽然群众没有神灵那般万能的惩恶扬善的法力，但是群众会借助法律的力量来制裁你，借用舆论的力量来监督你。掌握了法律武器，开动着舆论机器的觉醒的群众，便是当今社会真正的神灵。

一言惊人的江泽民总书记，从此便被载入了中国环保的经典史册，成为了中国环保金字塔上富有独创性的用心良苦、意味深长的一截塔身。有了这截权威的塔身的存在，和人民群众这个神灵的合法介入，不“积德”看来是不行了。

让我们永远记住这句话，环境保护——是“积德”的事！

这句话将与我们的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共存共荣。
这句话是给那些大大小小的潘朵拉们的当头一棒。

五、中国不能走发达国家的老路

万里对照千秋

那时，万里刚刚被解放出来，他说：我觉得环境保护这个机构存在着问题，不应该是现在这么一个机构。周恩来总理当即问万里：你说应该是个什么机构？万里说：应该是个像国家计委一样的大机构。

最初，中国的环保机构是临时性的，全称是：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计委代管，曲格平教授任办公室主任。

1974年后国务院环境保护办公室由计委转到国家建委代管。

1982年国家机构进行改革，设立了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内设“环保局”，当时还没有“国家”二字，曲格平教授任局长，从而结束了环境管理持续八年的临时组织状态，正式进入了政府序列。

从70年代到80年代初，环境污染一直在发展，生态恶化一直在加剧。在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新形势下，环境保护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据当时的一项研究课题表明，环境污染已构成了对人民群众健康的严重威胁，同时，环境污染和部分生态破坏的经济损失每年达到950亿元以上，占同期工农业总产值的14%，环境问题已构成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威胁。

1982年秋天，作为常务副总理的万里主持了国务院会议，听取了曲格平教授的汇报，国家有关部门负责人和经济界专家列席会议。

汇报使在座的领导人感到震惊。

万里当即表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成为现代化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如果不能及时阻止这种事态的发展，经济建设就难以顺利发展，要像计划生育一样，环境保护也是一项基本国策，必须摆上重要议程，认真加以对待……。

环境保护事业之所以成为中国基本国策，最初就是万里先提出来的。

万里是一位相当具有战略眼光的领导人，对环境保护有自己独到的深刻见解，他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可以追溯到1973年的环境保护会议。

那时，万里刚刚被解放出来，首次参加国务院召开的有关环境保护的会议，万里在会上说：环境保护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机构……。

周恩来总理当即问万里：你说应该是个什么机构？

万里说：应该是个像国家计委一样的大机构……

大家听了，哄堂大笑。

当时大家都不理解，认为万里是在小题大作，怎么可以弄那么大个机构？这不是开玩笑吗？谁也不能理解万里的真实意图。

万里当时就很有战略眼光，认为环境保护这个问题非常的大，我们即使摆上议程狠狠抓它，它也会不断恶化发展，所以需要有个大机构，下大的

力气抓。

事实上，环境的不断恶化证明了这一点。

万里当时的认识不光是正确的，也是富有战略眼光和超前意识的。

如果当时听了万里的话，做出战略决策，也许就不会出现 1982 年所面临的环境污染的严重问题，至少也会相应地减少一些损失。

这就是为什么万里在时过九年之后，还会重提环保这个机构存在着问题的前因后果。

万里当时的想法：既然当年大家认为将环境保护设立成计委那样一个大机构的提法欠妥，那么总可以和计生委相类似吧？既然计划生育可以是中国一项基本国策，环境保护这么大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可以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呢？

具有战略眼光的万里

万里指出：先污染后治理是一条弯路，它不是规律，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相容，中国现代化建设不能走这样的路。

许多部门的负责人和专家相继发言。辩论是很激烈的，但气氛是和谐的，体现了民主决策的意识。这次会议对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虽然时过九年，万里的提法，还是有些超前，还是有人不理解。

国务院的领导人，在对待环保问题上仍然存有不同认识，有的认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是现代化建设中不可避免的，发达国家走过“先污染后治理的路”，现在发展中国家也在走，概莫能外。

而已，这种分歧都是带有根本性质的。

因此，国务院在一次常务会议上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

万里发言指出：先污染后治理是一条弯路，它不是规律，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相容，中国现代化建设不能走这样的路。

许多部门的负责人和专家相继发言。

辩论是很激烈的，但气氛是和谐的，体现了民主决策的意识。

这次会议对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最终，万里的意见还是被大家接受，与大家取得了共识。

在对十年以来环保工作的认真总结的基础上，1982 年底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会上，李鹏代表国务院所做的报告中郑重而庄严的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宣布：环境保护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李鹏在报告中同时还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三大政策思想，一是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二是谁污染谁治理。三是强化环境管理。

李鹏提出的三大环境政策思想，是结合中国特殊国情制定的，具有极大的中国特色和可操作性。

中国政府也一改往日的尴尬，以基本国策向国际社会做出了一副积极的姿态和一个响亮而明确的承诺——中国绝不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对之后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长足发展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环境保护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至此得以确立。

中国环境保护事业从此纳入正轨，走上了一条康庄大道。

时过不久，国务院还设立了环境保护委员会。

各省市自治区也设立了相类似的委员会，这些举措对于开展全国性的环境保护工作，起了重大的、积极的推动作用。

似乎用不着多说什么，万里在中国环保金字塔上的煌煌地位，可谓是开先河、划时代的，仅此一端，便足以使万里名垂青史，光耀当代，功照千秋了。

中国是世界版图上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也是一个多民族的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环境问题绝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也直接关系到全世界生态环境的安全与否，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能够成为一项基本国策，不光是中国环境保护的幸事，中国人民的幸事，也是全世界全人类的一大幸事了。

如此远见卓识，中国幸甚！世界幸甚！

六、李鹏果断决策

李鹏功不可没

李鹏说：环境保护是综合性的事业，国务院既然设立了国家环保局，而其他部门又不能替代，说明有设立的必要，就要承认它的作用和地位。

“中国 21 世纪议程”把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确立为“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社会体系和保持与之相适应的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和环境基础”。但是要切实地做到这一点，却是十分困难的。

同时，黑河的治理问题，也被列入了“中国 21 世纪议程”。

在这一点上，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却做得好，日本地少人多，物质的丰富程度很高，汽车工业在全世界名列前茅。然而，汽车大国的日本人，平时却常以电车和地铁代步，甚或以步当车，因为他们深知汽车尾气对大气污染的可怕。

从这一点便可以看出，日本是个特别重视环保的国家，而且爱护环境是从每一个日本人的自身开始做起的。日本人普遍认为，环保与经济发展必须同步，不然在产出成果的同时，也产出了灾难，世界上第一可宝贵的人，在创造财富的同时，还会被各种可怕的污染所吞噬。人口与环境是互相依存、密不可分的，发展经济、创造财富的同时，绝不可以把人类环境变成一个垃圾场抑或是一个地狱。

所以，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可谓任重而道远，不会一蹴而就。

现任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的曲格平教授，那时还是国家环保局局长，李鹏当时是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的主任，也是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环保。

李鹏那时一个星期让曲格平教授去好几次，由曲格平教授向李鹏介绍环境保护的情况。曲格平教授是当老师的，李鹏是当学生的。

曲格平教授讲环保情况，李鹏在那儿很认真地拿个本本记。

最可贵的是李鹏这个当学生的从不应付，总想弄明白环保是怎么回事。

每次开有关环保会议之前，李鹏都要事先向曲格平教授问清楚背景和要解决什么问题，先知之而后治之。李鹏是水电工程师出身，工作作风还是很认真很朴实的。

1989年4月对日，李鹏在纪念“地球日”20周年时，做了以《全球环境面临挑战，需要各国共同努力》为题的电视讲话。

李鹏在讲话中说：地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为人类社会的文明和进步提供了适宜的空间和丰富的自然资源。遗憾的是，人们的某些活动对地球造成了很大程度的损害，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安全。

李鹏在讲话中还回顾了“地球日”的历史，说：为引起公众对这一问题的警觉，1970年4月22日发起的“地球日”活动，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规模宏大的群众性环境保护运动，它的诞生和影响有力地推动了环境保护事业的蓬勃发展。2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面对着环境问题的挑战，并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合作，共同努力为解决这些问题扫清障碍。地球不但是我们当代人的，也是后代人的。我们都希望为后代创造出和平。清洁的生活与劳动环境。当今，我们管理地球的能力决定了我们共同的未来，而采取的一致行动的基础则取决于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认识。我希望通过“地球日”活动使这方面的认识能够进一步接近。

李鹏确实认为环境保护是一个很重大的课题，这是李鹏给曲格平教授的第一印象。李鹏对环境保护真有一份感情。

他一抓，把环委会弄得很是像样，有声有色的，大家因此都很羡慕，各个部门都要求参加，可李鹏说不行，不增加人了。

李鹏对环保这项工作确实很重视，用了不少心思。

1989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但是时任总理的李鹏却在1989年这个多事之秋的一年间，就中国的环保问题，做了四次很重要的讲话。

在1989年5月1日，李鹏在第三次环境保护会议上说：我们面临环境污染蔓延和生态环境恶化的形势是严重严峻的。环境保护的任务是艰巨的。如果我们不在控制污染、保护生态方面给予足够的重视，不付出极大的努力，那么多年来经济发展取得的成果，很可能被日益恶化的环境污染所抵消。我在七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环境保护是我国一项基本国策。在治理整顿中，要切实加强对环境保护工作的领导，采取坚决措施，控制环境污染的发展。

1989年6月4日之前，也就是6月3日，李鹏在纪念“6.5”世界环境日的前夕，很高兴地接受了国际“共同未来中心”执行主任林德纳先生的邀请，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就共同关心的全球环境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李鹏说：全球气候变暖是人类面临的挑战。阻止这种趋势的发展，需靠众多国家乃至全球共同努力。值得高兴的是：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一方面的认识已越来越接近。中国，作为世界大家庭的一员，将始终不渝地履行自己的义务，但是我认为世界上发达国家对环境问题应负更大的责任和义务。我相信，世界各国的政治家、科学家和人民大众为了人类共同的未来，通过国际间广泛的合作，会找到有效地防止全球环境恶化的途径。人类的前景是光明的。

李鹏在 1989 年 6 月 3 日的这一次电视讲话中，还着重谈到了有关中国的环境问题，李鹏说：中国是个拥有 11 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人均资源并不丰富，环境压力很大。

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环境资源条件对于经济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我国政府已将环境保护列为一项基本国策，确定了环境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方针，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保护环境的法规、政策和措施，正在为改善我国的环境状况进行不懈的努力。

1989 年 9 月 1 日，李鹏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力排众议地为国家环保局保驾，强调说：环境保护是综合性的事业，国务院既然设立了国家环保局，而其他部门又不能替代，说明有设立的必要，就要承认它的作用和地位。环保部门对全国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也好，或综合监督也好，总之是国务院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主管机关。当然，具体工作要靠大家去做。

在谈到对环境问题的治理时，李鹏又狠下决心地说：现在如果对环境保护要求太高，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一下子办不到。而污染严重的状况又不能不管，不能不重视，不能任其发展下去。我们要对子孙后代负责。如果环境污染了，罪莫大焉！

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关系，尺度不好掌握，但对有些事情态度要坚决。如不准生产“滴滴涕”、“六六六”，给农药的使用带来困难，要靠进口，在这方面我们是下了大决心的。像一个小造纸厂就污染一条河，不下决心不行。

谈到具体治理方法和一些分歧问题时，李鹏拍板说：“三同时”还得要，新建项目要按照环境标准要求办事，“谁污染，谁治理”对污染者是个约束，还是好办法，排污费适当要集中一下，集中使用效益好，集中起来每年可以办几件环保方面的事。对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些短期行为要有个约束，依法管理。环境标准的制定要切合实际，地方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地方标准，有的地方对中央企业要求严格，对自己所属企业要求松，其实还是自己首先受害。

最后，李鹏对大气污染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对于控制大气污染，解决的好办法是煤气化，更好的办法是用电。但是，我们现在还不可能做到，还得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现在的办法是要靠烧型煤，有条件的地方再发展一些煤气、天然气，把低硫煤运给大城市用，电厂烧低硫煤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事实上，李鹏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据不完全统计，从 1989 年始，到 1996 年止，李鹏对中国的环境问题所做的有权威性的讲话和报告竟达 26 次（篇），这还不算具体所做的没有记录在案的一些讲话、指示等等，笔者看来，这在中国的领导人中是罕见的，也是绝无仅有的。

难怪那天曲格平教授很深情地告诉笔者说：李鹏总理和我在一起交往多年，见了面从来都不谈别的，总是只有一个话题，谈环境保护！

当笔者听曲格平教授谈到 1989 年的李鹏总理，那时他对中国的环境保护就如此热心，如此重视，如此煞费力气，不免有些激动，很想对人们说点什么，却又不好措辞，只好打住笔姑且作罢。

相信历史是一面公正的镜子，时间是一种最好的卸妆油，随着时空的逐渐消逝和物化，历史自会揩尽一切外在的戏剧化的油彩，还人们以一个真

实的面孔。

只有真实的东西，才可以永存，才可以不朽。

淮河原定 1997 年变清

李鹏多次说过，不能就这么说说就完了，一定得要治，得要有个结果，得回答这个问题，由宋健同志负责这个事情，一抓到底，一定要让淮河变清！

李鹏不仅对中国的环境保护十分关注，对整个世界的环发展也予以了应有的关注。1991 年 8 月 12 日，在中南海紫光阁，他会见了在北京出席“发展中国家与国际环境法研讨会”的中外代表和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托尔巴博士。

在会见时他说：此次会议及今年 6 月在北京召开的关于“环境与发展”的发展中国家部长级会议都将对推动发展中国家乃至国际上的环境保护工作产生积极的影响。希望这次研讨会能取得成功。

李鹏还说：环境污染是没有国界的，世界各国就此进行合作非常重要。发展中国家搞好本国的环境固然自己要作出很大的努力，但发达国家也应责无旁贷地予以支持和帮助。在环境保护方面，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与需要应得到发达国家的理解和照顾。只要各国对环境保护持积极态度，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制订出关于环境保护的国际法律文件是完全可能的。

1992 年 6 月 3 日至 14 日，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环境与发展大会，183 个国家派代表团，102 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了会议，这是联合国成立以来历史上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次会议。

李鹏率有 60 多人组成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了会议。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为会议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会前，为协调立场，邀请 41 个发展中国家的部长在北京举行了会议，发表了著名的《北京宣言》，阐明了对世界环境问题的立场和主张，在国际社会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李鹏在发展中国家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有着十分相近的经济背景和发展要求，在解决全球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进程中，可以互相借鉴、加强合作，为谋求全人类协调一致的行动，发挥重要的影响和积极的作用。今天，我们聚会在这里讨论全球的环境与发展问题，集思广益，目的就在于找到一条保持地球生态系统平衡和实现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

李鹏说：目前，我们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双重任务。许多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贫困和落后状态，他们低价出售原料，高价买进工业制成品，财富继续向发达国家流动和积累，资源被大量消耗，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因此，只有改变不合理的经济秩序，消除贫困，促进发展，发展中国家才能保护自己的环境，又能更好地参与全球环保合作。我们发展中国家必须走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不要重蹈历史上某些发达国家为实现工业化而不顾生态环境的覆辙，尽量做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广大发展中国家曾经为人类文明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在正为摆脱贫困、改善环境而艰苦奋斗，表现出对人类共同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我们召开这次会议，就是这一精神的集中体现。

由于中国在会前做了大量工作，所以在环发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与

“七十七国集团”密切合作，以七十七加一的方式共同提出决议草案，成为会议上南北谈判的基础文件。当会议争执不下时，谈判处于僵局的关键时刻，中国及时的发挥了协调和推动的作用。

1992年6月12日李鹏在联合国环发大会上作了以《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加强合作》为题的讲话，讲话中提出了在《北京宣言》就已经提出的五项主张：

一、经济发展必须和环境保护相协调。经济发展不仅是人类自身生存和进步所必需，也是保护地球环境的物质保证。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是其首要任务。二、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是各国的共同任务，发达国家负有主要责任。三、加强国际合作要以尊重国家主权为基础。国家不论大小、贫富和强弱都有权平等参与环境与发展领域的国际事务。解决全球环境与发展问题，必须在尊重各国独立和主权的基础上进行。四、促进发展和保护环境都离不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战争和动乱不但造成生命、财产损失，而且是对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五、处理环境问题应当兼顾各国现实的实际利益和世界的长远利益。当前，在重视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等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同时，特别需要优先考虑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环境污染和水土流失、沙漠化、植被减少、水旱灾害等生态破坏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不但可以消除对发展中国家环境与发展的严重威胁，而且对推进全球环境与发展有重要意义，国际社会应当理解和支持发展中国家在这些问题上的合理要求。

除此而外，中国代表团在会议期间还参加了美、欧、日和“七十七国集团”代表的小型协商会议，倡导求同存异，推动在资金、技术转让等重大问题上达成协议。

中国为环发大会的成功发挥了自己独特的作用，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好评。

这次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时任国家环保局局长的曲格平教授，光荣地被授予联合国环境大奖，这是目前国际领域中最高的奖赏。

李鹏和宋健国务委员，以及各位部长与随团的成员们，在会上和会后都向曲格平教授表示了热情洋溢的祝贺。

中国环境大政方针的成熟，包括理顺体制等等，都是在李鹏执政期间，逐步落实，一一完成的。

所以曲格平教授认为，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所以能做出些成绩，做出些特色，跟李鹏领导有方和对环境保护的重视是分不开的。

1993年10月8日晚上7点钟，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了李风采制的三条有关河南境内小黑河小洪河被污染，当地群众深受其害的连续报道。

曲格平告诉我们，国家环保局还没来得及向国务院打报告，国务院就来电话通知负责人开会。说是国务院总理李鹏看了新闻联播播出的小黑河的报道后大大为之震惊，立刻就找人了解情况，并很快就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国务院会议进行研究。

在会上，李鹏神色显得很沉重，很不安。

李鹏问大家说：河南上蔡县小黑河污染的那条新闻大家一定看过了，这件事情曝光了，大家看怎么办？

大家都说：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应该下决心治理！

李鹏又问：这种事存在不存在？有没有像他们说的那么严重？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实际上比那还要严重！

李鹏听了，神情就显得更加严峻，更加沉重，说：污染情况如此严重，绝不能听之任之，一定要下决心治理！

谈到这里时，曲格平教授如是评价说：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一个记者曝光，引起国务院总理的重视，亲自开国务院会议研究，研究了还不是一次，而是研究了几次。研究完了还不算，还要一抓到底。并定出一定的期限，责成宋健负责这个事情。这确实是很少见的。

曲格平教授还这样以强调性的语气告诉笔者说：李鹏总理多次说过，不能就这么说说就完了，一定得要治，得要有个结果，得回答这个问题，由宋健同志负责这个事情，一抓到底，一定要让淮河变清！

曲格平教授为此很激动地说起宋健，说宋健为这个事情去淮河调查，前前后后一共去了九次，九次呀，一个国务委员，副总理一级的高官，能这么做，这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宋健和国家环保局的领导同志一起以及地方政府的官员，九次到淮河实地调查研究，并和众多的专家学者们共同研讨磋商，用好几个月的时间，才做出了一个治理淮河污染的规划报告，并向国务院做了汇报。

国务院总理李鹏亲自主持会议，亲自听了汇报，经研究后，一致做出决定：1997年要让淮河变清！

至此我才明白，淮河治污行动的缘起，竟然是由一名不见经传的小记者李风发端，国务院总理李鹏亲自过问，国务委员、国务院办主任宋健一手主抓并身体力行，由此可见，当年李风所采制的那三条新闻报道，确实使世人瞠目，令朝野震惊了。

那么，接下来又会怎么样呢？

绝对新闻内幕

曲格平教授如是说：在国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处在我们这么个历史阶段，还要来治理这么大一条河流。要是到2000年淮河真的变清，那就不仅仅是中国的奇迹，也是一个世界性的奇迹，英国伦敦的泰晤士河那么小的一条河流，还用了十几年的工夫，才治理好！

1992年全国环境保护厅局长会议在北京召开，李鹏在百忙中特地抽时间接见了与会的全体代表，并讲了话，李鹏说：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环境保护工作，把它作为一项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把“加强环境保护”作为叨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充分表明了环境保护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重要地位。在经济发展中，要十分重视环境保护。不但不要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而且还要进一步改善环境质量，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这是至关重要的。

李鹏在讲话中还有意提到了曲格平教授，李鹏这样说道：曲格平同志从事环保工作已经多年，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国家环保局和全环保战线的广大干部和职工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此，我谨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环保战线的同志们表示亲切的慰问！

通过这一段讲话，也许多少可以弄明白李鹏对环保的良苦用心，以及曲格平教授和环保战线的一些同志，何以对李鹏很有感情的缘由了。

本次笔者逡巡于淮河流域达 20 天左右，接触了环保战线的许多名同志，这些同志胆壮气豪，对淮河 2000 年变清寄予希望的原因，便是都知道 2000 年淮河变清的行动，是李鹏亲自过问的事，都知道在淮河治理问题上，国务院与淮河流域和淮河人民站在同一个战壕里的，而后台就是李鹏。

那天，曲格平教授还告诉笔者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1997 年淮河要变清的决定做出后，当时这个消息由新闻媒体发布出去。李鹏做事一向是很虚心的。所以，有一天李鹏遇见曲格平，问曲格平说：我们做了个决定，九七年让淮河变清，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看怎么样？能办到吗？

曲格平教授说：这件事你做得非常好，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你这么重视环保，真是很难得很难得，但是 1997 年淮河变清，恐怕做不到……

李鹏问曲格平：为什么做不到？

曲格平跟李鹏据实讲了理由。

李鹏把曲格平的意见带了回去，跟国家环保局的同志讲：我们专家曲格平教授同志认为九七年淮河变清是做不到的。你们认为他的意见对吗？

环保局就讲，他讲得是对的，是做不到！

李鹏当即就说：那不行，你们既然做不到，我们国务院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做这样的决定，虽然大家心里都着急，想着越快越好，可是做不到也不行呀，说了做不到，岂不是失信于民吗？

环保局的同志面面相觑，李鹏见了，缓缓口气问：如果我们大家实事求是，积极地去，你们看要到什么时候？

环保局说：得到 2000 年。

于是就重新做了决定，淮河到 2000 年变清。

做出这个决定后，李鹏又一次遇到曲格平，很高兴地告诉曲格平说：我们已经改啦，2000 年变清，你看怎么样？

曲格平说非常感谢，我们的国务院真是人民的政府，倾听人民的呼声，民主的呼声，为人民做事情，真是人民政府为人民！

李鹏不听曲格平说这些，逼着曲格平表态，说：干什么呀，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说到底做到做不到？

曲格平教授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努力去做就是，变清这个词的伸缩性很大，每个人对变清的认识都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变清的提法还是站得住脚的。实际上变清的概念最低得是二三级水才算是基本上变清，可以用了。这样比较困难。

见李鹏沉吟不语，曲格平赶紧又道：不过也是有可能的，我们努力去做就是了，既然已经这样决定了，这一回你千万可别再改了。

曲格平教授为此很感慨地说：治理淮河污染这样的问题，要是没有国务院的重视，采取一些断然的措施，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不理你，你一点办法也没有！

接着，曲格平教授又不无遗憾地道：现在对治理淮河的行动宣传不够，在中国这么一个国力的情况下，治理这么一个大江大河，花这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应该说已经超出了我们国家现在的能力。任何一个国家处在这么一个阶段，从事这么大一个工程，都下不了这个决心，中国能够下这样的决心，真是很了不起的。

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李鹏一以贯之的环境思想就是这样的，他

深知这一点并早就指出：“经济的增长，社会的发展，不仅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还取决于环境、资源的支撑能力。”

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保护环境，保护资源，就是保护生产力，就是保护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保护河流，保护水源，就是保护人类生命的源泉，保护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保护人类生态环境的要素。

曲格平教授还说：我跟国家环保局的局长解振华讲，你们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第一期工程花了50多个亿，第二期工程又要花60多个亿，这种决心，非同一般。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大的事情，应该给予足够的评价。

曲格平教授最后这样表达了他对中国政府淮河行动的无限赞许，他说：要是在国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处在我们这么个非常的历史阶段，还要来治理这么大一一条河流。要是到2000年淮河真的变清，那就不仅仅是中国的奇迹，也是一个世界性的奇迹，泰晤士河那么小一条河流，还用了十几年的工夫，才治理好！

笔者以为，抛开别的不讲，李鹏在中国环保事业的金字塔上，所精心构筑的这几块巨大的实实在在的金色砖石，已经足以使其成为一段至关重要的塔身，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成为一页不可或缺的历史了。

追踪潘朵拉

永远都不要去碰它或是走近这只盒子吧，就让它静静地躺在我们中心广场绿色的草坪上，让我们每天在阳光下或是花前月下漫步时从远处悄悄地看着它，小声地议论它，大胆地猜想它，无限地延续它，才能永远地怀疑它。

有这样一个传说，说是很早很早以前，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没有战争也没有暴力，没有疾病也没有瘟疫，没有痛苦也没有忧愁，没有饥饿也没有贫穷，没有衰老也没有死亡；到处是鲜花盛开的山谷，到处是绿草如茵的草地，到处是清澈美丽的河流，到处是结甘甜果子的佳木，充满着富足和祥和，幸福和安康，欢声和笑语，所有的人们，都过着健康长寿，福乐无疆，无忧无虑的生活。

有一个叫潘朵拉的邪恶的魔国小姐，她嫉妒人类幸福的生活，就从一个什么无人注意的小角落里钻了出来，跑到人群中，把一个魔盒交给了正在锦绣大地上嬉戏的男人和女人们，然后就化作一缕青烟飞上天去，在那儿静静地观赏着地上那些好奇的人们的表情，脸上挂着诡秘而险恶的神情，幸灾乐祸地望着地上那些快乐的芸芸众生，讥讽地大声说：喂，快乐的人们，你们已经快乐得太过久长了。在你们的身上所有的品质中，有一种品质是你们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你们与生俱有的好奇和好奇引发出的怀疑。你们难道不想知道盒子里装着什么吗？你们使劲好奇吧，使劲怀疑吧，你们还犹豫什么呢？你们的好奇和怀疑是打开魔盒的惟一的钥匙，快打开那只盒子吧，里边装着我苦心炮制的送给你们这些富乐无疆的人类的最好的礼物！

可惜的是地面那些好奇的人们，并没有谁的耳朵听见那位邪恶的魔国小姐潘朵拉在空中的自言自语，如果这时有一个人竖起耳朵来倾听，马上就会听清潘朵拉的警告，只须劝告人们不要好奇，不要怀疑，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将那个盒子永远埋藏起来，也就不会引发即将生发的可怕的人类灾难了。

但是那时的人类光顾了享受幸福和快乐，竟然没有任何一个人有兴趣

竖起自己耳朵来倾听一下来自天上的警告，人们一个个被好奇心折磨得体无完肤，争先恐后地围观那只盒子，一心一意地想要知道盒子里装的是什么，每一个快乐的人类的神情都充满了好奇和怀疑，围着那只盒子反复地打量、猜想。

捻着长须的智者问大家也问自己说：喂，你们知道这只盒子里装着什么吗？

幸福的女人好奇地猜想道：也许里边装着一些好吃的果子，是一种我们从来没有品尝过的美味的果子，这是造化特意送给我们的又一个重大的礼物！

快乐的男人怀疑地摇着头，微笑地望着女人的眼睛说：也许里边装着一罐蜂蜜和一些蜚人的野蜂，是哪一个幸福的女人想要捉弄我们这些快乐的男人吧！

活泼可爱的小男孩和小女孩们，好奇心最重，他们聚在一起跳着闹着要马上打开那只美丽的盒子，他们笑着缠着他们的父母吵吵嚷嚷地说：爹呀，娘呀，里边一定是什么好玩的东西！一定是好吃的东西！你们快点给我们打开它吧！我们多么想马上就看到它们！如果是好吃的东西，让我们大家分着一人吃一份，如果是好玩的东西，我们要一起拿去玩耍。我们这些快乐的孩子，还想再多一些快乐！

美丽动人的大女孩们则优雅着一份美丽和动人，虽然好奇心诱发了她们许多玫瑰色的绮丽多姿的幻想，但是她们却不肯明明白白地表露，而是在用各自如阳光一样明媚的秋波去鼓励身边那些快乐的大男孩们，似乎在对自己的心上人无声的甜言蜜语，说：哦，亲爱的，你有多么的雄健，有多么的聪明呀！你一定会明白，我现在是多么想立刻知道这只漂亮的盒子里装着一些什么！为了我，你快点打开它吧！

快乐的大男孩们即刻就明白了大女孩们的心思，争先恐后地冲向前去，想要打开那只盒子，可是却被富乐无疆享有很大权威的智者伸手拦住了。

智者摇着智者的头颅，望着人们的眼睛，说：幸福的男人和快乐的女人，让我们不要太快的结束我们这种特殊的快乐和幸福吧！多少年以来，我们生活在快乐和幸福的世界，我们对这个世界已经太过熟悉，以至于这个世界上能让我们感到好奇的东西越来越少，而好奇是一件我们让人类觉得太好玩的乐此不疲的事情，能使我们从中感到一份最大的满足。所以我们还是不要过早地结束这种我们已经久违了的好奇的游戏吧！如果我们现在马上打开了这只盒子，知道了里边装着一些什么，那么我们的好奇即刻就会消失得干干净净！永远都不要去碰它或是走近这只盒子吧，就让它静静地躺在我们中心广场绿色的草坪上，让我们每天在阳光下或是花前月下漫步时，从远处悄悄地看着它，小声地议论它，大胆地猜想它。只有无限地延续它形式的存在，才能永远地怀疑它内容的不详。只有这样，这种与我们人类久违了的好奇带给我们满足感才会永远地存在下去；只有这样，这件太好玩太快乐太幸福的事情，才会尽可能长久地延续下去！

智者充满伟大智慧的话语，博得了大家异口同声的热烈喝彩，投花瓣表决的结果，证明无一票反对，幸福的女人们和快乐的男人们，全体通过了智者的提议。

于是智者昂着智慧的头颅，迈着智慧的脚步，率先离开那只美丽的盒子，让那只黑色的布满金色花纹的古色古香的漂亮的盒子，独自躺在阳光灿

烂的绿色的草坪上，像一个永远也猜不透的黑色的谜语，将人们的好奇永远地留在那里了。

随着智者的离开，那些好奇的男人和女人，也都怀揣着自己的那一份好奇，纷纷云奔星散，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好奇带给他们的那一份久违了的满足。

男人们拥抱着自己心爱的女人，女人们依偎着自己心爱的男人，搀扶着散漫地走去，去寻找梦中各自的那一份太快乐太幸福的好奇，这份人类的好奇因为被永远关上了那只永远也不会打开的潘朵拉的盒子，所以永远也不会有结束的时候了。

那个邪恶的从天上望着人间的潘朵拉大失所望，她忧郁的盯着那个躺在月光下的那株智慧之树下准备入睡的智者，智者正在安详地吞吃着一枚红色的智慧之果充做夜宵，以补充他白昼消耗掉的超人的智慧，白胡子上染满红色的浆汁。

邪恶的也是可怜的觉得自己做错了事的魔女在月色亮光的夜空中叹着气对自己说：哦，智者，我不该低估你的智慧，是你的慧眼看穿了我的诡计，是你的大聪明挫败了我的小阴谋。正因为有了你大智慧的维护，才使你们这个幸福快乐的世界没有遭到我的残害，你的智慧竟然轻而易举地战胜了我的魔法，连我这个法力通天的魔女也不得不对你甘拜下风。有了你智慧的存在，便没有了我潘朵拉的立足之地。

久久沉吟不语的潘朵拉，因为久久的沉吟不语，神情显得不那么邪恶了，忧伤悔恨的潘朵拉，由于忧伤和悔恨，面貌变得不那么可憎了。于是，不那么邪恶不那么可憎的潘朵拉，在月色如花星光如玉的夜空中突然显出一种惊人的美丽。

然而，最终潘朵拉却发现，打开那只盒子的，恰恰是那个智者。

从此之后，人类的苦难便开始，人类对潘朵拉的追踪也开始了。

七、朱镕基真抓实干

埋共苦干的朱镕基气壮山河
想来，当年迎接朱镕基市长的，不是一位做
淑女状的秀丽清亮的苏州河，而是这样一条蓬头
垢面，衣衫褴褛，臭哄哄的，肮脏的，皮蛋妹式的
苏州河。

现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是一位在中国社会和国际社会相当富有个人魅力的学者型的中国领导人，也是一个在中国民间社会相当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在中国各阶层人们的直观印象里，朱镕基总理首先是中国第一高等学府清华大学一位具有真才实学的教授，其次才轮到是上海市的市长、上海市的市委书记、国务院的副总理、总理等等职务。

这是一个不论官职只讲真才实学的民间自由组合的序列。

这个序列中的人们普遍认为，朱镕基总理是个干实事的人，也是一个

不怕丢官的人，他丢了官还可以去教书，不像别的一些官员，除了当官便什么也不会做了。

尤其是那一番气壮山河的“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要义无反顾，死而后已”的陈辞之后，使朱镕基成了一位使全世界为之瞩目的中国领导人。

在中国社会的各阶层的视线里，尤其是平民百姓的眼里，朱镕基不再是一位国务院总理，而成了一个可望振兴中华的民族英雄、传奇人物。

12亿双热切而信赖的眼睛，默默而企盼地注视着教授的朱镕基，总理的朱镕基，希望他真的能教授社会，打理中国，重振中华昔日之雄风。

老百姓希望中国能够再现历史盛景——山明水秀，鸟语花香，空气清新；烽烟不起，海晏河清；路无拾遗，夜不闭户，人民安居乐业。

让平民们知礼仪，使官员们识廉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化繁荣昌盛，经济良性发展，人人食有余而衣无忧，个个居有定所，学有所用，老有所为。

据有关方面透露，朱镕基是一位不尚空谈的总理，上台伊始，便给自己和幕僚们约法三章，不许做这不许做那，总之一切浮奢靡费的事情，都不许去做。

那么，他到底想做些什么事？这是人们那时都想知道，现在已经知道的，不说也罢。朱镕基还可能做些什么事？对什么事会感兴趣？这大约是人们不了解的。

曲格平与朱镕基在一起工作过多年，很了解朱镕基的为人。

曲格平告诉笔者说：朱镕基总理对环保是很重视的！

朱镕基在国家经委当副主任时，还兼着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的副主任，李鹏是主任，在每一次有关环保的会议上，朱镕基都会发表一些独到的见解。

当时的环保局只要一有什么需要开会讨论的问题，都要事前找到朱镕基，先和朱镕基商量好，然后借朱镕基的嘴巴来提出要讨论的问题，而朱镕基每回都不负众望，总是能把问题讲得很深很透很到位很有说服力，而且往往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朱镕基到上海后，实实在在地抓了几件事，一是抓了黄浦江工业区的污染治理，二是做了苏州河生活污水的处理。

黄浦江是上海市的主要饮用水源，可是上海市每天有500万吨污水排入黄浦江中，然后再抽回来做饮用水，这么脏的水，不论你怎么处理，水质都不会好到哪儿去。

黄浦江能否变好，关系着千百万上海人民的生命安全。

朱镕基对此极为重视，上任伊始，就首先提出了如何解决上海市饮水问题。

朱镕基首先提出，饮水口附近的江水污染严重，不能再取水，必须将饮水口迁移向上游，上游离上海市远一些，工厂相应的少，污染也少，水质较下游明显要好得多，做饮用水是没有问题的。

当时也有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上游也有工厂，只是较下游少而已，如果将饮用水的取水口上移，工程大，耗资费时，而且，还没等你将新的取水口建好，恐怕沿途就会有一大批工厂已经建好，在那里等着你，就等着污染你的新水源了。

针对这个情况，朱镕基沿江做了实际勘查工作，科学地划定了沿江一些区域为不允许建任何工厂的净化区，而且断然地毫不吝惜毫不通融地下了死命令，新取水口附近正在建的工厂立刻下马，已经建的工厂即时迁移，准备筹建的工厂一律取消。全部作废，千方百计，确保新的取水口和饮用水源的清洁。

上海是中国最大一座城市，也是一座市面最繁华的城市，自然也是一座见多识广的骄傲的城市，从来都不屑于大惊小怪，但是这件事却感动了整座上海市。

温文尔雅的上海人也会骂娘，
这个人情如果至今还不还上，就是有失公道，有失厚道，上海人虽然矜持着一份温良恭俭让的德行，想来仍然是不会心里乐意吃脏水的，虽然不会大骂出口，仍然是会悄悄骂娘的，这一点料来是断不会错的。

我有一位朋友是上海人，他说上海人每天喝脏水，那种脏东西的摄入量，据统计，相当于一个人每天摄入两坨屎，而且这屎巴概是自己拉的……几乎每回见面他都一边使劲喝水，一边使劲说话，每回都说得我大皱其眉，恶心不已。

所以，我能想象，当我的那位朋友，当饮用污水达数十年之久的上海市千百万居民，终于喝到新的清洁的饮用水时，那种感激和喜悦的心情可想而知。

在我的零零碎碎的直接和间接的印象里，黄浦江是一条像上海小伙也似有款有样的江，苏州河是一条秀丽清亮如上海姑娘一样阿拉白相的河。

男性的黄浦江似乎被污染得只是内里的自己，有点像一个藏了满肚子龌龊心思和脏话臭话的拆烂污的三流小开，还油头粉面着一个表面的风光，明显着一身有款有样的衣裳，吃不得用不得，却还算看得过去。

从来都做淑女状的秀丽的苏州河却让做上海之行的我，大大的失望了一番，印象中那么一条秀丽清亮的淑女般的河流，沦落成一个臭烘烘的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浑身上下流脓生疮的皮蛋妹的可怜模样——那些个每日清早从各自家中拿一只描金的红漆马桶和一把小刷子，在苏州河边刷刷刷的操作一番的上海市民，真的就把一条清亮了一千年的苏州河弄成了一条屎巴糞河了吗？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想来，当年迎接朱镕基的，不是一位淑女状的秀丽清亮的苏州河，而是这样一条臭烘烘的肮脏的皮蛋妹式的苏州河。

面对如此挑战，主政上海市的朱镕基，当年都做了些什么呢？

朱镕基在上海市当市长时，下定决心要治理苏州河。

历史的苏州河流淌了足有上千年，苏州河两岸的居民也在苏州河里边，痛痛快快地洗了上千年的金漆马桶，可是当年上海的苏州河却并没有怎么脏，苏州河是在解放以后，才慢慢脏成这个样子的，其原因是什么呢？

苏州河之所以由淑女变成皮蛋妹，一是因为城市人口的膨胀和城市污水的大幅度增加，更主要的是大量的工业废水的倾注，使河流的自净能力相对与时俱弱，污水越多河流的自净能力越弱，以至完全丧失，最终成为一条臭河。

要想使苏州河起死回生，惟一的办法是截流，截住每一条向苏州河继

续排污的污水管道，截断每一个对苏州河构成威胁的污染源，给濒危垂死陷人深度昏迷的苏州河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息环境，让它靠自然的潜在的体能，慢慢苏醒过来，恢复淑女般优雅的往日韵致和一以贯之的秀丽娇人的模样，还上海人一个人情和一个公道。

上海是一座工业城市，一段时期，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以购买上海货为购物的标准，以穿上海的服装使用上海的商品为荣，却很少有人注意到上海是一个利税大户，每年给国家上交的利润都在国民经济中占相当大的比重，上海在忘我地为国家做贡献的同时却把自己污染了，这就使全国人民和国家都欠了上海人很大一个人情。

这个人情如果至今还不还上，就是有失公道，有失厚道，上海人虽然矜持着一份温良恭俭让的德行，想来仍然是不会心里乐意吃脏水的，虽然不会大骂出口，仍然是会悄悄骂娘的，这一点料来是断不会错的。

朱镕基自然明白这一点，便一心一意要给上海人还这个欠久了的人情，排除万难也要还上海人一个似乎已经久违了的公道。

然而，截流沿河数以万计的大大小的污水管，等于结扎了上海市这座大城市的排泄系统和泌尿系统，一座不能大小便的城市，等待着它的只能是瘫痪和死亡。

唯一的办法不是堵截而是导泄，要想彻底根治污染，就得给它重新建造一个排泄的通道，经过污水处理厂达标处理之后，直接排入大海之中。于是，为了使上海市的排污改道，吴淞口工程便排除万难，正式上马了。

这是个十分浩大的排污系统工程，至今这个吴淞口工程已经耗资 16 个亿，到朱镕基离开上海市，到国务院当副总理、总理的今天，吴淞口的工程仍然还没有完工，仍然还在不断地克服着各种各样的困难，日以继夜地全力赶工。

相信这个工程的竣工之日，也就是苏州河的变清之时。

朱镕基真抓实干

他不喜欢让人当面称赞，更不喜欢传媒的廉价颂扬和吹捧，他只想珍惜自己的机会，义无反顾地，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努力的实实在在的为中国做点事，至于等待着他的是成功还是失败，是褒扬还是低毁，他已全不放在心上了。

朱镕基在上海市工作期间还特别强调工厂的技术改造，要求所有的工厂都对有害环境的工艺和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加大在环境方面的资金投入，要求在增产增收的同时，不断减少对环境的污染，逐步地从根本上遏止环境的持续性恶化。

如果说前者是治标，那么，后者便是治本了。

这一标本兼治的深刻明锐的思想，在作为一位学者型现代化领导人朱镕基身上，在他近年来的施政期间，一以贯之的得到了充分体现，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环境和中国人民的一大幸事。

在笔者撰写此书期间，曲格平教授十分欣悦地告诉笔者：朱镕基刚当总理这些天可谓是日理万机，可以说是忙得焦头烂额，可也没有忘了环境保护这回事。

昨天朱镕基总理专门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了生态环境规划，还不让通报。

朱镕基总理说：别的我管不了，我的活动不能报。

没有任何的官样文章，没有电视报道，只是在《人民日报》登了一则消息。

曲格平教授说：这个事情真是值得称赞一番，他刚上来，万事刚开头，首先就抓的是环境保护这件事情，他认为环境的问题关系到全局，关系到长远，不抓是不行的。他对工作的轻重缓急从来都是分得很清楚的，他能够这么做，可见他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有多么大，这真是值得称赞一番！

笔者也认为朱镕基总理这一举措，真是值得人们好好称赞一番，但是作为清华大学的一名毕业生，作为有着教授头衔的朱镕基，却有着几分学者的矜持或曰清高，也许他从来就认为做好事是不必要人称赞的，如果要人称赞那就透着浅薄了。

他不喜欢让人当面称赞，更不喜欢传媒的廉价的颂扬和吹捧，他只想珍惜自己的机会，义无反顾地，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努力的实实在在的为中国做点事，至于等待着他的是成功还是失败，是褒扬还是低毁，他已全不放在心上了。

近些年来，时下人贪得无厌的攫取自然财富，污染自然环境，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做法，好像欠上海人一个人情和一个公道那样，我们也欠下了子孙后代一个不还不行的人情，欠下了自然环境一个不能不还的公道。

如同朱镕基当年在上海市当市长一样，还上海人一份人情和一个公道，作为时下人的我们，也必须群策群力，万众一心，团结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与朱镕基总理一起，共同努力，还自然环境一个久违了的公道和一个天地无垢的清白，还后代子孙一份欠久了的人情和一份长者应有的慈爱和厚道。

如果要我来称赞他，便称赞他在环境保护事业上行为的果敢和思想的敏锐，称赞他不尚空谈只做实事的风范。

前不久，笔者采访了国家环保总局的解振华局长，他在谈到朱镕基总理时说：前几天温家宝副总理还代表朱镕基总理来国家环保局，传达国务院的一些新要求。

朱镕基总理主持国务院第三次常务会议，研究的就是中国的生态环境建设规划，提出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是本届政府的重大任务。朱镕基总理还有具体的行动，他一上台就把国家环保局升格了。国务院所属部委减的减，降格的降格，惟有国家环保局升格，这就很能说明问题，说明了朱镕基总理对环保的重视。他把你的规格提高，说明他对环保的决心，把你摆在一个实实在在的位置上，好让你做起事情来更有权威性，更便于执法。

解局长当时还讲了一段国务院的最新指示，另外温家宝还讲到几个目标问题——防治的重点是搞好污染防治，控制污染趋势，改善环境质量，国务院和各地已经确定一批流域、区域和城市的重点治理工程，要切实抓紧实施，确保治理工程按期完成，绝不容许以各种借口拖延治理！这是国务院新的要求，必须要办的。朱镕基对双达标还有一个要求：对于国务院规定的双达标，各地政府要把双达标和三河三湖两区的污染治理，当成环保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坚持目标不变，期限不变，标准不变，任务不变。这是朱镕基总理的要求。

相信已经开头的一些中国环境保护的未竟事业，都将在朱镕基总理执政期间得到继续的完成，相信朱镕基总理所洞见的一些中国环境保护的先天

或是后天的至今还无法克服的弱项和缺憾，都将在他手里得以改观和纠正。

朱镕基总理将使中国的环境从持续恶性的发展中摆脱出来，逐步走向根本上的好转和良性循环。

由中国上一辈领导人开头，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为继的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金字塔，目前正由朱镕基总理真抓实干、积极营造，更加闪闪发光。

八、宋健走进中南海

雪泥鸿爪说宋健

如果当年这位张老师从村里走掉，那么恐怕宋健便会和自己的父母一样是个文盲，至今还在那个小乡村里务农，农忙时伺弄庄稼，农闲时闲话桑麻，中科院里便会少了个控制论的专家，国务院里便会少了个国务委员。

宋健是山东荣城人，于“九·一八”岁杪出生于黄河之滨一户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宋健出生的那个村庄，是旧中国时典型的一个穷乡僻壤。

出生伊始的宋健，睁开眼来，看到温存体贴的一个妇人丰腴的怀抱，看到了一个男子喜得贵子的交织着笑容和愁苦的褐红的脸膛，接着还看到的便是一间飘散着农家特有烟火气味的家徒四壁的破屋，墙上挂着农具，灶里的火焰正欢快地烧燎着一口大锅，黑乎乎的锅里煮着一锅杨、槐、榆树皮和棒子面掺和而成的糙饭，几只大肚子小嘴巴的腌菜罐，果定定地坐在屋子的角落里，守望着宋健这个新的来者。

宋健出生时听到的第一句话竟是：鬼子来了！

这是一句村子里的大人们吓唬不听话的吃奶孩儿的一句魔语，谁家的孩子要是赖在母亲的怀里不肯吃奶，胡乱捣蛋，或是夜里张着小嘴干嚎，哄也哄不睡，做母亲的便会摇着那个孩儿大声吓唬说：快别哭了，再哭，鬼子来了！

宋健从小便是听着这样的魔语长大的。

虽然宋健其时尚幼，不知何为鬼子？只因了父母的闻“鬼”色变，便将大人脸上那种无限惊惧，深深的习染复印在自己小小的身心之中，朦朦胧胧的有些知道，那个叫“鬼子”的东西，是个极恶的物事，是万万惹不得的，这物事不光只吃爱哭的小孩儿，而且连不爱哭的大人也一律是要吃进肚里的，比招来虎狼之类的动物更加可怖可畏，如果真的哭来了“鬼子”，那就大祸临头了。

于是，心里就怕怕的，一头扎进母亲的怀里，屏住声气，学乖不哭。

那时的许多孩儿，都是在这样的恐吓中长大的。

鬼子加上贫穷，一个总是怕怕的，一个总是饥饿的，作为一个小孩儿的日子便很是不好过，只是相比大人的日子，还是要好过许多的。有了一口吃食，大人们总是舍不得吃，先要紧着孩儿吃饱，然后才轮到自己。遇上真的一回鬼子来了，大人们首先要保护的还是孩子，所以大人们的日子，比小

人们的日子更加难过。

小时候的宋健，想来天资很是聪明，至于顽劣与否，宋健却没有提过。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生在贫穷和战乱之中的宋健，照旧会有一个无忧无虑嬉戏玩耍的童年。再苦难的童年也是金色的，因为童年最善于的是忘却，只要有父母的爱与呵护，只要和小伙伴们在—起，顿时便会忘却怕怕的和饥饿的感觉，变得非常非常的快乐和富有，这时那怕啃—口树皮，喝—口凉水，也会觉得十分香甜。

何况，那时处于穷乡僻壤的—个村庄，还没有被现代化的工业污染，烧杀抢掠的三光政策再恶毒，大约也烧不尽乡村中的自然风光吧？想来乡村还—片原生原色原汁原味的山野风光，侵略者燃起的战争的恶焰，大约也顾不及这么—个穷乡僻壤，只是偶尔地伸着贪馋的火舌，凑上去舔个—口两口，舔过了便会走开。

春天毕竟是要来的，夏天也必然不会迟到，走出破屋去，眼里仍然可以看见山是青的，水是绿的，田野风光是秀丽的，自然还是生机勃勃的，也是慷慨大方的。

所以，宋健虽然生于战乱，心里怕怕的，肚里空空的，可是因为童年里有父母的呵护，有自然的抚爱，心灵却是健康的，没有因为战争和贫穷而扭曲。

那个小村庄的人们世代务农，天天每每地面朝黄土背朝天与田地拧眉，跟村里的养的鸡也似的，要靠自己天天在地里刨食，因为主人无米可喂它们。相比果腹的食物便要比精神的食物要重要得多，文化在贫穷的眼里，便成为—种奢侈品。

用宋健自己的话来形容：全村世代无鸿儒，户户近白丁。

更值得庆幸的是，村子里有—个老师，名叫张绍江，在这个穷村里办了一所贫穷的小学，贫穷的是教室，却不是知识。兵荒马乱也不肯离开，坚持不懈地教几十个幼童上完了四年级。试想，如果这位张老师当年走掉，那么恐怕宋健便会和父母—样是个文盲，至今还在那个小乡村里务农，农忙时伺弄庄稼，农闲时闲话桑麻，中科院里便会少了个控制论的专家，国务院里便会少了个国务委员。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占领了华北，山东，胶东各县城镇相继沦陷。日军烧杀抢掠，民不聊生。张绍江老师不得不含泪离开了孩子们，以便回家去照料—家老小。村里的孩子们都无书可读，宋健求知欲正强，像—只饿绿眼的老鼠，每天都四处找书看，没事就翻那几本旧课本看，课文都可以倒背如流。兵荒马乱之际，谁还会想到让孩子们读书呢？宋健整天心里闷闷不乐。

宋健很动情也很感慨地在—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然而，天不忍塞孩子们—隙之明，李琪、林—山等共产党人领导了天福山起义，成立了山东抗日第三军，建立了敌后根据地。浴血抗战之际，他们也未忘让孩子们受教育，责令各地建立完全小学，即小学五六年级和几个战时中学。真是柳暗花明—村，我们又得到机会念完小学五六年级。

我于1944年考入文登荣城威海联合中学。日军扫荡，天天逃难，中学无住所、无教室，全然是一支孩子游

击队。学枪、学炮，还似懂非懂地学了抗日游击战之类的高深课程。1945年德国战败，抗战到了最后阶段，八路军需要知识分子，故解散联中，鼓励从军。我，这个初中一年级尚未念完的小知识分子被分配到八路军东海军分区当护士。日本投降前夕，又逢精兵简政，一批十三四岁的小八路被精减了，派往刚从日军手里收复的威海市，进威海第一中学续读。

1946年春，风云又变。国共战争有即发之势，同学们又纷纷从军。时年五月，我14岁，成为八路军的一名勤务兵。有幸遇到一位可敬的首长、威海市市长兼卫戍区司令员于洲（1904 - 1979）。他是山东著名的教育家，30年代毕业于北平师范。回山东后办师范学校并任校长。抗战爆发，他成了胶东抗战领导人之一。我酷爱读书，值勤之余读遍了威海市图书馆所藏。出于职业爱心，他赞赏我的勤奋，关注我的学习，批改日记，纠正用词。教导我成为一名为人民利益献身的战士。1948他奉调南下前，未忘嘱咐下属照料和安排我的学习和工作。

没有张绍江老师的启蒙教育，宋健就是一介白丁，而没有于洲先生的悉心教导，则不会有今日之煌煌大科学家和权高位重的国务委员宋健了。

宋健饮水思源，五衷铭感，深情认定——在自己这一生中，有两位最重要的启蒙老师，一个是张绍江老师，一个便是于洲先生了。

飞去飞来的博士头衔

中苏交恶，宋健放弃唾手可得的博士回国，三十年后中苏关系交好，宋健以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的身份应邀访苏，接受了由苏最高学术委员会签发的博士学位证书。他们申明，这是补历史的阙失。报章发消息后，宋健的一位美国教授朋友来信表示祝贺，说这叫：飞去来器。

1948年秋天，宋健辗转至华东工矿业部工业干部学校学习。

这是一所为接管大城市培训干部新成立的学校，今名山东建材学院，设在刚解放的博山市。学校从数、理、化开始学起。第一堂课便激起宋健无尽的兴趣，读似饥餐渴饮，听嫌课节太短，课后仍然不能自己，如醉如痴，耳边余音袅袅，逗留不去。学未尽兴，时值解放战争胜利，共和国成立，要加速结业。结业后同学们纷纷奔赴济南、上海等大城市。宋健却在学校的教育长刘辛人。班主任刘孟栋的筹谋策划下，保送去由苏联教授授课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深造。

刘辛人与刘孟栋都是新四军出身的干部，在宋健的一生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当年没有他们二人的大力推荐和保送，宋健就可能会到一座大城市当一个小干部或是小职员，不可能去哈尔滨工业大学深造，是二刘在关键时刻，奋力推送宋健的命运之舟，驰入了浩瀚的科技海洋。

1951年春，宋健只身从山东来到哈尔滨正式考上了哈工大，当时宋健的俄语考试几乎交了一张白卷，校领导认为宋健的学历不够，让宋健上预科。

宋健当时便急了，抗争说：组织上要我念的是大学，可不是预科！

学校领导沉吟有顷，大约是被宋健强调的“组织”二字打动了，勉强改变了让宋健读预科的决定，但是仍然不放心这个学历偏低的学生，只答应让宋健在本科试读一段，这就等于留了个活口。言外之意是，如果宋健跟不上本科所学，仍然可以打发宋健去读预科。相信这样的遭遇对青年时的宋健，该是一个莫大的刺激也是一个莫大的鞭策，宋健深知自己力争来的本科学习机会是何等重要，故而暗自决定不惜任何代价，昼夜奋战，学习俄语，补习课程。

那是一段艰苦卓绝的日子，憋着一口气的宋健，深知自己的底子薄，横下一条心学习，别人睡觉宋健还在看书，别人起床宋健还未睡觉。上课时宋健认真听讲，下课后别的同学去搞活动，宋健却还在室内学习。不论是走着还是坐着或是吃饭甚至是上厕所，宋健都在学习，不是背俄语单词，就是背几何公式。

功夫不负苦心人，以宋健原本聪颖的天资再加上持之以恒的勤奋，一个俄语交白卷、差点要被发配去读预科的学生，在短短一年的时间，不但发奋追上了所有自己不会或是欠缺的各门课程，以优异的成绩读完了大学一年级，而且在同年还一举通过了到苏联留学的考试，这不能不说是宋健的成功，也不能不让人为之感动。

1953年，由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亲自送行，宋健等一批留苏学生踏上开往苏联去的列车。汽笛长鸣一声，列车若洪荒时的巨型爬虫，连呼哧带喘地蠕动着，载走了年轻的宋健，满载着中国对科学技术的无限期望，向红色的莫斯科驰去。

宋健在苏联求学的学校，是莫斯科包曼高等工学院，读炮兵系二年级。

这所学院曾造就过苏俄数代科技英才，苏航空巨擘图波列夫、航天之父柯罗略夫、数学家车彼谢夫、力学家茹科夫斯基，包括任过苏共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以及斯大林的夫人阿鲁里耶娃，都是该校的毕业生。

宋健虽然遵命学炮兵，但兴趣却仍在数学、力学等基础科学。

在莫斯科包曼高院，为了不负自己的夙愿，从四年级起，宋健便将有限的精力和有限的时间分为两个等份，昼夜分读于两所大学，白天在包曼高院学炮兵原理，晚上在莫斯科大学夜校听课。倾听过科学大师潘特里雅金、邓钦等著名教授的控制论、现代几何、代数等课程。

宋健听得如醉如痴，越听兴趣越浓，引起了他对数学的强烈的热爱，美丽的整体结构，严密的逻辑推理，广泛的定理涵盖，真是无限湖光，无穷山色。

1960年，宋健同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夜校和包曼高等工学院炮兵系研究生院，同时拿到两个毕业证书，颇类似当今的所谓双学士。

早在1957年的秋天，宋健就慕名到苏联著名科学家费德包姆教授处做自己的毕业论文，半年后宋健完成了当时世界上第一个三维空间最优控制系统设计和试验。

论文发表后，受到了各国科学家的好评和鼓励，这增强了宋健的信心。

进入研究院后，宋健继续留在费德包姆教授的试验室做最优控制的研究，一年后基本完成了“最速控制场论”的研究。

谁料天有不测风云，正当宋健完成副博士学位并准备攻读博士时，中苏关系突然交恶，两国关系不断恶化，赫鲁晓夫背信弃义，对留苏学生采取

限制措施，百般刁难，撤走苏联专家，使中国上百个研究项目陷于困境之中。

宋健谢绝了数位院士和老师同学要他再留数月完成博士学位的建议，整理行装，毅然返国，投身于中国的导弹、航天事业的发展研究之中。

宋健当年这样做时自然是义无反顾，但是回国后每每与人念及，或是夜深人静意识流动之际，想到自己的那个博士学位，只要稍微延以时日便唾手可得，勇毅果敢如宋健者，毕竟也还是觉得心头有些淡淡的惆怅和无可奈何的遗憾。

让人觉得好笑的是三十年河东之时，中苏交恶，好学生宋健丢了博士学位。三十年河西之际，中苏忽然又交好，宋健煌煌然今非昔比，以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的身份应邀访苏时，顺便回母校探视学长，并接受了由苏最高学术委员会签发的一份迟到了三十年的博士学位证书。他们申明，这是补历史的阙失。报章发消息后，宋健的一位美国教授朋友来信表示祝贺，说这叫：飞去来器。

这段经历听起来，让人觉得历史真的像是一场戏，政治斗争只不过是戏中的一两个插曲，人生无非是戏里的过客，最具有意义的似乎不是戏剧本身而是一个过程。

不管怎么说，宋健的这段经历，也是颇具戏剧色彩的。

这时的宋健已经即将要走近那个邪恶的潘朵拉了。

科学家的不科学遭遇

宋健发言时，主持会议的主席是美国 A. Hopkin 教授，他不知内幕，发现宋健发言不是针对前边代表所做报告的评论，而是在宣讲一篇论文，于是出面干涉，听众大哗，许多科学家起身，用不同的语种呐喊：让他讲下去！中国人讲下去！

宋健是控制论专家，但许多人对什么是控制论和控制论的历史无从知道。

控制论这门学科的命名，源之于美国数学家维纳（Norbert Wiener，1894—1964）1948年发表的论文《控制论——动物和机器中的通讯和控制》一书。苏联曾群起而攻之，斥之为“帝国主义战争贩子的哲学帮凶”。1954年钱学森在美国出版了《工程控制论》，立即被译成俄文，主编是宋健的老师费德包姆。

说来这也是一种巧合，此事之前，宋健在苏留学时，就曾在费德包姆的试验室做过世界上第一个三维空间最优控制系统设计和试验，发表之后引起世界科学界的反响，并基本完成了“最速控制场论”。宋健曾为控制论在苏联的遭遇打抱不平，因钱著有“工程”二字，批评家望而生畏，不敢进逼，从而为控制论在苏联的平反创造了基本条件。钱著在苏联出版之后不久，便使控制论在苏联的遭遇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苏百科全书对控制论的条目重新做了修改，由指斥否定改为赞扬和肯定。

可以说，是钱学森著作的出版扭转了一个学科的命运。世界各国学者也赞誉有加，称钱著为“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他的序言简直是一首诗歌”。

钱学森对宋健的赏识和多年交往的基础，便源之于这种对一个学科进行深入广泛研究的共同志趣。60年代，钱学森委托宋健主持编写《工程控制论》的第二版，以补充1954年以后该学科的最新进展。书即将杀青时，谁知山雨又来，“文革”轰轰烈烈开始，该书搁浅近15年之久，《工程控制

论》第二版才得以在 1980 年面世。

1961 年钱学森感到控制论的重要，倡议在中科院数学所建立控制论研究室，得到了科学院领导的赞许和支持，让宋健协助华罗庚、关肇直先生筹建，并任该室副主任。未几，控制论研究室就初具规模，开展了最优控制、非线性控制、随机控制等的研究工作。宋健在此工作期间，与韩京清先生合作完成了线性最速控制系统综合的理论研究，并以此论文报送 1963 年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第二届代表大会，未被录取，引起中国科学家的愤慨，疑其利用政治上的原因在评审时做了手脚。

中国是该联合会发起国之一，钱学森曾任第一届理事会成员，1960 年首届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宋健是代表团成员。那次盛会除钱学森因故没有出席外，所有控制论的奠基学者都云集而来，连控制论的鼻祖维纳也来出席，受到英雄般的欢迎。维纳已过耳顺之年，精力似有不济，听别人报告时，鼾声大作，数分钟后轮他上台做评论，只得王顾左右而言他。会议休息时，他却精神抖擞，来到中国代表团，用清晰的汉语说：我喜欢中国，1937 年我曾在清华大学授课，很高兴见到中国学者。

维纳是大会的中心人物，会上别国学者做报告时他打鼾，会后却不理任何一个国家的代表团，专门跑到中国代表团，站在那里，目光炯炯，声音洪亮，旁若无人地说了这样一番话，说完之后，不计自己所言是否会引起别国同行的不满，周遭反响如何，却昂着头，挺着胸，顾自转身，扬长而去，神龙见首不见尾，不知所终。

维纳所表现的那种大科学家式的直言不讳、童言无忌的言谈和我行我素、其奈我何的独立人格、率性做人、放荡不羁的潇洒举止，给年轻时的宋健留下了深刻的经久难以忘怀的英雄般的印象。时过近 40 年，维纳早已作古，可当年他与会时的风采仍未在宋健心中混灭，曾在数篇文章中提到这一点，备加赞赏。

1963 年第二届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代表大会在瑞士巴塞尔如期举行，中国派以吕强为团长、钟仕模为副团长的大型代表团去瑞士开会。让宋健带了 120 份在上面印有“曾投稿”字样的论文，伺机在会上揭露某些人违反科学道德的行为。

中国代表团到达瑞士之后，马上就弄清了真实原因，不幸竟被料中，其时正是国际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联手反华之时，鼓噪得沸反盈天，所以在评审论文时被反华者做了手脚。这种因政治上见解不同所属国度不同，而不惜违反科学的态度，偏狭的轻而易举地去否定或是贬低别国的他人的学术建树的做法，是一种最龌龊最不道德的行为，从来就是科学家的大忌，不齿于整个世界的科技学术界。

在钟仕模教授的指挥下，宋健相机在大会做了发言。

宋健发言时，主持会议的主席是美国 A. Hopkin 教授，他不知内幕，发现宋健发言不是针对前边代表所做报告的评论，而是在宣讲一篇论文，于是出面干涉，听众大哗，许多科学家起身，用不同的语种呐喊：让他讲下去！中国人讲下去！

会场顿时乱作一团，使会议的程序无法进行下去。为了不影响大会进行，钟仕模教授起身，示意宋健从台上下来，随他一同先行退场。

钟先生是 40 年代麻省理工学院博士，主持会议的主席美国 A. Hopkin 教授认识钟先生，慌忙走下主席台，找钟先生交涉道歉，钟先生愤而谴责道：

这种作法，令人不解，这哪里是做学问！

宋健前脚跟随钟先生走出会场，后脚会场上数百名科学家却跟着追了出来，紧追不舍，将宋健背来的 120 份印有“曾投稿”字样的关于《线性最速控制系统综合的理论研究》论文，一抢而空，晚来一些的，没有拿到宋健论文的有些外国科学家，满脸遗憾地一再缠着宋健索要，宋健只好抱歉说：对不起，没有了。

宋健以为，事情至此，已经结束，120 份论文四散一空，从受人欢迎的程度看，结果还是让宋健满意的，便心满意足地，安安心心地躺在床上睡了好觉。

谁料第二天起床，却发现中国代表团人人脸上都很神秘警惕的样子，原来是一大早，就在会议大厅挂出一份大字公告，上写：今天早上 9 点，在会议大厅召开特别会议，邀请宋健教授作特邀报告，请大家参加。

这时不断传来消息，说西方的一些科学家们，也对大会上的某些心怀叵测的人违反科学道德，压制中国科学家一事表示不满和声援。还有一些科学家，一方面是义愤填膺地对中国的遭遇表示同情和大力支持，一方面也对此次大会的不民主情况深为不满，种种不满，都是由宋健那一篇论文生发，在大会上相继造起反来。

这样一种混乱局面，让中国代表团很是难以把握。

于是代表团经过研究，认为事先没有征得我们中国代表团和宋健本人的同意就做出这样一个决定，违反了起码的礼貌，另外，其出发点不明，我们不能打无准备之仗。并按照那时惯常的做法，求教于毛泽东思想，认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于是决定抵制报告会，不让宋健去作报告，中国代表团也不去参加，来了个不予理睬，看他们怎么收场。

后来宋健和中国代表团得知，聚集在会议厅中的百余名大科学家，久候不见报告人踪影，便通过了一个集体决议，强烈谴责某些人违反科学道德的行为，郑重声明《线性最速控制系统综合的理论研究》是一篇优秀论文，对当代控制系统的综合理论作出重要贡献，要求 IFAC 理事会纠正错误，将该论文纳入会议文集予以刊出。

IFAC 理事会最终不得不尊重和接受了这些科学家们的最后一条意见，将宋健和韩京清先生合作完成的那篇论文，郑重收入了本届会议的文集予以出版。

这大概是 60 年代东西方科学界的协同造反惟一成功的绝无仅有一个范例。

宋健在文章中写道：二十年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我应邀去西方各国访问讲学，到处都遇到巴塞尔事件的参加者，他们都已经都是著名研究机构和大学中的控制论学科的领导人，犹有笑谈那次“遭遇战”的余兴，成为学术交流合作的轶事。

原来身为以科学为本的科学家，也常会遭遇这种不科学或曰反科学的仇视民主的冷面杀手，如果当年，没有那些国内和国外的科学家同行们本着科学精神和民主意识，出面支持被损害的科学，主持被欺侮的民主，还之以公道，宋健和韩京清这两位大科学家，恐怕也不得不含辱忍垢，蒙受一段不科学不民主的不白之冤。

以宋健如此卓越者尚且碰到过如此不科学不民主的遭遇，想来世界上

当然也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尤其是我们中国）处处都有这样一些不科学的冷面杀手，他们身居这样或那样的虽然不起眼但在某种意义上至关重要的位置，每每出于自私和偏见或是别的什么不科学不民主的原因，漫不经心地也不知无端杀死了多少刚刚处于萌芽状态的科学少年和一些正想有所建树但缺乏自信心和判断力的科学天才。

身为科委主任的宋健，对此，大约深有体会吧？

宋健“出差”

宋健其时常梦魂倏忽归故里，与妻儿握手依偎，相顾而泣；蓦然惊起，惟有夜色茫茫，夜风凄凄，夜泉惊啼；寒月照影，孤灯相伴，四顾怆然；心酸鼻塞，泪流满面，哽咽无语；披衣起坐，再难入眠，惟有以书解忧，读以待旦。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得马，又焉知非祸。

巴塞尔事件，对一位科学家而言，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但因为当时中国的国情使然，一切都从政治出发，却又为“文革”来临时的宋健，种下了天大的祸根。

巴塞尔事件后，宋健一时成为巴塞尔会议上尽人皆知的人物，会上许多科学家来找宋健，或表示关切、友好，或向宋健索要论文，或交换文章资料，还有的主动约请宋健谋求科学上的某种合作。在大会的闭幕招待会上，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 L. Neustadt 教授携夫人要与他干杯，这些都成了宋健在“文革”时的罪状。

“文革”时宋健被指控为“里通外国”，证据便来自巴塞尔事件，都是自由生发和无端创作的一些异想天开莫须有的东西。宋健因此被隔离审查，引发的大字报、大标语、大批判、铺天盖地，批判宋健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为取得铁证，宋健的家中多次被抄，大量珍贵的科学资料散佚一空，一些记载着宋健在科学研究上重要心得工作日记、论文的手稿等等也被查抄，从此踪影全无，损失惨重。

宋健还被多次拉出去，当做活靶子批判，当成“里通外国”的特务。

1968年“文革”升级，武斗频起，可谓一夕数惊，比当年宋健小时听到大人说“鬼子来了”还要觉得恐怖，因为那时是个不晓事的孩儿，这时却是一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一样的“里通外国”的特务，真要被革命群众出于义愤一顿饱打，打死了也就打死了，这还不算，还得落一个“死有余辜”的罪名，祸及全家和子孙后代。

可想而知，宋健当年，心里有多怕。

好在当时以阎揆要将军为首的军管会向周总理提出紧急报告，要求采取断然措施，保护一批科学家。宋健理所当然地被列入保护名单。经周总理批准，军管会立即采取措施，将一批科学家集中保护，以防意外。宋健则被派往国防科委所在酒泉地区第二十试验基地“出差”，住在酒泉基地，被部队保护起来。

宋健出的这趟差，可真算得上是一趟长差，一出，就是一年多。

宋健初到酒泉基地，无所事事，委实地从容了一番。

但是过了没有多久，宋健便闲不住，跑去基地图书馆找书看。基地图书馆藏书甚丰，宋健看了不觉大喜，便发了书呆子气，浑忘了所遭不幸，没明没夜地看起来。这期间，宋健抓住机会，发愤苦读，补充自己的学养，

补修天文学、宇航原理、超音速空气动力学、原子物理。分子光谱学等理论。

宋健只有在强颜向学之中，才能忘记自己羁旅异地归去无期的窘境，才能慰藉自己孑然一身的孤寂，和对远地亲人、朋友和师长的怀想与深深的担忧之情。

这一段时间，宋健像在哈工大和莫斯科上学时一样，白天在图书馆里读，晚上还要带书回房间续读，所不同的是心境和处境，前后读书的目的虽然都很明确，是为了今后学以致用，但以前学问洞明，而今时知识幽暗。何日方可出头，茫茫无有分晓，纵你学富五车，不见天日，又何以致用？岂非瞎子点灯白费蜡吗？

若说宋健当时，无此一点担心，那断乎是假的，不说也罢。

在酒泉一段日子，宋健时常半夜里，梦魂倏忽归去故里，与妻儿握手依偎，相顾而泣，梦醒时分，蓦然惊起，却惟有天头一轮寒月照影，屋中一盏孤灯相伴。夜色茫茫，夜风凄凄，夜泉惊啼，四顾怆然，乡关不知何处？由不得就心酸鼻塞，泪流满面，哽咽无语。每每披衣起坐，再难入眠，惟有以书解忧，读以待旦。

只是这一段的有心无望、英雄末路式的、英勇悲壮的发愤苦读，恰似武林师尊隐居时的拳不离手，歌手伶人赋闲时的曲不离口，弱国居安思危式的秣马厉兵，在以后宋健出山的日子，可谓使他受益匪浅，成就了一个偌大的心愿。

故而以后宋健在一篇名为《珍惜机遇》的文章中这样写道：若夫概断文革全损无益，也未必，太史公早有定论：《春秋》、《离骚》、《国语》、《兵法》、《诗》三百篇大抵为发愤之所作。我这一年多的逃难，收获甚丰，特别是天文和原子、分子物理，对我以后的工作和科研产生了极其重要影响。

宋健所言极是，但当时定力能如宋健者，遭际能如宋健者，中国又有几人？不堕青云之志者，尚可砥砺其志，劫后得益，寻常人却承受不起，因而受害最深。

许多的大学人和大知识分子喂猪的喂猪，养牛的养牛，十年下来之后，连一些寻常的文字和简单的公式都记不起来，学问和知识荒疏得连自己都无地自容，有的还可以重拾八九，重归原位，有的却连三二也捡不回来，只好坐在那个位于上，吃十几年前自己的那些老本，腆着一张老脸，尸位素餐而已，真是让人匪夷所思。

1969年秋，宋健奉海军副司令兼七机部军管会副主任杨国宇将军之命返京，从而结束了一年多的“出差”和苦读生活，恢复了工作，任七机部二院生产组副组长，得以为中国的航天事业效力，贡献自己以往之所长和在困境中之所学，不负宋健学以致用之苦苦企盼，遂了一个科学家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心愿。

姑妄言之，如果不是周恩来总理的英明果敢，在危难中，不顾一切地保护了一大批中国的科学家，如果不是因为宋健是一个国家不可或缺的国防科学人才，而只是一个薄有文名的作家、或是一位学有所长的教师抑或一般的工程师，恐怕还得再继续熬煎几年，直到盼来那个中国盛大的节日，才会有出头之日吧？

所以，宋健对周恩来总理是深有感情的，他在写到总理逝世时的一段文字也是十分感人的，他这样写道：1976年周恩来总理去世时，我泪流满

面，惶惶然不知所依，肠一日九回，忽忽于所亡，全家人仁立于八宝山下，敬送总理归去。曾忆及，1971年，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会议，深夜听取反导弹第一次试验汇报。他问及导弹试验状态和我的出身、经历及其它，亲切勉励之言萦绕于怀，终生不忘。

1977年，是中国知识分子盛大的节日，也是中国人民盛大的节日，十年内乱终于过去。春风一浩荡，花木又复苏。中国科技界、知识界、经济界、教育界以及社会各界的人们，像从漫长的冬季醒来的蛰虫，欢呼着自己的新生。尤其是科技界和知识界，还没有来得及完全暖和过自己僵硬的身体，治好冻伤，便又开始蠕蠕地弹动着人类良知的触须，去摸索和寻找强国富民的大道，研究和呼号国家大事了。

这些本性难移的中国的知识分子，素来忧国忧民，总是以天下之任为己任，不辞辛难，不畏艰险，不计前嫌，不接受任何专横暴政的教训，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只要尚存一线生机，就绝不肯做事时为自己留什么退路，只要是认定对国家民族有好处的事情，做起来就会热血沸腾，义无反顾，不顾一切。

十年无计划的生育，使中国人口如江河陡然暴涨，从1964年的7.6亿增长到1976年的9.4亿，年平均自然增长率达到2.5%，这引起了科学界的恐惧。

人们自然而然想起了中国的人口学家马寅初先生。

马寅初和《新人口论》

雄牛健牯一般梗着真理的硬脖子，不肯做些
微的弯曲和退让，明知寡不敌众，仍然坚持斗争。
如果当年听从马寅初先生控制人口的主张，中国
的人口何至膨胀如斯？

马寅初老先生在50年代仗义执言，发表了《新人口论》，倡议控制人口的增长，以求人口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相一致。然而如此忧国忧民的真知灼见却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只因为毛泽东说过“人多力量大”的话，便使马寅初犯了上，受到有组织的全国大批判，受到急风暴雨式的攻击，遭到极不公平的对待。

马寅初老先生委实不愧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楷模，雄牛健牯一般梗着真理的硬脖子，不肯做些微的弯曲和退让，明知寡不敌众，仍然坚持斗争，甚至还在1959年11月公开发表一则声明云：我虽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服人的那种批判者投降……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谢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1949年自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真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

因为我对我的理论相当有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希望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

严酷的人口事实，使活着的人们倍感头疼并认识到了马寅初老先生“新人口论”的正确和重要，如果当年听从马寅初先生控制人口的主张，中国的人口何至膨胀如斯？何至于今日中国政府在人口问题上陷入如此大的被动局面之中？以致中国不得不痛下基本国策之决心，对中国广大地区的无计划生

育痛下狠手。在控制人口问题上，将说服、教育、行政命令，甚至强制执行等手段，一古脑儿全部使用和调动起来，这似乎迹近专制和强横，其实却并非如此。

原本是迫不得已，原本是英勇悲壮，原本是在为全世界控制人口做贡献——因为中国的人口问题不仅关涉中国自己，也关涉全球生态平衡，中国人和中国政府不仅为自己，也为顾全世界大局——在控制人口问题上，可谓全民总动员，经济大投入，下定不怕牺牲的决心，呕心沥血，义无反顾，死而后已，去争取胜利。

如此末路英雄一般慷慨、悲壮、艰苦卓绝的行止，却还招来国外一些人士的无关乎自己痛痒的批评，所谓的什么“不民主”，什么“不人道”等等的求全责备的说法，真个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假如他们自己国家的人口到了 12 亿以上，他们会怎么办呢？也许他们比现在的中国更着急上火，更会不择手段的吧？

原本这是个人类的世界，是非是人类共同约定俗成的，只要目的正确，是可以不择手段的。比如正义的战争，为了保护自己国家不受侵略，让自己的儿女们浴血奋战，前赴后继，死而后已，绝非什么“不人道”“不民主”这样空洞的词汇可以为之涵盖或包容，又有什么不对呢？

为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全人类的长远利益，在自己的国土上——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提倡过使用强制手段，但有些地方的有些人们，为了完成计划生育指标，出于万般无奈，曾经在农村中使用过一些这样或那样的多少有些极端的手段。

例如笔者曾亲耳听取一位小镇计生委工作者的骇人描述。

小镇有一妇人几年工夫，已经接连产下了五个女儿，超生多多，却一门心思要下定决心再生一个儿子。该妇虽然因为过度紧张的生孩子而落了一身的病，头疼、腰疼、腿疼种种病症，面容焦枯，神色憔悴，头发稀疏脱落，牙齿疏松畸形，摇摇欲坠，却死也不肯接受镇上计生委的规劝，乖乖地做绝育手术，反而成天和丈夫东躲西藏，状如游击战士。

更可笑的是该妇人与丈夫不论躲于别人家中，还是废弃的破窑洞中，也不管是隐于田间还是匿于地头，只要丈夫身上还有得一分力气，有得三分奈何，任是青天白日，远近有人，也悍然不顾，立马就脱去衣衫，双双公然宣淫，大伤风化。

有好事者观见，远远讥笑呼吼，骂说：你们这两口子，真是不要脸！

妇人却笑着还骂道：你狗的是饱汉不知饿汉饥，有了两个儿子还想要个女子！

妇人一边还骂，一边就抱住丈夫肆意挑逗，旁若无人的仍旧要自己的丈夫奋力骑墙，故意做出种种无耻撩人的姿态，狗爬蛙附，雀咬嘴，虫勾联的样子，不为贪欢，只为再怀一胎，为自己男人生个儿子。

最可悲的是小镇上竟然还有争相效颦者，大挑拇指者，津津乐道，以为这妇人是个难得的大孝之人，只因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般的陈腐观念，在这个小镇根深蒂固使然，偏那男人又是一子单传的白丁，故而更是理直气壮，以为得计。

只因这个钉子户，使计划生育工作无法开展，每每动员绝育，妇人们便嘻嘻言曰：你们柿子拣软的捏，你们要是真有本事，先把人家 XXX 给绝育了，我们这些人不用你们追撵动员，立马就自己去做绝育手术！

小镇的镇长是个血性男子，听计生委主任百般诉苦，被那女人们的公然叫板激得大怒，帽子往地下一掼，便调集镇上一帮基于民兵，撒开人马，四处寻找和围堵那个类似跑反的妇人，竟然被一举擒住，硬性拖拉着妇人往医院去。

一路上那妇人撒泼使赖，百般刁难，百般咒骂，都不管用。

最后妇人便使出女人对付男人的杀手锏，一下子脱掉自己的上衣，褪下自己的裤子，露出胸前两个松弛如破麻包也似的奶子和胯下一个龌龊奇臭的羞处，惊得那些还都是些没有见过世面的基干民兵们，个个目瞪口呆，人人含辱窃笑，晦气至极地避之惟恐不及，一时做鸟兽散，只撇下小镇镇长和计生委主任。

面对妇人，连那个原本怒发冲冠的小镇镇长也没了脾气，一时也被弄得呆了眉眼，没了办法，失了主张。只好红着脸，怒骂几声，眼睁睁地看着费了好大气力好不容易才捕到的一个妇人走掉。那妇人还卖弄风情似地冲他哧哧地窃笑着，也不忙穿衣服，手里拎着自己的裤子像拎着一个护身符，得意洋洋地光着一个屁股，大模大样，拔腿就走，一溜烟似地扬长而去，又要去寻她的男人做那件事了。

妇人的嚣张气焰彻底地惹怒了站在一边不吭声的女计生委主任，这个过去曾经在县里球队当过投篮手的人到中年的女干部，忽然就噌地一声射了出去，几步就追上那个妇人，扛麻包似地将其扛在肩上，大踏步地向镇医院走去。

那妇人被吓呆了，一时也挣之不脱，便被女计生委主任扛到医院，亲自大力按在床上，强制性地很顺利地给妇人做了绝育手术。绝育后，那妇人竟然也没哭没闹地认了命，对计生委主任说：唉，大妹子，也赖不得你，我知道自己不对，可没个儿子，保根家就断了根。也是他自己命赖，怨不得我，我是为他尽了心力。不瞒大妹子你说，这些年生孩子生得我都快没命了，你以为我真的那么想生孩子吗？！

如中国那个著名的小品中表现过的那样——为了不被村里抓去做绝育手术，而不惜当盲流，四处逃窜，一路从吐鲁番生到海南岛，生下的孩子，个个都是丫头片子，不生儿子不罢休，还要继续生下去。

这样的现象，这样的情形，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广大的城镇和农村，何止千千万万？纵容吗？放任吗？人道乎？人权乎？令人遗憾和心酸的是，他们竟然根本无暇去顾及，甚至想也没有想过，在他们贫瘠荒凉的大脑里，几乎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去顾忌，他们只要传宗接代，只要有那个顶天立地的强劳力，只要生个儿子。

这要求似乎卑微低下得可怕，似乎也全然的不过分，遗憾的是造化偏偏弄人，要与他们作个对头，你想要男孩我偏不给你，你想要女孩我也偏不给你，丝毫不肯眷顾于他们，送子娘娘只送他们不想要的孩子，让他们常常失望。

他们为之愤怒，执拗地认为，既然造物主敢于公然和他们作对，让他们的盼望每每落空，既然送子娘娘阴差阳错地总是让他们屡屡受挫，他们便敢于悍然地一生再生，让整个中国失望，让整个世界失望，让整个生态环境为之大惊失色。

中国有两个基本国策，一个是计划生育，一个是环境保护，在这个前提下，以上所述中国之国情，中国控制人口所特有的苍凉和悲壮，便全然地

蕴藉在其中了。

恐怕连美国的克林顿总统，对此也会束手无策，瞠目结舌，无话可说。

宋健和“人口控制论”

如果人口突破限值，不计划生育，便会像蝗虫那样无穷无尽地繁衍增长，最终使中国像一片密密麻麻布满了蝗虫的庄稼地。

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重男轻女的意识，在现在的城市中已经轻微得近乎于绝迹，但在农村仍然阴魂不散，尤其是在那些僻处一角的偏远地区，更是如此。

那些偏远地区的人们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至今没有见过电灯为何物的村庄在中国也并非一个小数，山西省远在塞外处有一个三靠村，流传这样一首骇人听闻天荒地老的充满自嘲色彩的民谣：点灯靠油，耕地靠牛，娱乐靠球！

我有一个嫡亲的小妹，从小在北京的姥姥家长大，当年甚至连户口都迁到了北京，可是为了全家团聚却接她回来。回家后，她长大上学，高中毕业赶上插队，还算是幸运，当时她被插到与上述地区相邻的一个县里的林场工作。

她因为插场而爱上了一个林场的小伙子，因相爱而结婚，因结婚而生孩子，生下一个是女子，又生下一个，还是女子，再生一个，仍然还是女子。

她每一次回家，样子都要憔悴几分，满嘴的牙齿疏松活动，獠突向外，连嘴皮都包不住，我们全家人心疼的不行，动员她不要再生，赶紧去做绝育手术，她在我们家一向是个性格温顺逆来顺受的人儿，可是在这个问题上，却坚定得令人难以置信，她也不反驳我们，只是笑，只是不置可否，只是不肯答应，回去之后，照旧我行我素，究其原因，便是她的丈夫也是一子单传，她已经被环境完全的同化了。

我每次见到她都忍不住心里一阵阵的酸楚，对她的冥顽不化简直恨之入骨，但她毕竟是我嫡亲的妹子，又气她又心疼她，却又无法可施，只能责备她几句，还怕说重了，让她心里难受，受委屈，那种尴尬情状，真像一句当地的俗语中所说的：豆腐掉在灰堆上，拍也拍不得，打也打不得，让人徒唤奈何！

然而，造化终于怜悯她，赐给她一个男孩，她成了幸运者。

那年我去看她，她抱着那个男孩，气色显得比过去好了许多。

她絮絮叨叨地告诉我她的一些事情，说：今年五月，我正在家里，就被计生委的一群人给逮住，往拖拉机上一扔拉了就走。拖拉机上一车女人，都是被人家逮住的。逮住就逮住吧，反正我已经有了个儿子，绝育就绝育了，不怕了。别的女人有些刚生了三胎，有的生了四胎，还没得着个儿子，可是被吓死啦！

她以纯粹当地人的神情和当地人的语气，向我描述着那种情形：路上女人一个个的要往车下跳，可是看得紧，跳不了。人家说你们有福气，这回是突击手术，地区医院来了好多医生，医术高明，做手术没后遗症。我就想迟早也得做，不如趁着有个好医生，做了省心。这时就把一车女人拉到一个院子里头，那些女人鬼哭狼嚎的，一个一个被拉进房里做绝育手术。他们要拉我，我说：不用，我自己走！

小妹说：我就自己走进一间房里，那是一间闲房，窗子上挂了一疙瘩

布，地上垒着的砖头上铺了块门板，门板上铺了个褥子，罩了块白塑料布。那个做手术的医生是个小个子女人，听说话是个侏儒，说：你脱了衣服，先躺在上面！

我小妹就自个爬上门板，躺在上边，等那个医生动手术。

那个医生先是给我小妹消毒，后来就开始动起了手术。绝育是个小手术，做起来并不费事，只要一会工夫就可以做完。可是刚开始做就出了问题。

我小妹一边笑，一边说：那个医生是个小个女人，不大点个人，个子低，够不着，就搬了一摞半头砖垫在自己脚下。小个子医生拿把手术刀子刚割了我一下，我还没来及叫一声哎哟，人就没了，我说好端端的把个人哪去啦？欠起身一看，原来是从砖头上给跌下去啦！

小妹犹有余悸地笑说：大哥，你说怕不怕，那个小女人割着割着人就从天上跌下去啦，割着割着，一个人就好端端的没啦，一会就又要上来了，接着割，割着割着，又跌下去啦，没完没了的……差点没把我吓死！

小妹反复地向我叙述那个细节，因为她除了当时害怕，过后便觉得好笑，也觉得有点后怕，像说一次有惊无险的经历，不断地重复说：那个小个医生，割着割着就从砖头上跌下去了，跌下去赶紧再爬上来，刚拿刀子割了几下，就又跌下去了，一个手术做下来，跌下去足有十几次，吓得我老和她说：这回你脚下踩稳点，甭再跌下去了！可是我话没说完，她又跌下去啦！你说我怕不怕，真是灰的，那天我真怕她脚下一晃，往下一跌，吃不住劲把刀子一下攥进我肚子里，真是吓死我啦！

我却越听越觉心酸，越听越觉得我小妹可怜，我痛心疾首也是很自私的想，这事情可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可是根本就不应该发生在我小妹身上！

小妹却一副满不在乎无所谓的样子，只是觉得好玩，好笑，说个不停，那种麻木不仁的样子让人悲哀，笑着解嘲说：我这也是活该，谁让我生了五个孩子！

我问她：如果这第五个还是个女子，你怎么办？

小妹却嘴脸依旧，笑说：咋办？再生呗！

我忍不住悲愤，冷然道：你确实是活该！

我知道我已经找不回过去那个纯良温顺听话懂事的小妹，我的嫡亲的小妹已经被当地完全同化，被时代被良知被文明，遗忘在那样一个落后山区的角落里了。我爱我过去的那个小妹，也爱我现在的小妹，但我却不同情现在的小妹，我惟一的愿望是如何改变她，让她重新回到文明的怀抱，回到良知的怀抱，回到时代中来。

从我嫡亲的小妹身上，我切肤之痛地深切认识到，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在计划生育上过去、现在和将来，所面临的局面是何等的棘手何等的艰难卓绝，中国人民举国上下在控制人口上都付出了巨大的不遗余力的牺牲，基层计生工作者和那里的人们付出的是何等苍凉而悲壮的代价，是何等的无可奈何呀！

我所敬重的那些民主的斗士们，那些人权的卫士们，打一个颠倒，如果把你们放到基层计生委的岗位上去，让你们做他们所做的控制人口的工作，然后再让他们到你们的位置上高高在上的指责你们，你们又会怎么想呢？

中国的人口问题和环境问题是同样大的两个问题，绝非嘴上谈兵的事情，只要基层计生委的具体领导嘴上松一松，当地的人口就要翻一番，攻一攻，中国政府只要态度稍微软一软，中国的人口马上就能给你一下子超生几

个亿，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国情，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现状，你让我们的中国政府怎么办呢？！

1982年，马寅初这位百岁老人逝世，不必做任何解释，只要看看中国政府在所发悼词中对这位含冤负屈几十年的人口学家的盛赞之词，就知道当时的中国下了多么大一个决心，接受了一个多么惨痛的教训，面对着怎样艰苦卓绝的一个局面，准备作出怎样一个姿态来挽回历史所造成的重大错误，悼词曰：在委屈和痛苦之中，他不惧权威，不顾名利，孤军奋战，创一代新风，为学人创光辉榜样。

中国政府在控制人口问题上是从计划生育入手，中国政府在控制人口问题上的最终的态度，便是以人口控制论专家马寅初老先生为光辉榜样的一——那种雄牛健牯一般梗着真理的硬脖子，不肯做些微的弯曲和退让，明知寡不敌众，仍然坚持斗争，不屈不挠，持之以恒的伟大精神：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服人的那种批判者投降……

这里不妨用马寅初先生当年声明中最后几句话，当作现在中国政府对某些来自国外的不负责任对中国计划生育问题所提出的种种诘难，在此一并做个权威性的回答：因为我对我的理论相当有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并希望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

宋健在文章中写道：受激于马寅初先生的风范，面对令人忧虑的中国人口，我邀约于景元、李广元等，应用控制论的理论和方法接续研究人口控制问题。熟悉人口学历史，搜集中国人口资料和数据，建立数字模型和选择控制方案等工作，费时一年多。1978年我随杨嘉墀先生去芬兰参加国际自控联第七届大会，顺访荷兰，在屯得特大学遇到奥勒斯德教授，见他们也在用控制论方法研究人口问题。万里之外钟伯相遇，不胜欣喜。回国后，信心大增，研究工作迅速进展，有如破竹之势。

1980年新华社公布了宋健运用控制论方法研究中国人口发展趋势的百年进程预报，宋健的研究科学地表明：如果中国按当时的生育水平延续下去，那么200年中国人口要超过14亿，2050年达到40亿。如果今后平均每位妇女生两个孩子，到2050年中国人口达到15亿后，才会停止增长。

宋健和于景元的人口控制论研究结果公布之后，在全社会都引起了反响，许多人觉得情况严重，纷纷来信打电话询问。也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王震副总理还专门约见宋健，王震副总理见了宋健，满脸关切地问宋健：是否有办法把中国的人口控制在3-4亿左右，那就好了！

对王震副总理的这个问题，宋健一时也没有办法回答。

后来宋健和于景元完成了人口控制论中关键定理的证明，这个定理显示：对每一个国家和民族，存在一个双向极限的问题总和生育率（即每个妇女的平均生育数），并找到了计算它的公式，超过这个极限，人口将无穷的增长下去。中国80年代的人口限值是2.16。低于这个限值，人口将逐步下降。

宋健和于景元的这一研究结果公布后，世界各国科学家都表示赞同，不少数学家和控制论科学家按此方法扩展研究，并逐步形成了人口控制论这个学科。在这个学科形成的过程中，宋健和于景元的研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谓功不可没。

宋健的研究结果十分可怕，如果人口突破限值，不计划生育，便会像蝗虫那样无穷无尽地繁衍增长，最终使中国像一片密密麻麻布满了蝗虫的庄稼地，响彻着争相大嚼的骇人的蝗虫的嘎吱声，顷刻之间，这片茂密的中国的庄稼地便会被吞噬得干干净净。当这群为饥饿所迫的 40 亿只中国的蝗虫们弹动触须，张开羽翼，遮天蔽日地飞向别国的庄稼地去觅食时，我很想知道那些总是在谴责中国在计划生育问题如何的不人道、如何的不民主、如何的不遗余力。如何的不择手段的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们，他们会是一副什么样的表情？中国人又会是一副什么样的表情？

人满为患，这真是一件让人感到无比头疼无限恐惧的事情，为了整个人类世界的生态平衡，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自己的未来，我们必须从今天开始，必须自觉地从每一个人自身开始，必须避免 2050 年中国人口增长到 40 亿人这样一件十分严酷的事情，如果发生了以上我所描述过的那种蝗虫一般的人口状况，那么我们如今所从事的任何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都将失去任何意义！

事实上，计划生育也是最大的生态保护和环境保护，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只勉强够十个人糊口的食物，却又多出了二十个人来分，那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每多一个人就会多一份对生态世界的消耗，每个人一生要消耗掉的物质可以堆成一座山，所制造的垃圾也可以堆成一座大山，所以每减少一个人的生育，就意味着为这个世界节省掉一座大山的支出，避免了一座新的垃圾山的出现和对生态环境的污染。

如果中国的人口问题得不到有效的控制，那么我们今天所从事的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也是一句空话。计划生育是最直接的环境保护，是目前保证中国人可持续生存发展的惟一的也是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如果中国的人口到 2050 年突破了 40 亿，那么我们中国目前所从事的生态环境保护就是一件扬汤止沸舍本逐末劳而无功的毫无意义的事情。中国的环境保护必须以计划生育和控制人口为前提，必须在此前提下进行软件和硬件双向全方位的强硬操作，任何一种侥幸心理和疏忽大意或是放任自流都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和严重后果。

在人口问题和环境问题上，我们中国政府和我们中国人都已经没有退路，合二为一地解决问题，一分为二地进行操作，双管齐下，这是惟一正确的正本清源的有效手段，正如治理淮河流域的污染，必须从清理污染源人手一样。如果淮河流域没有 1.5 亿人口，淮河流域的经济发展就不会过热，造成的污染后果也就不会如此严重。

淮河流域人口过分的稠密，与淮河流域的不认真搞好计划生育，是密不可分，息息相关的。

当然这里有历史的原因和客观的原因，但任何一种人类的原因在自然面前都无须启齿，强调任何一种客观或是历史的原因甚至现在原因，都不会因此而使我们所面临的严酷现状稍许有所好转，我们只有脚踏实地一丝不苟地去做，舍此再无它法。

中国政府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可谓英明果断，以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这两个问题作为自己的两个基本国策，这两项基本国策本身就是殊途同归异曲同工的。

宋健应用自己之所长“控制论”来研究人口控制问题，可谓得其所哉，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一次天衣无缝的啮合与杂交，取得极大成果，自然

无须多言。

笔者最后在此想要斗胆对宋健先生所说的话是：既然先生已经用控制论与人口论相结合研究出了《人口控制论》，何以不再用控制论的方法和原理研究一下环境问题，创立一门新的学科《环境控制论》呢？中国和世界都需要这样一门学问。

当然，这只是笔者突发的一点奇想而已，说不定是一个笑话也未可知。

还是趁此打住笔，回到正题，让宋健从过去走回来，一直走进中南海。

宋健走进中南海

毫不夸张地讲，淮河治污行动是中国环保有史以来一次最大规模的行动，其影响力将会震古烁今，举世瞩目，不管结果是好还是坏，都会惠及恒远——好则泽被永久，福荫于子孙后辈，坏则影响幽微深远，祸及千秋万代。

1986年，宋健气宇轩昂地走进中南海，走进国务院，以国务委员和国家科委主任的身份，接替李鹏总理，担任了国务院环委会第二任主任，主管中国的环境保护问题。宋健因此写道：1986年，我受命出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惶惶不可终日。我深知，如果别人受命于此岗位，可能比我做得更好。但是，我绝不轻易放过这个机会。我要竭尽绵薄，为人民能得科技之惠，为学者能为国尽其才，鞠躬尽瘁，贡献我的智慧、心血和生命……

宋健走入中南海，进入国务院，绝非偶然，亦非侥幸，而是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发奋图强，刻苦学习，兢兢业业，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是以有限的生命与无限的工作相搏，以无限的求知欲和有限的时间和精力较量的结果。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走一步有一个脚印，留一个脚印有一处建树。

如同爬山，一溜羊肠小径，盘旋向上，百折千回，懒走一步，省略一个弯儿也爬不上去。好似登高，想要登到高处，休想取巧，莫要使懒，一百单八蹬，想到极处去送远目，看好景致，是一个台阶也少不得的，只有脚踏实地，才能更上层楼。

用他自己的话讲则是：能在科学事业中做出成就，勤奋和机遇缺一不可。

宋健对自己的一生，仅用“珍惜机遇”四个字以概之，自然有他的道理，但从来天道酬勤，机遇亦会选择主人，绝不给使懒取奸的人，这似乎也断然没有错。

宋健可谓受命于危难之时，其时正是中国经济出现高速增长，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趋严重的时候，松花江污染，趵突泉水竭，白洋淀干涸，难老泉老了，汾河成了污水河，晋陕蒙告急，小秦岭金矿乱采乱挖……那时整个淮河流域的水污染问题还没有提出，直到首届中华环保世纪行中小黑河的报道，才被完全揭出，提上国务院的议事日程，那时只有一些沿淮地区的小流域濒危求援的信件。

十里荷香十里菱塘的白洋淀枯涸五年之久，一度时期由于华北平原在短短的几天集中降雨，雨水汇成洪水，沿着唐河等几条干涸已久的河道直泻白洋淀，白洋淀又一次充满希望的波光，只要有了哺育生命和万物的水，白洋淀就可以起死回生。

然而雨水汇聚滚滚奔泻而来的水，已经并非人类字典上那个原始的简

单意义上的水，水这位在人类日常生活中总是充当着匆匆过客的、可怖而又可亲的大自然的使者，已经今非昔比，它不幸被人类现代工业和现代城市完全异化。

白洋淀的人们很快发现，水已经不再是一方面可以吞噬人畜、村庄和田地的怪物；另一方面也可以供人畜饮用、庄稼灌溉。万物生长、可供人类役使的大自然的使者，而全然被污染异化成了另一个面貌狰狞肮脏齷齪一无是处的坏家伙。

注入白洋淀的水，裹挟着大量发黑发臭的污水，其色怪异，其味呛人，不光人畜不可以饮用，就连灌溉也是不可以的，不光不能使干涸的白洋淀起死回生，而且还雪上加霜地污染了白洋淀，大量的污水从保定和沿线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工厂和城市，昼夜不停地奔泻直入白洋淀，连紧挨白洋淀修建的唐河污水库，也因污水暴涨而不断有污水渗漏入淀，白洋淀严重污染，危亡在即。

一份份内参，一份份紧急报告飞到北京，送达中南海，李鹏马上做了批示，邓小平也做了批示。1992年秋天，宋健决定，国务院环委会到保定去开现场会，一定要找出症结，彻底解决白洋淀的水污染问题。国家环保局局长和10多位部长、省长，还有解放军三总部、当地驻军的将军们参加了现场会。

置于宋健面前的，是苍茫一片的白洋淀积蓄着的一湖污水，像一叶被结核病菌感染了了的淌脓发臭的肺，上游一条条干涸的河道像失去了血液的动脉，形成鲜明的对比，显示出华北平原生态的脆弱。只有府河还在流动，可是流动的不是河水而是从上游汇聚而来的工业和城市污水，这些高浓度的污水流经之处寸草不生，排污沟边生长的杨树正在枯死。这一河污水流向的目的地，便是白洋淀。

现场办公会上，有人提出一期二期治理方案和三年五年治理规划，宋健皱着眉头不同意，说：白洋淀的污染治理绝不能再拖下去，我们不能把白洋淀的治理留给子孙后代去解决，不要搞五年十年规划，越快越好！

短短两大多时间，宋健下淀观察，寻河溯源，终于探明情况，找准了关键，做出决定：抓住关键，从治理污染源开始着手，首先对保定大量的城市污水进行综合治理，建设二级污水处理厂。对白洋淀污染影响较大的十几家企业进行重点治理，有的要关停并转。对白洋淀的旅游污染进行积极防治，划定旅游区，所有的船只仅限旅游区内活动，限制燃油机船的数量。解决淀周边的生产与生活垃圾地污染问题，防止水产养殖可能对白洋淀造成的污染……白洋淀治污战役就此打响。

不久，晋陕蒙接壤地区又踩上了宋健的足迹。

毛乌素曾经是一片水草丰美的地方，在无定河上游，匈奴首领赫连勃勃曾经建立了大夏国的都城统万城。遥想当年，羽书驿马，铁马金戈，耀武扬威的赫连勃勃曾经登上清澈见底的无定河边的一座山岗上，面对一片绝佳的波光草色，志得意满，曾经击节赞叹曰：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流！

飞鸿传书、烽火连天、狼烟入云、火箭破空、折戟沉沙，多少年过去，一轮又一轮燃起的冲天战火、屯垦、天火、砍伐、牧放牛羊、乱挖乱掘，使时至今日无定河边，多是一堆一堆沙砾和白骨，昔日临广泽而带清流，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如今水草丰茂的晋陕蒙三省地区交界处，已经变成一片荒凉而贫瘠的土地，山风一吼，沙石乱走，黄尘蔽空。

80年代，在晋陕蒙地区，相继发现了准格尔、神府。东胜、河东等四个大型煤田和世界级天然气田，在这一地区发现了煤、气、油8类48种矿产资源，以煤炭资源最为丰富，已探明煤炭储量达2800亿吨以上，相当于全国已探明煤炭储量的1/3，其中神府煤田储量就达876亿吨，已跻身于世界七大煤田之列。

这震惊世界的发现，使晋陕蒙三角地区，重新成为一个神奇而富有的地方。

1993年冬，宋健来到鄂尔多斯高原。

发源于鄂尔多斯高原的乌兰木伦河，在它流过的地方，尽是狮黄色的高大沙丘、石山和地台。在乌兰河出产的煤，却是黑三角地区甚或全国最优质的煤，被称为乌兰煤。不久前爆发的煤海大战就发生在这里，乡镇煤窑几乎在一夜间就由十几家演化成五百多家，那时几乎是人人采煤，家家开窑，到处开花。

由于大量的废渣乱石被倒入乌兰木伦河，阻塞了河道，1989年7月21日的一场暴雨，乌兰河洪水暴涨，猛恶惊心，一举淤平了17处河道边的矿井，9处露天采坑，冲毁神府铁路多处，直接经济损失1300万元。1992年8月7日的又一次洪水的泛滥袭击，冲毁农田13万亩，草场11.7万亩，河堤工程15处，直接经济损失1380万余元。

最为可怕的是，在矿区的开发中大量的废石乱渣弃入乌兰木伦河，总量已达7千余万吨，倾倒有增无减，与日俱增，使乌兰木伦河的河床抬高了4米。乌兰木伦河上的公路大桥的桥墩已经被掩埋，如果河床继续淤积抬高，洪水将会淹没整个地区，这一地区将不复存在。更让人忧虑的是榆林地区11条主要河流中的9条已经被不同程度的污染，这些情形使亲眼目睹现状的宋健更是忧心如焚。

宋健望着满目疮痍的乌兰河山，望着苍远的流云，思绪翻滚。

生长在山坡上的芨芨草和苍耳已经忘记了过去的岁月，傲慢地笔直指斥着苍天，指斥着当地窑主，从对地面破坏性的掠夺，又转向了争夺地下的财富。他们浅薄而狂妄地叫嚣着要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谁要是挡他们财路，就和谁血战到底，他们将一个黑三角地区挖了个千疮百孔，黑三角已经在控诉和抗议。

只有褐色的地衣和苍绿的苔藓，这些宁肯受穷也不肯以身试法的平和大众，还依稀记得过去，以自己单薄而坚韧的血肉之躯勉强维护和蒙蔽着沙化的岩石的土化的土地，做着个瑟缩的梦，怀想着过去岁月的旖旎风光，不能自己。

宋健暗下决心，这样无政府的乱采乱挖现象，绝不能再让它继续下去了！

翌日，国务院环委会的现场办公会在黑三角地区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内蒙古自治区、陕西省和山西省政府的领导，国家环保局、国家计委、财政部、水利部、煤炭部、地矿部等十多个部委局的领导同志。汇报情况，提出意见，然后拿出方案。

人们注意到，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宋健又一次提出他对中国环境保护的深谋大略，宋健说：要从21世纪我国能源基地战略西移的高度来认识目前晋陕蒙接壤地区存在的问题。如果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受到破坏，将无法完成本世纪末下世纪初的能源基地重点西移的任务，将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展产生严重的影响。

宋健认为：在我国一次性能源中，煤炭的比例占到 80% 以上，从目前已经探明的储量来看，晋陕蒙接壤地区将是我国能源西移的重点，是接替山西成为我国下个世纪主要的也可能是惟一的战略资源富集地区。所以要从这个高度认识黑三角地区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的严重性。从而做出了全面治理的决定。

他说：晋陕蒙地区是黄河接壤地区，也是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其输沙量占黄河泥沙总量的 1/4 以上，是黄河粗沙的主要来源，由于受下游黄河壶口的限制，矿区大量泥沙和废渣不可能全部下泄，一旦堵塞了黄河壶口的壶嘴，使黄河泛滥成灾，后果就不堪设想，如果黄河的河床淤积抬高，那会危及黄河两岸的十多万群众的生命财产，必须防微杜渐，高度引起我们的重视。

谈到乌兰木伦河的清障问题，宋健认为需要分类分期解决，该关的关，该治理的治理，该上新技术的给他们上新技术，绝不能心慈手软。对晋陕蒙地区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则需要作为一个科学的系统工程来抓。

如今晋陕蒙地区的清障工程和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工程以及大规模的科学研究的全面展开，相信不久的将来，这里的生态和环境将会有所好转。

宋健上任伊始，所抓以上几次治理环境的行动，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为 1994 年的淮河治污行动做准备做铺垫的。淮河全流域的污染治理关涉四个省份，关涉中原地区 1.5 亿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毫不夸张地说，淮河治污行动，是中国环保有史以来一次最大规模的行动，其影响力将会震古烁今，为举世所瞩目，不管结果是好还是坏，都会造及恒远——好则泽被永久，福荫子孙后代，坏则影响幽微深远，祸及千秋万代。

不知宋健先生是否与笔者有同感？

智者打开了潘朵拉的盒子

这个邪恶女人不论如何巧舌如簧，为自己辩白，都是枉费心机，因为是她拿来了那个潘朵拉的盒子，把人类的好奇和怀疑当作钥匙，借用人類的智慧之手打开了那个潘朵拉的盒子，仅此一条，她便是人类万劫不复的罪人和仇人。

潘朵拉心情沮丧地望着在月色亮光的智慧之树下已经鼾然入眠的智者，轻声细语，她对智者说：智者，从今往后，为了逃避你智慧的追杀，我只能及早远远地避开你，真心实意地惧怕你，拿着我那只你们没有打开过的美丽的潘朵拉盒子，驾着我黑色乌云的战车，赶着我黄色狂风的骏马，赶紧逃到黑暗的地狱去！

潘朵拉一边在空中自怨自叹，一边慢慢地下降着自己的云车，这当儿，地上的人们已经全部进入了梦乡，夜深人静，银色的月光从天空朗照着绿色的草坪，草坪上静静地躺着那只美丽的黑色的潘朵拉盒子，显得十分神秘诡异。

潘朵拉正想拿走自己的盒子，赶紧逃到地狱里去，然而这时潘朵拉却发现那个智者突然醒来，并已起身，悄悄向草坪中的盒子蹑手蹑足地走来。

潘朵拉最终发现，打开了潘朵拉的盒子，恰恰是那个智者。

可怜的智者，正因为他有超人的智慧，所以他的好奇心也是超人的，

超人的好奇心折磨得智者无法入眠，于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再也无法承受好奇心透骨的折磨，悄悄地走向绿色的草坪，拿起那个潘朵拉的盒子，慢慢打开，他原本只是想着悄悄地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再把它关好，伪装成原本的样子照旧放在草坪上，让他的伙伴们永远地幸福下去快乐下去好奇下去，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盒子一经打开，便再也无法关闭，从打开的盒子里一下子飞出了许多的坏家伙，它们有着各种各样的名字：自私、贪心、残忍、淫乱、恐惧、嫉妒、痛苦、忧愁。饥饿、贫穷。卑贱、丑陋、干旱、洪水、战争、暴力、罪恶等等。

潘朵拉开心地放声大笑，笑声从她的喉咙中冲出来，化为雷声和闪电，雷电轰击着大地，从天空摧落如注的暴雨，洗净了她对人类智慧的最后一丝恐惧。

所有的人们都被雷暴和潘朵拉巨大的笑声从睡梦中惊醒，惊慌失措的人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可怕的雷电和暴雨，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充满了害怕和恐惧。

潘朵拉摇动满头黑色的长发，乌云似的长发在雷电中猎猎飞扬，她大声笑着对自己讥讽说：哦，潘朵拉，在几分钟之前，你还以为自己做错了事，太过低估了人类的智者，准备拿走你黑色的盒子，逃到地狱里躲避人类智慧的追杀。可是一眨眼你却惊奇地发现，打开你那个灾难的魔盒的不是别人，恰恰是那个智者。

潘朵拉奇怪地问自己：为什么人类有智慧可是却不会使用它？人类根本就不懂得如何卓有成效地运用他们自己的智慧，也不知道自己的智慧有何妙用？他们只是消极地使用自己的智慧，就如同随便地浪费和抛掷地球上的物质一样。他们不知道所有地球上一切物质都是有序有限的，用光之日也就是人类毁灭之时。他们也不知道人类的智慧是天地间一团最伟大的新兴的圣火，它能照亮整个宇宙，连黑暗的地狱，也无法逃避它智慧的光芒。哦，多么伟大的人类的智慧啊，我真为你惋惜！

潘朵拉眼里闪烁着青森森的电光，用雷一样的声音向人类宣布道：人类啊，你们太不懂得你们智慧的伟大了，你们富有智慧的人类如同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在玩火一样，在毫不经意地浪费和玩弄着你们伟大神圣的智慧，这些被你们玩弄的智慧像圣火一样，一方面照亮了你们人类的蒙昧和混沌，点亮了你们人类天性中善良和美丽的漫漫长夜中明亮的灯盏，同时也点燃你们人类与生俱有的那种恶的本性。

潘朵拉说：你们人类恶的本性在没有受到诱惑的情形下，往往像一条冬眠的蛇那样深深地潜藏在思想的草丛中不动声色，而一旦发现了什么诱惑它吸引它的东西，蛇的本能就会像那个好奇的智者一样从蛰伏中完全醒来，怀着疯狂的好奇无法遏制的欲望跑去打开那只潘朵拉的盒子，把盒子内的魔鬼一古脑儿释放出来。

潘朵拉大声叫嚣着为自己辩解：过去对我的那个传说是极不公平的，因为我的美丽的潘朵拉的盒子里，其实并没有事先装好七七四十九种灾难，只是装了一些人类的欲望，是这些欲望给人类带来了灾难，灾难又反过来愈加诱发了人类的这种欲望。恶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人类无限的欲求，极度的贪婪，绝对的自私，如同恶之毒焰，点燃起熊熊燃烧着的潘朵拉的胜利炉火，潘朵拉在炉火中冶炼着人类的智慧，利用人类智慧，锻铸着一只现代化的更加可怕的新的潘朵拉的魔盒。

潘朵拉为自己辩解着，说：你们人类长期衣食无忧，健康长寿，福乐无疆，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这时的人类是美丽而善良的，因为美丽和善良是罪恶和丑陋的克星。当美丽和善良占上风时罪恶和丑陋就无从立足。我的这只黑色的潘朵拉的盒子是用特殊材料造成的，只有用这种特殊材料造成的盒子才可以囚禁罪恶，关牢人类的欲望。罪恶和欲望被关在这样一只魔盒里，连我都无法打开它，自然也没有办法释放它。只有好奇和怀疑才是真正的钥匙，才可以打开这只可怕的盒子。

潘朵拉惋惜地说：可怜的人类呀，你们知道好奇和怀疑是一种什么东西吗？好奇是一个淘气的男孩，怀疑是一个疯狂的女孩，怀疑的女孩领着好奇的男孩，无意中闯入了上帝的巨大的实验室。实验室里没有人，可是却井然有序，循循有序，到处都是一些闪闪发亮的瓶瓶罐罐和一些五颜六色的色彩和颜料，到处都有发条和齿轮在转动，充斥着流动的液体和转动的东西，屋顶上还有滚动的雷电和喷涌的蓝色水流。到处都有巨大的电子计算机、巨大的屏幕和巨大的操作台，操作台上还有许多只巨大的试管和巨大的烧杯，烧杯正放在巨大的酒精灯上加热，可是上帝却不在。

潘朵拉继续说：这个怀疑的女孩和好奇的男孩，面对试验室里的一切，都觉得怀疑，都觉得好奇，一男一女两个顽劣成性的孩子，不知深浅也不知厉害，东摸摸，西碰碰，开始解剖和触摸所有的东西。于是上帝实验室中的所有东西便开始嘭嘭嘭嘭被弄得乱响，一会儿冒烟，一会儿走电，一会儿起火，一会儿漏水，整个试验室都被折腾得七零八落，东西一片狼藉，零件到处都是，一切事物全部错位。那两个顽劣的男孩子和女孩子虽然在折腾中也吃尽了苦头，一会儿被电击得鬼叫，一会儿被水淹得半死，一会儿被东西砸伤，可依然故我，依然怀疑，依然好奇，依然不肯罢手，就这么着从创世纪一直折腾到现世纪，还要继续折腾下去。

潘朵拉叹着气说：你们的这种好奇和怀疑，一方面使你们人类智慧变得更加锋利，一方面也使你们的智慧变得不可救药，你们总是在毁坏中创造，总是在创造中毁坏，总是在毫无节制地使用和毁坏着地球实验室中所有的东西，这些东西已经被你们毁坏得没有多少了。正是因为你们对智慧的毫无节制的役使，才使得你们人类的智慧走向了负面，在我的面前才显得苍白无力，无可奈何。现在我终于明白，你们人类的智慧，其实一点也不可怕，好奇和怀疑妨碍了你们正确地使用智慧，使用思考的武器和创造的武器。我终于明白，人类最大的优势也正是他最大的弱势，人类得之于智慧的创造，最终却要毁之于这种泛滥成灾的创造和智慧！

但是这个邪恶的女人，不论如何巧舌如簧地为自己辩白解释，都枉费心机，因为是她拿来了那个潘朵拉的盒子，把人类的好奇和怀疑当作钥匙，借用人類的智慧之手打开了那个潘朵拉的盒子，仅此一条，她便是人类的万劫不复的罪人和仇人。

自从七七四十九种灾难从潘朵拉的盒子里跑出来，这些坏家伙来到人世间安家落户，人类的好日子便宣告结束，失去了过去那种富足祥和。福乐无疆、无忧无虑的生活，时刻遭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死亡和疾病的威胁，时刻遭受着诸如贫穷、战争、暴力、罪恶、苦难、痛苦、恐怖、疾病、污染等等灾难的威胁。

天灾和人祸总是相伴而行，从此之后，人类的好日子便过完了。

也就是从那时起，人类便踏上了追踪潘朵拉的漫漫长路。

淮河断想：骚人墨客今何在

中国政府深知，肘腋之患不除，便会演化为心腹大患。壮士何以断腕乎？并非吃饱了撑的，而是因为那手被毒蛇咬了一口，如果没有勇气及时地砍掉毒手，贻误时间就会毒气攻心，毒发身亡。

为追踪那个妇人潘朵拉，笔者曾在四月间，与李风、老潘、王厉子、祖伟数人赴淮，日行程数百公里，十数日间往来穿梭，逡巡于臭河黑水之间，惊骇于沿途所闻所见。古人以为升平之象征，便是海晏河清，岂料如今河已不清，不免想问：海将奈何？一路奔波采访，遍阅资料，深知个中情缘。为治理污染，中国政府几年内在全国相继关停并转了六万余个污染企业，仅淮河流域就关停了上万家企业，如此大的举措，如此不惜牺牲经济利益的坚定决心，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没有的，在世界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如此慷慨悲歌的壮士断腕之举，真个是悲壮之至，让人又是为之感奋，又是为之伤怀，故草填五阙小词，以记淮河之行，谨录在此，以博共识。

其一

可叹肝胆英雄，千古以慨当歌，埋骨青山处。望穿烟柳湖，情寄神州路。尚存一段忠骨，不复绿水无数，臭浆潦掌故。河黯平畴瘦，草枯天低树。

其二

休提鱼跳鸥翻，莫濯红巾翠袖，谁上苦初透。浊沫随风臭，污水挟波流。昏鸦老树这穷，流水小桥日暮，临渴两岸羞。漫滤初始平，民生一时休。

其三

流域六千关问，沿岸十万瘟神，亿五人可证。望河如望梅，饮水似饮鸩。世间多少真情，水中可见分明，何不现慈身。明枪还好躲，污水太伤人。

其四

只求淮水清明，无意涂山卧虎，揭竿论高古。危卵垒陈胜，诸侯猎狐兔。大风起于汉祖，霸业溃于西楚，天下分三户。殷勤细问鼎，中原立九足。

其五

勿令英雄重生，恐无青山埋骨，忠魂成野鬼。日月岂可昧，天地总关怀。鲲鹏何妨再举，诸子仍须唤回，经载道德归。神威奋夏禹，碧水止酸悲。

中国政府深知，肘腋之患不除，便会演化为心腹大患。壮士何以断腕乎？并非吃饱了撑的，而是因为那手被毒蛇咬了一口，如果没有勇气及时地砍掉毒手，贻误时间就会毒气攻心，毒发身亡。

所以在 20 世纪末，中国政府正在以这种大无畏的义无反顾的壮士断腕的悲壮勇毅的精神和艰苦卓绝永不后退的行动，重新改写中国的环境史，这在中国时日无多的短暂的环境史上是前无古人的最辉煌的一页。

这仅仅是一个良好开端，虽然这个开端前无古人，但是发端之后，却会有许多的来者继续。可想而知，到那时我们的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会是一个海晏河清山明水秀青天白日名副其实的锦绣中华，会是一个经济大国

也是一个环境大国。

九、规模宏大的绿色冲击波

与曲格平教授一席谈

显然，作为主管意识形态和舆论工作的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在明确表态支持“中华环保世纪行”的同时，也为如何正确地把握新闻导向和舆论监督这个尺度，很是动了一番脑筋。

1992年，国务院总理李鹏在联合国召开的里约热内卢的首脑级环保会议上，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向全世界表达了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经济的焦虑，并进一步面对国际社会做出积极的姿态和承诺。时过两年以后，中国政府又以刻不容缓的果敢精神，以铁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念，针对淮河污染日益严重的问题，做出一个规模宏大的战略性决策。

这是一场不论从重要意义还是行动规模上都可与著名的淮海战役相媲美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要战役，国务委员宋健代表中国政府，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政府决心治理淮河污染，并且有信心使淮河在2000年变清。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和力度最大的一次治理河流污染的政府行动，也是一场中国有史以来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监督作用的最民主的行动，不论是从中国环保史出发，还是从中国新闻史来讲，都应该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它不仅是一座中国环保史上的丰碑，也是一座中国新闻史上的丰碑。

所以我们有必要认真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有必要知道它的前因后果，更有必要弄明白藏在行动背后的行动和新闻背后的新闻——有什么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有什么行而未果的棘手事件？有什么闻所未闻的背景消息？有什么耸人听闻的内幕新闻？有什么未曾披露的甘苦秘辛，或是精心设立的波诡云谲的骗局？本着对过去、现在、将来负责的精神，有必要弄个水落石出。

为此，我们首先采访了人大环资委主任曲格平教授。

1998年5月6日下午，笔者和“新闻30分”的编辑王厉子先生，一同采访了原国家环保局第一任局长，现任人大环资委主任的曲格平教授。

1969年，曲格平由燃化部，调到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工作。至少从那个时候起，周恩来总理便开始不断地提到“公害”问题。

由于周恩来的督导有方和牵线搭桥，从那时候起，年轻的曲格平便心有所属，与刚刚起步的中国环保事业一见钟情，并在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大会上与刚刚起步的全球性的环境保护事业互订了终身。

次年8月5日由国务院出面召开的首届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双方相互再次巩固了感情，到国务院成立了环境保护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宣布曲格平为负责人之一。那时的曲格平，便等于吹吹打打地与中国环境保护事业这位尚且稚嫩的新嫁娘，正式拜了天地，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

这位壮心不已的老人似乎早已打定主意，要为中国的环保事业和世界的环保事业贡献毕生的精力，48年如一日，执著近半个世纪，对环保事业

不懈追求与一往深情，可谓与环保事业血肉相连，息息相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是一位我心仪已久的，对中国的环保事业与世界的环保事业，都做出过杰出贡献的老人，几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这么说，他就是一本活的中国环保史。

究竟他是中国的环保史？还是中国的环保史是他？是他在环保史的书页里，还是环保史在他的血脉中，二者已经密切得不那么容易分离，不那么容易弄清爽了。

年已 68 岁的曲格平教授，体态与身材都保持得很好。从那张相貌端庄，表情慈蔼的脸上，几乎看不出岁月的风霜雨雪蚀磨出的痕迹，浑身上下洋溢着一种生命活力，看不出丝毫老态，只是头发微微的花白，微微的有些稀疏解顶。

这是一位十分富有学养、举止安详、谈吐儒雅的老人，谈话时，常伴有丰富的动作不大的手势，每每的就会随着说话而激动起来，这时，老人的两只眯着的眼睛便会睁得很开，神采奕奕地环视着周遭，不时有激情的火花在其间闪烁生辉。

我首先问了老人家一个关于中华环保世纪行的问题。

曲格平教授说：是我提议的，人大批准的、中国的环境保护，一个是立法，一个是司法机构的监督，但是光靠一府两院的监督还是不够的。我总觉得这个舆论的监督对中国来讲特别的重要，我们的很多法律不一定他们不知道，知道了他们也不执行。而且据我所观察到的情况看，我们的那些地方的和工厂的一些领导，对什么通报啦批评啦他们都不在乎，可是对报纸上电视上的舆论监督反而很在乎。我工作多少年啦，几乎每回都是这样的，我觉得在这方面大有作为。所以我就光找厂分管我们的王丙乾，王丙乾赞成。又找了田纪云，田纪云也支持后来我又找了乔石，乔石也支持，都支持！我就讲，我们的监督除了法律的，行政的，还应该有舆论监督，这也是我们整个人大监督的一个方面，听取群众的意见，来敦促政府开展工作他们认为这是完全对的，在理论和各个方面都是站得住脚的。以后到国务院去征求意见，他们也去了，当时李鹏、朱镕基都站出来支持了，都有批示。

说到这里，曲格平找来秘书，让他去找一下批件。我们后来拿到了批示，其中有一些是公开的，有一些是没有公开的，摘要在这里公开一些。

李鹏先后两次为中华环保世纪行题词并多次做过指示。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 1995 年 8 月，李鹏会见全国人大环资委有关负责同志时说的一番话，充分体现出一种可贵的民主作风，说：贯彻环保基本国策，还要搞好宣传教育，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发挥人民的监督作用，促进政府和企业加大执法力度。全国人大环资委牵头组织的中华世纪环保行活动，是一种有效的宣传手段，也是一种有效的舆论监督方式，建议中华环保世纪行对一些污染严重的现象予以曝光。同时，也应该表扬一些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有成效的典型，使人民群众看到政府的决心，也指出解决的办法和路子，增加群众对污染治理的信心。

继而，在 1996 年 7 月 15 日，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李鹏又再次强调：要注意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继续开展中华环保世纪行。

最值得一提的是 1997 年 10 月 5 日，李鹏在会见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

合作委员会成员谈话中，很明确地再次重申和强调了党和政府的民主态度：

这几年，中国在环境保护立法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现在，针对水、气、固体废料、噪声等方面的污染，都制定了法律和法规，水资源法、森林法、矿产资源法也相继问世。这就是说，在更大的范围内加强对环境的保护。当然，立法本身不是最终目的，立了法不监督也不行。不知朋友们是否知道？中国有个名叫中华环保世纪行的电视节目，通过电视表彰环保做得好的，同时对破坏环境的违法行为进行批评，对其中恶劣的典型事例进行曝光，这是一种比罚款和撤职更有效的方式。有些地方政府。企业不怕批评，不怕撤职，就怕在电视上曝光。因此我们要加强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

乔石在 1993 年 7 月的《关于筹备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的请示》上做了赞成的批示，并在 1995 年为之题词“保护环境促进发展”。

1997 年 6 月 18 日，在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乔石又指出：各级人大开展的环保世纪行活动，是一种很好的舆论监督方式，要认真总结经验，不断加以完善。要把人大监督和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结合起来，切实提高监督工作的水平。

朱镕基在 1993 年指出：世纪行与质量万里行一样，搞得很好，向同志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田纪云 1993 年为中华环保世纪行题名“中华环保世纪行”。

曲格平教授在这里特别强调说：我又找了丁关根，丁关根也支持，他是宣传部长，管舆论的，他要是不支持，以后也会很麻烦的。

时过许久，曲格平已经记不住当年丁关根所说的原话，但找到了丁关根 1995 年 3 月对中华环保世纪行所做的专门指示：

像质量万里行一样，中华环保世纪行活动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对表彰先进，鞭策落后，树立新风起到了推动作用。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要继续加大宣传力度，宣传中要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多宣传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多报道我国在环保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多介绍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知识。同时要加强舆论监督。对于环保问题的揭露和批评，要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环境污染严重，群众意见很大，有关方面也想解决，但是环保问题原因复杂，一时难于解决。

对于这种情况，可通过内参反映，不宜公开揭露曝光。因为单纯揭露曝光并不能促进处理，反而激起群众更大的不满，不利于安定团结。另一种情况是环境破坏严重，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拖在那里不去解决，这就是官僚主义，对于这种情况，要正确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报道时，一定要注意进行很好的调查研究，事实要准确，并尽可能取得当地党委和政府的支持，促进问题的解决。

显然，作为主管意识形态和舆论工作的中宣部部长的丁关根，在明确表态支持“中华环保世纪行”的同时，也为如何正确地把握新闻导向舆论监督这个尺度，很是动了一番脑筋。

曲格平教授说：以前提议时叫“中华环保纪行”，后来增添一字为“中华环保世纪行”。这是个大行动，任何一个别的什么部门出面都是不好挑头的，只有人大出面才可以把各个部门都统起来。所以组成了由人大环资委、中宣部等 16 家单位参加的中华环保世纪行组委会。1993 年第一届中华环保世纪行开始，这次活动中，通过电视，报道了河南小造纸厂污染河流、毁坏农业生产、使淮河两岸居民无水可饮的严重情况，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

国务院马上做出治理的决定，这样一来，可以说，中华环保世纪行一炮打响，第一次就成功了……

这时我插话道：那个河南小造纸厂污染的河流，是不是叫小黑河和小洪河？

我的问话使曲格平教授明显地兴奋起来，一迭声地道：对，对，不错，就是叫个小黑河，他们那个拍新闻的小伙子叫什么来着？叫李、李什么……

我和王厉子不约而同地提醒他说：叫李风。

曲格平教授连连首肯：对，是那个李风！

紧接着，曲格平教授坐直身腰，满脸全是笑容，眉飞色舞的，两只大睁着的老眼奕奕闪着神采，做了个幅度很大很有力的手势，像个小小伙子那样充满激情地叫了起来：哎呀，真不得了，那河水跟黑醋一样，看得人心里真不知是啥滋味，我一边看电视一边就想，这个李风，简直是太棒了，真是太棒了！

我也不由地为之兴奋起来，一方面被曲格平教授一反常态的激情所感染，另一方面也觉得这真是一个出乎意外的巨大收获，因为连李风自己也不知道，他当年所拍的三条新闻报道，至今提起，还会被如此德高望重的一位高层领导赞不绝口。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接下来曲格平教授披露给我的，还有比这些更出乎我意料的鲜为人知的内幕消息，这样的内幕消息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很少见的。

曲格平教授一再提到的记者李风，究竟是个什么人物呢？

曲格平教授和斯德哥尔摩

像是找到一面镜子，通过对照分析，猛然看

到了中国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中国城市和江河的

污染并不亚于西方国家，而自然生态的破坏程度

却远远在西方国家之上。

中国的环境保护历史，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7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正在惨烈地进行，到处都在停产闹革命，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神州大地一片混乱，到处都在打砸抢，大搞红色恐怖。

那时我们的中国是很自负的，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产生污染，而实际上环境污染和破坏正在我国迅速蔓延着，但毫无觉察，即或有点觉察，也以为微不足道，认为阴沟里翻不了无产阶级的艘艘大船。

中国政府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派团参加斯德哥尔摩的人类环境大会的，实在是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也出乎国际社会的意料。

这全是周恩来总理高瞻远瞩的决定，他看到了环境问题潜在的威胁，让闭目塞听的中国走出国门去，看看世界上发生的事情。

曲格平教授参加了代表团筹备组和环发会议的全过程，代表团由国家计划、外交、冶金、轻工、卫生、核工业、石油化工、农业等部门和北京、上海以及科技界的40多人组成，为政治斗争而去，浩浩荡荡，杀奔斯德哥尔摩。

到了斯德哥尔摩，面对那些金发碧眼黑皮鬃毛的大大小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代表，代表团一行人，一方面，处处觉得资本主义新鲜希罕，却不敢表露，另一方面，满脸悉数是阶级斗争为纲的警惕性，浑身全是无产阶级专

政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铁蒺藜，大事小事都用毛泽东思想的尺子度量一番，越想越觉得身处资本主义国家，真个是凶险莫测，简直处处均是陷阱，事事悉是阴谋，人人都不怀好意。

如此这般地完成任务，胜利归来时，总算松了一口气，怀着总算没有出事的欣慰和后怕，在上报的会议总结中，历数的全是在会议上的政治斗争，而对那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和讨论的重点——环境和发展，却只字不提。

尽管如此，那次会议仍然给中国代表团上了生动的一课，使代表团的成员们和曲格平教授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了环保的重要性，用曲格平教授的话说，像是找到一面镜子，通过对照分析，猛然看到了中国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中国城市和江河的污染并不亚于西方国家，而自然生态的破坏程度却远在西方国家之上。

在一次代表团少数人参加的会议上，曲格平教授的这种认识得到了共鸣，而且通过各种渠道把这种认识和觉醒迅速传播开去，使周恩来、李先念、余秋里等领导人也都了解到了这种情况，并且引起了重视。这样做的结果是 1973 年召开中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思想基础。

这一段时间里，在中国连续发生了几起大的污染事件，大连海湾因污染源污染使六处滩涂养殖场关闭，渤海湾、上海港口、南京港口也有类似的情形。与此同时卫生部也报告说，我国的许多食品饮料因滥用化学添加剂造成严重危害，官厅水库遭污染，威胁到北京饮水安全。

为此，周恩来总理发出指示进行调查。曲格平教授也参与了调查，并鉴于环境污染事件的不断发生，建议召开一次专门会议研究防治办法。

这样一来，又为中国第一届环境保护会议的召开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1973 年 8 月 5 日，以国务院的名义召开了全国环境保护大会，各省、市、自治区及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工厂代表、科学界人士的代表共 300 余人出席了会议。由于会前充分做了思想工作，鼓励他们大胆暴露问题，所以大会比较充分地揭露了中国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方面的严重问题。

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海河、辽河等主要江河大面积的水质恶化，鱼产品大幅度下降甚至绝迹，大中城市附近的河流和地下水普遍遭到污染，大连、天津、青岛、上海等海湾污染也很严重；大中城市烟雾弥漫，疾病增加，农作物大面积受害；工业污染、农药污染、森林、草原和珍稀野生动物遭破坏也比较突出。

会议列举的大量触目惊心的事实使与会者大为震惊，会议越开越深入，越开越热烈，以至周恩来总理觉得有必要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有党、政、军、民、学各界代表出席的万人大会，把环境保护一举推向全社会。

曲格平教授在大会期间负责印发简报，共印发了 16 期简报，在征得领导同意后又加印了 6 期简报增刊和 6 期“环境保护情况反映”，送中央领导传阅，并提议将六期“增刊”和 6 期“情况”印发中央各部门领导和各省、市、自治区领导。

国务院领导同意了这一请求，由国家计委向各省、市、区革命委员会和国务院各部门转发了这 12 期简报，虽然印有请注意保密字样，但是实际上却把全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情况通报了全国。

曲格平教授对此感慨很多，认为在“文革”期间竟然能召开环境会议，并允许揭露“社会主义阴暗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全靠了周恩来

总理的支持。

当时“四人帮”正忙于抢班夺权，未出面进行反对和阻挠，他们对环境保护持有的不屑一顾的态度。

大会结束后各地方也仿照国家的做法，广为宣传，相继召开会议，建立工作机构，开展环境治理，在全国建国以来第一次掀起了一股小小的治理环境保护的热潮。鲜为人知的中国环境保护事业，便是这样开展起来的。

中国环境保护事业在“文革”的一片混乱和喧嚣之中就这样艰难地上路了。

曲格平教授认为：第一次全国保护环境的会议，最大的功绩在于宣传和认识了环保的重要性，并开始正式的摆上了中国的工作议程。如果没有周恩来总理的大力支持，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至少要推迟十年，那样的话，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不久后，建立了国务院环境保护小组，下设办公室，曲格平教授是负责人之一。

国环办是个不上编制的临时机构，但在组织和推动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上还是起了不少作用。国环办建立的第一件事，就是督促各地建立工作机构，各地也大都设立了相应的临时性机构。他们对工作抓得都很紧，很快就打开了工作局面。北京、天津、上海、沈阳、广州、武汉等一大批大中城市，进一步做了环境污染状况的调查和评价，对于加深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对环境的认识，起了重要的作用。

同时在全国城市广泛开展了以消除烟尘为主要内容的环境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与此同时，国家还主要抓了一些污染严重地区的治理，像官厅水库的污染治理、白洋淀的污染治理，淄博的环境污染治理、沈阳市的大气污染治理，杭州、苏州和桂林的污染治理等等。其中官厅水库和桂林漓江的污染治理，因为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治理得最为彻底也最为成功，并且起到了防微杜渐的效果。

中国的国情，似乎从来就是这样，只要最高决策层下了真正的决心，真正为之重视，真正为之不遗余力，事必躬亲的督办解决，便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成的。

淮河行动的首战告捷，便是一个最典型的范例。

国家环保局第一任局长

1992年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发大会，183个国家派代表团、102位国家元首或是政府首脑出席了会议。以李鹏为团长、曲格平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一行60多人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与斯德哥尔摩大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1976年10月，曲格平教授卸去中国常驻联合国环境署代表职务，从内罗毕乘机回到北京。曲格平教授在内罗毕期间，对西方国家环境政策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并结合中国的情况有过一些考虑，认为中国的环境治理，必须从立法开始。

当时认识到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经两年起草和广泛征求意见，1979年9月五届人大第十一次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从而结束了中国无环境保护法的历史。

曲格平教授参与了立法，他认为其中有四点特别值得一提。

一是设立了环境保护机构并确定其职能。如果不建立完整的环境保护管理机构体系，环境保护只能停留在原地踏步。经过积极努力争取，建立环境保护机构被写进了环保法。法中规定：国务院设环境保护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环境保护局。市、自治州、县、自治县根据需要设立环境保护机构。

二是明确了环境责任，建立了排污收费制度。从 1973 年开展环境保护工作以来，工厂和工业部门一直认为排放污染物是理所当然的事，治理污染不是他们的责任，而许多地区的环境管理部门又在从事污染治理。各级环保部门都存在着分歧，有的认为环境保护局就是治理污染的，有的认为环境保护局主要是管理和监督职能，不是具体治理污染的。环境责任划不清楚，就难以推动环保事业的发展。

为此，环保法中明确规定：谁污染谁治理。从而划清了环境污染治理的责任，也明确了环境部门的管理职能。根据这条原则还规定了征收超标排污费。

这是一条中国式的创举，不仅促进了污染的治理，而且对于强化我国的环境监督管理和环境机构的能力建设，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是规定了环境影响报告制度。环保法规定，凡属新建、改建、扩建工程时必须提出对环境影响的报告书，经环境保护部门审批后才能进行设计。

这是从国外学来的，当时这种制度只在有数的几个国家中施行。这项先评价后建设的制度，有助于正本清源，是预防环境污染的积极措施，这项措施写进环境保护法里，奠定了环境保护在我国基本建设中的法律地位。

四是规定了“三同时”制度，为了控制工业污染，从 70 年代初试行一种“三同时”的做法，即防治环境污染的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

实践证明，这是控制工业污染的有效手段。把这项土生土长的中国环境保护的经验写进法里，使之成为了一项控制环境污染的重要措施。

1982 年秋，有曲格平教授参加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万里提出环保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的建议。同年底，在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的会议上，李鹏代表国务院所做的报告中宣布：环境保护是一项基本国策。

1982 年，经国务院批准，环境管理机构从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单列进入政府序列，把环保局正式改为国家环保局，但隶属关系不变。

这种隶属关系直到 1988 年机构改革中才宣告结束。

国家环保局从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正式分出来，成为国务院的直属局，曲格平教授继续任局长。在此期间，国家环保局抓紧了环境法规的起草。全国人大陆续颁布了《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环境立法步伐的明显加快，与环境保护是一项基本国策的确立是分不开的，三大环境政策思想和各项环境管理制度的出台，说明了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渐趋成熟。

发达国家在对环境的治理上，大都只提要求，不管做法，只管两头，就工业企业来说，只管建设前的影响评估和建成投产后是否环境达标。你如果达不到环境标准，那就对不起，你只能停产，只能关门大吉，绝没有别的什么话好说。

中国除在两头管理外，还给予中间引导，如果建成后环境影响不达标，

还不会一棒子打死，有限期治污一说，这里便有点中国式的仁义道德了。

在环境投入上，发达国家推行的是高标准，高投入，严要求，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逐步提高环境标准，不断提高环境投入的方式，期望在有限的资金投入下，达到控制污染的最大的效果。似乎又有些理想主义的色彩和过高奢望了。

1992年6月3日至14日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环境与发展大会，183个国家派代表团、102位国家元首或是政府首脑出席了会议。

以李鹏总理为团长、曲格平教授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一行60多人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与曲格平教授20年前参加的斯德哥尔摩环发大会，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说明了中国政府对环境保护问题的认识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也说明了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卓有成效。

1990年曲格平教授年满60岁，提出辞去国家环保局局长的职务，国务院领导要他到1993年政府换届时再下来。

1992年底曲格平教授被山东省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在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曲格平教授被选为主席团成员，接着又被选为八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

1993年6月，曲格平教授正式离开了他任职11年之久的国家环保局局长的职位，到全国人大环资委任职，时年63岁，已经在环保战线工作了40多年。

曲格平教授和中国的环保立法

1993年通过电视，报道了河南小造纸厂污染

河流、毁坏农业生产、使淮河两岸居民无水可饮的严重情况，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国务院马上做出治理的决定，环保世纪行一炮打响。

我见到曲格平教授时，他已经是68岁的老人，至今仍然坚守在环资委的工作岗位上，为中国的环保事业呕心沥血，贡献余热。

在全国人大环资委工作期间，曲格平教授为国际环境事务做了大量工作，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以后，联合国秘书长加利为了更好地处理国际间的环境保护事务，成立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咨询委员会，由国际经济和环境知名人士21人组成。

曲格平教授也被聘请担任这个委员会的委员，每年开两次会议，就秘书长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加利秘书长亲自到会听取意见。

第一届期满后，征得曲格平教授的同意，又聘请他延长一期。

除此之外，曲格平教授还是联合国全球环境基金的高级顾问，为筹款和分配全球环境资金，经常被邀请开会。

这项基金是联合国环发大会后新建的组织，按照环发大会的决定，发达国家每年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占其GNP0.7%的官方援助资金（ODA）。

这样，每年可以筹集到1200亿美元以上的资金，其中很大一部分要用于援助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治理。

但是，发达国家没有执行环发大会的决定，全球环境资金只筹集到20多亿美元。

钱虽然不多，但由于分配使用得当，使发展中国家也从中得到了一点

实惠。

曲格平教授真诚地希望全球环境基金能够不断地得以扩大起来，以便为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保护做出更大的贡献。

曲格平教授在全国人大环资委工作期间，主要做了三件事。

一是构筑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修改通过了《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制定了新的《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使被称为四害的水、气、渣、声污染防治都有了相应的法律，加上原有的《环境保护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等，可以说我国控制污染的法律法规体系已经初步形成。

在资源开发利用保护方面，修改通过了《矿产资源法》和《煤炭法》，并参与修改了《水法》和《森林法》以及《土地管理法》等法律。

特别是在新刑法中增设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一节，一改环境保护处罚过轻过软的弊端，增强了环保法律的威慑性和权威性。

二是开展了环境资源保护的执法检查，五年期间，全国人大环资委共组织了 33 个检查团和检查组，检查了《环境保护法》、《森林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水土保持法》、《草原法》等法律的执行情况，检查时间延续之长、规格之高、声势之浩大、效果之好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检查中敢于碰硬，敢于揭露问题，不走过场，督促解决问题。特别是对京、津、沪三市的执法检查，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通过检查，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的现象。

三是开展了环境与资源保护的舆论监督工作，开展了中华环保世纪行活动，具体情况笔者在前边章节中已经予以披露，几年来共有 1000 多家新闻单位、5000 多名记者参加采访活动，编发各类稿件 36000 多篇，普及了全民的环保意识，在全国掀起了一次又一次规模宏大的绿色冲击波，提高了全民的环保法律意识。

笔者在采访曲格平教授时，承蒙曲格平教授赠书，这是一本他写的由吉林人民出版社《绿色文库》推出的《我们需要一场变革》的新书，只印制发行 1000 册。

这本书中收入了这些年曲格平教授所写和发表过的一些文章，对我最有教益的是开头的一篇序，本文大量的资料都来自这篇序言。

序言中写到中华环保世纪行时，曲格平教授满怀激情地这样写道：

1993 年通过电视，报道了河南小造纸厂污染河流、毁坏农业生产、使淮河两岸居民无水可饮的严重情况，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国务院马上做出治理淮河污染的决定。环保世纪行一炮打响。随着，又接连报道了晋陕蒙“黑三角”煤炭乱采滥挖小秦岭金矿乱采滥挖、野生珍稀动物非法买卖等许多触目惊心的事例，形成了强大的舆论监督力量，促使了这些问题的解决……

曲格平教授在文中所说的“河南小造纸厂污染河流”一事，便是本文在前边已经提到的李风，当年制作的三条有关小黑河和小洪河严重污染的新闻报道。

我这才恍然大悟，难怪时过五年之久，曲格平教授对小黑河和小洪河的污染事件仍然记忆犹新，原来已经写入了他的这本《我们需要一场变革》的书中了。

十、守护天使解振华

平民出身的解振华

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从看图识字到上小学，从无知到有知，可谓经历了新中国成长的每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在他生命之树的年轮上，可以找到新中国逐年发展壮大的每一圈年轮的历史痕迹。

1949年10月1日，是个历史性的日子，在这个日子，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一个月零十八天，脚前脚后，天津市一户姓解人家呱呱堕地一个男婴。这个男婴的出生可谓恰逢其时，暗结珠胎于旧中国，十月怀胎之时，势不可当的解放大军还在与蒋家王朝争夺大好河山，一朝分娩，却已经出生于清风化雨的新中国。三座有形的大山没有压着他，离乱之时的腥风血雨也没有淋着他，可谓幸甚。只是这个虎头虎脑男婴的出生，一方面十分讨父母喜欢，一方面却也让父母忧心忡忡。因为那时中国尚且崇尚多子多福，解家自然也不例外。

这个男婴的出世，在解家子女已经排行老八，给原本生活已经十分捉襟见肘拮据困难的解家，多添了一张嗷嗷待哺的小嘴，少不了要与众多子女分一杯羹了。

虽然如此困难，父母却没有二话，照旧敞开丰腴的怀抱，悉心养起，挺起压弯的脊梁，再努力地负重一个孩子，再苦再累也只苦累父母，尽量不让自己的儿女们受什么委屈，这不仅是东方式为人父母的仁爱，也是所有人类共有的天性。

父母见这个排行老八的婴儿生得虎头虎脑，又恰逢新中国成立，中华有望振兴富强，百姓有望丰衣足食，儿女有望成龙变凤，不免欢欣鼓舞，便寄予厚望，起个大名叫解振华，意谓振兴中华之意。

解振华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从看图识字到上小学，从无知到有知，可谓经历了新中国成长的每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在他生命之树的年轮上，可以找到新中国逐年发展壮大的每一圈年轮的历史痕迹。

随着城市社会主义改造和农村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实施，很快就迎来了1958年的大跃进。那时的解振华刚刚九岁，正在天津市一所小学读书，小小年纪，便耳闻目睹了当时一切狂热而盲目的跃进现象，发着高热的人们，为了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去吃土豆烧牛肉，是如何义无反顾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而砸了自己家的小锅，吃起了共产主义的大锅饭，人们是如何战天斗地，如何毁林开荒，如何围湖造田，如何建起无数个土法炼铁炉，让钢铁元帅升帐，炉火熊熊，大炼钢铁，几乎砍光了附近山上地里的所有的树木做炼钢铁的柴薪，结果炼出了无数个似铁非铁似钢非钢的黑疙瘩，永远地废弃在荒郊野外，生锈腐烂，成了没用的东西。

遗憾的是盲目乐观，狂热蛮干，是不可以当饭吃的。

很快，那些发高热的人们便尝到了自然规律的报复，三面红旗迎风飘

扬的最终结果是迎来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三年困难时期。

这些善良的人们，岂但没有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天天去吃土豆烧牛肉，却很快便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现在看来，三年自然灾害，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自然生态对盲目大跃进，对自然生态放纵破坏的一次大报复和总清算，大跃进造成的森林破坏，水土流失，是水旱灾害频仍的根源。所谓的天怒人怨，是自然清算驴打滚一般叠加起来的社会利息，这些负增长的利息是新中国永远的一笔欠账。

加上在当时那种情形下，人为的虚报冒进，隐瞒真实的经济状况，使得毛泽东他老人家要赌一口气，不向修正主义低头，以至让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给已经被定性为修正主义的苏联还债，这样一来，便使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了一个经济大萧条的苦难岁月。

那时的解振华，正处在长身体的时候，挨饿的滋味自然是饱尝过的，虽然我没有问起过他的这一段经历，但以我自己的经验，那时不挨饿的人几乎没有，比我大六岁的解振华，对饥饿的滋味，不用多说，至今一定记忆犹新。

1962年至1965年是中国实行战略调整的几年，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减少基本建设投资、增收节支，力争财政平衡、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恢复农业生产、关停部分厂矿等等。调整以后，中国的经济刚刚喘过一口气来，理论学家们还没有认真的加以总结研究，引申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战略方针。

然而，时日实在无多，1966年，“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

十年“文化大革命”与1958年大跃进一脉相承，似乎无非一种思想模式的花样翻新，或是一种方兴未艾的激进愿望的继续，不同的是由一种物质的跃进，变成了一种精神的跃进，内在的核心理论和路线的本质丝毫没有改变，只是换了一种全新的包装和一种更加荒唐更加狂热的表现形式而已。

时至今日，经历过那一段日子的人，说什么的都有，说什么都嫌过分，事实上任何一种评价，都无法抹煞已经发生的事实，而历史只是一种事实的凝聚物。

往往历史学家们从这些历史的凝聚物中寻取的都是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而挑挑捡捡的最终是遗漏了许多不为人注意的小东西，而恰恰是这些不起眼的小东西，构成了那些历史的大东西，小东西往往才是历史最重要的构成部分。

这样一个小东西，有许多个名字，钟表匠认为它们该叫油丝或是发条，没有油丝和发条的手表和钟表便不会走动；工程师以为它们该叫镙丝，再庞然大物的机器部件，也得靠小小的镙丝来拧紧固定；小说家管它们叫细节，因为没有细节就无法构成情节，而没有情节就等于没有故事，没有故事也就没有了历史。

至于确切的它是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这些认识对于某一个具体的存在永远都是正确的，而对抽象的那个存在却往往是不正确的，所以任何一种对历史的评价，都无法是精确的或是正确无误的，因为主观的永远是人，而客观的只能是物，历史就是物化的时空延续，时空只有在物化的历史中，才能找到淹没的痕迹。

本届政府最年轻的部长

原本是一张国字脸，可是营养不良却像一个

蹩脚的书法家，将这个国字书写得又窄又长。虽然如此，笔力看起来却还遒劲，铁钩银画的脸部轮廓和一个线条很硬的宽下巴，显示了主人公内心世界鲜为人知的力透纸背的顽强和坚毅。

作为老三届的解振华，他在“文革”的那一段历史，已经物化为过去，如何评价过去那个自己，是解振华自己的事情，姑且抛开不谈。

我只专注于细节的寻找，细节是解振华个子长得很高，像一株生命力十分顽强的山毛榉，足有一米八零，身体看上去有些单薄和瘦削。原本是一张国字脸，可是营养不良却像一个蹩脚的书法家，将这个国字书写得又窄又长。虽然如此，笔力看起来却还遒劲，铁钩银画的脸部轮廓和一个线条很硬的宽下巴，显示了主人公内心世界鲜为人知的力透纸背的顽强和坚毅。

他戴着一顶已经洗得看不清本色的软塌塌的单军帽，两条长长的腿上套着一条皱巴巴的肥厚的黄色的棉裤，上身着一件有点显小的同样颜色的棉袄，右腿微微的罗圈着，身子右侧扭动，双手背在身后，目视前方。在他的身体两旁各有一个穿黑色棉袄的年轻男子，取肃立的站姿，其乐无穷地专注着一件事情，那就是照相。

背景有几株亭亭玉立的白桦，很白很美很笔直的，像一支白色的大铅笔，还有一顶很大的开着小窗户的军用帐篷，隐隐约约可以看见半堵墙壁那么高的黑色的山林的轮廓线，远处和近处的地上似乎都积满了白雪，乱扔着一些黑色的烧焦了的树木的骨殖。天空是灰白色的，看不出是晴天还是阴天，自然也没有日本民歌中那种“亭亭白桦，悠悠碧空”的罗曼蒂克的艺术效果。

以上所述根本不是一支歌曲中的画面，而是解振华在北大荒五度春秋的知青生活中一段实实在在的照片写真，遗憾的是那张照片不是彩色的，而是黑白的，从尺幅方寸上看，好像还是用当时流行的国产 120 海鸥牌照相机拍摄的。

这样的照片，被时下称之为老照片，有的成为珍品，已经不多见了。

1968 年，年仅 19 岁的解振华，告别天津市的亲人和朋友，响应老人家“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黑河地区德州县二龙山农场一师六团插队落户，以上的那幅照片，是在 1970 年早春，摄于小兴安岭的深山密林之中。

那是一段让解振华永难忘怀的日子。

翻开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8 年 2 月出版的《知青老照片》，中间收了解振华的一篇对那段日子的怀念文章并佐以两幅黑白照片，一幅是已经描写过的，还有一幅是与知青战友摄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六团团部的照片，照片上的景色已经是夏日的样子，解振华比两个战友高出半头，穿着一身单军衣，仍然像冬天那样背抄着双手，眯缝着两只眼睛，抿着坚毅的嘴巴，目视前方，那副自信的神情和坦然的样子，似乎已经很可以让人想见一些现在的什么了。

然而当时的解振华，事实上什么也没有多想，那时他的心里，就像小兴安岭一样，空旷着一片萧森，萧森着一片空旷。白天不是抡着大锤劈山、取石、砌墙，就是拉着大锯伐树、锯木头。截木拌子。填不饱肚子，吃不上蔬菜，一天干下来，个个都累得贼死，晚上扎堆儿听一个半导体，扎堆儿在一起比赛打呼噜。

在那样一段日子，体力的较量已经压倒知识的竞赛，希望像一只黑

夜里的萤火虫，远远地怯生生地不敢飞近美丽的憧憬，青春的火焰在静静地寂寞无望地燃烧，一日复一日，天天一个样，相信那时无论是谁，男性或是女性，都可能只注视着今天，对明天则不抱任何幻想，谁也无法为自己设计一个不重样的明天。

那是一段连幻想和希望都被专了政，被缝上耻辱的“红字”的日子。

在那段日子里，解振华和四十多个知青，天天每每在小兴安岭，为了一个莫须有的备战备荒的神圣说法，合理合法地砍树毁林劈山造屋，在冰天雪地之中盖马架子房。没有哪一个人学过盖房子，好容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一间马架子房盖起来，顷刻之间，却又倒了。倒了再盖，盖了再倒。大家不灰心，唱着语录歌，念叨着失败是成功之母，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最终，硬是摸索着盖起了一排马架子房。

那时的大个子解振华，经常用一双冻裂的大手，拿斧头将冻得梆梆硬的馒头切碎，和大家一起围着火堆烤着吃，用斧头剁碎的冻馒头块，外边已经烤糊了，可里边却还是冰茬子，可是大家硬是嚼巴嚼巴吞下肚去。

不这样不行，因为休息一会儿，下边还有一堆重活累活在等着他们去干，没有食物补充热量和体能，那种强度的劳作，任是钢人铁马也万难应付过去。

解振华和战友们过着那种“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战争岁月才有的艰苦的生活，没有蔬菜吃，更谈不上有水果吃，人人都患了夜盲眼，一次去团部开会，解振华像个盲人似的拿一根棍子让另一个患夜盲眼轻微些的战友拉着，在没有路的山林里摸索着走了半天一夜，才好不容易走出了山林。

可最奇怪的是，那时没有人叫苦，也没有人说累。

在冰天雪地中背靠着他的马架子房神情显得很严峻的解振华，在当时绝没有想到，他会在五年之后考上清华大学，而在十几年之后，他还会成为继曲格平局长之后的国家环保局的第二任局长，舒展开威风凛凛的高大躯体，顶着一脑门子不说空话多做实事的决心和一整套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去同一切破坏森林、毁坏植被、污染河流、污染大气、污染生态环境的社会不良现象做最坚决的最顽强的也是最长期的不屈不挠永不疲倦的斗争。

这是一场“积德”与“缺德”的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场斗争的胜与负将会决定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未来，将决定整个人类遭遇到的生死存亡。

正因为中国政府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斗争的重要性、严峻性和长期性，所以 1998 年朱镕基就任国务院总理之后，新一届政府在精简繁冗的政府机构，大力削减政府机关人员的同时，却英明果断地破例将国家环保局升格为国家环保总局，使年仅 48 岁的解振华荣幸地成为新一届政府中最年轻的一位正部级领导。

如今，身为国家环保总局局长的解振华，注视着中国的生态环境世界，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疏忽，因为他头上的天空和脚下的大地，以及身边每一株树木与每一条河流，都在时时刻刻监督着他，祈使着他。

解振华明白自己所担任的是一个表面看起来不起眼而实际上却至关重要的政府职务，诚如一位外国官员发出的惊呼：解振华作为一个中国第一任的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这简直是一个太富挑战性的职务——他将会做些什么呢？

一个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的局长，如同一个捍卫真、善、美的自然生态环境的命定的大守护天使，这样一个大守护天使，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国情和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必然会时刻面临社会上最富有挑战性的污染问题，这似乎是势所难免的。

有了那样一段艰苦卓绝的知青生活的垫底，相信今后不论遇到什么样的难处和困境，这位大个子的国家环保总局的局长，都可以游刃有余地从容应付了。

与解振华局长一席谈

可是当时那位饱经风霜，满脸烟火色的白发苍苍的渔村老人，却睁着一双充满企盼的老眼，哆嗦着一把白胡子，颤抖着一双青筋暴突的手，紧紧拉住解振华的手巴巴地说了一句：哎呀，你们可来了，你们可别让他们再污染我们啦！

解振华在谈到淮河行动时这样回顾道：当时黑河曝光以后，宋健受国务院的委托，前去解决问题。到下游一看，水就是黑的臭的，跟酱油一样。宋健在河边老百姓家里，用手轧的轧水井轧了一碗黑水，宋健问老百姓这水能不能喝，老百姓说不能喝，喝了以后嗓子疼，还拉肚子，宋健就喝了一口。当时有一个老太太对宋健说：你这么官，我们本来想给你煮碗开水，沏个茶给你喝，可是这水不行，不能喝。

她讲了以后宋健眼圈都红了。宋健说：我们对不起老百姓，我们得治！

往下游走，到了沈丘的淮店闸，原来问是关着的，当地县政府做了决定，说是打开，一打开就把臭味给翻起来，恶臭扑鼻，真是不像话。这时有人说，老百姓要递万民折，我看了看，上边写着：官清水清，官不清水不清，宋健不见不看不是清官。我请宋健看，宋健看了以后说：淮河必须治，因为老百姓都喝这个水！再往下走到了蚌埠开会，宋健在会上明确提出，排放污水就是图财害命！而且还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你为什么非得排放污水，干这个伤天害理的事。当时在会上宋健发表了一番动感情的话，让大家都觉得非治不行了。

回来以后就定规划和方案。就在这时候发生了重大污染事故。

那是 1994 年 5 月份，是枯水季节，淮河的水都在闸堤里憋着，当时驻马店还是别的什么地区下了一场大雨，当地的植被也不好，一下雨就形成地面径流，全灌到河床里，上游库容量满了，就得放水，所有闸坝里的污水全放下来，最后汇到淮河干流两亿立方米污水，从阜阳开始一直往下走，从上游一直往下，七八十公里长，全部是污水，一直灌入洪泽湖。沿河和人湖口所有网箱养的鱼全死了，全泡汤了。蚌埠市将近 100 万人口没水喝。淮阴地区的盱眙县，30 万人没水喝。当时我正在家里，国务院副秘书长刘继民代表国务院给我打电话，要我带队去处理这次事故！我说好吧，马上去！

解振华说：我是和水利部一位副部长带队下去的。沿途所见，触目惊心，所有的河床里全是污水，黑臭熏天。到了盱眙县，发现盱眙县所有的人都在马路上站着，干什么呢？老百姓都在等着打水。这个县的饮水全部污染，无法饮用。淮阴市就动员全市所有的局以上机关，每家出一辆车给盱眙县送水，并向当地驻军求援，当地驻军也派车给盱眙送水。当地老百姓都拎着水桶站在马路牙子上等水。

当地的县委书记、县长一见解振华他们来了，都伤心得掉泪了，说：

污染事故出来，老百姓遭罪，我们挨骂，说你们政府是干什么吃的，让它污染！

解振华很动感情地说：县城居民遭罪，渔民颗粒无收，有好多入年初贷款八九万买鱼苗养了鱼，到了收获的季节一污染，全泡了汤。大街上全是部队派出的医疗队，在那儿给人们看病，全是喝了水拉肚子的，用自来水洗了澡身上长了红痱的。

可是没有别的水，配给的水还不够喝的。没有水还能干什么？工厂停工，单位不上班，一个县城几乎全部瘫痪，什么也干不了啦！

再往下走到了洪泽湖，到了渔村里一看，老百姓怨声载道，最严重的是发现好多户渔民已经把房子拿木板封起来，逃难去了。当时这一块是比较富裕的，因为水污染颗粒无收，活不下去，已经出了环境生态难民，这问题就相当严重了。

当时江苏省的江永如副省长就动了感情，毅然对县委书记说：你也别做什么工作了，我现在就代表省委，答应给你 150 万，你好好给我治污，恢复生产，稳定人心，让老百姓别走！

解振华带队在一个渔村视察时，当时村里呼啦就围上了一群老百姓，为首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冲着解振华，扑哧一声，双膝一弯，就跪了下来。

解振华吓了一跳，赶紧伸手把老人扶起来，说：老人家，您千万别这样，您找我们有什么事呀？说出来我们一定会帮您解决的！

解振华说：我们当时考虑，这位老人家一定是告状或是说什么的，搞不好还是来要求赔偿的，还不知该怎么应付呢！

可是当时那位饱经风霜、满脸烟火色的白发苍苍的渔村老人，却睁着一双充满企盼的老眼，哆嗦着一把白胡子，颤抖着一双青筋暴突的手，紧紧拉住解振华的手巴巴地说了一句：哎呀，你们可来了，你们可别让他们再污染我们啦！

这位深受污染之害的老爷子，既没有告状，也没有提什么赔偿要求，甚至都没有诉说自己遭受污染的不幸和困难，没有责骂那些污染了他们的人，更没有责难政府。却说了这么一句超越了过去、现在的话，希望以后如何如何，真是让人感动。

当时解振华和所有在场的人，听了老人的话以后，心里都特别难受，好多人都感动得眼泪花花的，解振华湿润着眼睛对老人说：真对不起你们，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让大家遭了这么大的罪！

解振华深受感动地对我说：这位老人家没有提出赔偿，没有提任何要求，只是说你别让他们再污染了！我们的老百姓真好，真是通情达理！

笔者听了也为之感动，这种事情要是放在西方那些国家，老百姓受这么大的害，还不给你闹翻了天，不知要什么的示威游行，不知要什么的向政府索赔呢！

解振华接着往下说：这时来了一批当地的年轻人，就问，听说你们来了几个省长，有河南的和安徽的省长，你们谁是？他们说你们给我们弄污染的！我们就解释说这回来都是国务院派来的调查组。当时那几个省长特别受感动，河南省的张洪华，安徽省的王秀芝，江苏省的江省长都说：由于我们省的污染造成了下游受害，老百姓没吃没喝的，再不治对不起下游的老百姓！大家都觉得，当时我们刚开完治理淮河污染的现场会不久，就出了这么大的事故，怎么向国务院交代呀？

回去以后就写报告，研究怎么治理。

当时在京西宾馆开了一次领导小组会，宋健主持的，研究怎么治理的问题。

会上提出对 19 家大企业限排限产，不达标就关停。

当时宋健请示了李鹏总理、朱镕基副总理和邹家华副总理，他们都说，行，下决心治吧，都污染到这种程度了，再不下决心不行了！

解振华局长如是说

李鹏总理当时就说：你不要担心，我们的温饱问题解决了，现在我们有能力解决一些突出的环境问题，全国我们不能这么干，在一条流域上我们为什么不能这么干？你们别怕，这是我们国务院的决心，我们承受得了，你们大胆地干吧！

解振华也谈到：当时李鹏总理觉得淮河污染太严重了，心情很急迫，就提出 1997 年变清，大家都觉得不可能，后来就定成 1997 年达标排放，2000 年变清。这个目标绝不能再退了，一定要完成。第二天宋健再次向国务院几个主要领导做了汇报，定下来要彻底治理淮河，1997 年达标排放，2000 年变清。宋健当时为了不让淮河的老百姓喝脏水臭水，还从总理的预备金拿出了 5000 万，总理的预备金是应付紧急情况的，轻易不能动，但是为了解决淮河流域人民的吃水问题，用来打深井，也动用了。

解振华说：在实施关停过程中，四省情况都比较好，只有河南在关停时发生了一点反复，地方有些领导有侥幸心理。为此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特地下去在一线视察了一圈关停的情况，回去在报上一登，说省委书记对关停如何如何的重视，等于表了个态，地方的侥幸心理都被打消，知道不关是不行了，所以一下子势如破竹地关了一大批。在中国只要是中央和政府下决心，省委政府下决心，有些事还是能办下去的。过去我们都担心，都在发展经济，企业都是各省的命根子，咱们这么关，行吗？我曾就此担心向宋健同志作汇报：这么关，行吗？

宋健当时就说：怎么不行？我已经向总理汇报过了，总理、镕基、家华他们都赞成，说没关系，有什么不能关的？

解振华说：还有一次，我和宋健陪李鹏总理会见日本首相，在会见之前，在贵宾室里休息，李鹏总理就问淮河的事情，我当时就说，现在正在关，这么关也不知道行不行？李鹏总理当时就说：你不要担心，我们的温饱问题解决了，现在我们有能力解决一些突出的环境问题，全国我们不能这么干，在一条流域上我们为什么不能这么干？你们别怕，这是我们国务院的决心，我们承受得了，你们大胆地干吧！

解振华激动地说道：宋健多次传达过总理的这番话，现在当面又和我讲，那还有什么说的。回去以后我向局里传达李鹏总理的话，大家一听也打消了顾虑，一下势如破竹地把这事给办了。污染负荷一下子减少了 15%。接着关停十五小，不仅如此，还以淮河关停十五小做为典型，在全国实施，把全国污染最重的十五小也关掉了。一下子关了 65000 家。影响震动非常大，都说中央动真格的啦，环保不是软法，是硬法。到了 1996 年，1997 年达标排放提到议事日程上。宋健代表国务院又去督战，在现场会上说：1997 年的任务必须完成，不管有什么困难都要克服！

解振华很有条理地做了一个小结说：首先是中央的决心，国务院的决

心，宋健同志亲自抓，国务院为此开过几次常务会，宋健三次下去开现场会，三次在北京开领导小组会，两次让省里的领导来国务院汇报，发动了各部委包括开发银行等有关部门参加淮河行动，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技术的出技术，加上中央电视台和其他传媒的大力支持配合，大家群策群力，才把 1997 年达标排放这个事硬给干下来了！

解振华兴犹未尽地说：这件事全国关注，中国各个部门都在行动，四省省委书记、省长以及下边的地。市、区、县、乡镇、村都在行动，老百姓也在行动。从来没有过一次政府行动有这么多老百姓主动参与的。他们主动出来监督企业排污，给有关单位通风报信，利用写信、标语以及种种手法参与淮河行动。从上到下都这样，江苏的省长提出：要心慈手不软。有的厂子在关的时候厂长都给跪着，不让关，省长就说，你别求我，我要是对你手软了，我就对不起下边的老百姓！山东的省长自己有糖尿病，一天自己给自己打三针，天天在第一线待着。河南的省长微服私访。

安徽的省长带人下去一个厂一个厂的落实关停。多亏这几个省长在第一线指挥，这四个省长可真是出了大力啦！另外还有我们的一个副局长王耀祖，这件事实实在在是他在第一线指挥，都是他在具体做，你要写，一定要写他！

笔者原定要采访四省长，可惜因某些万不得已的原因而不得不放弃。

可是这期间听到的和从资料上看到的一些事例，已经足以为他们树起一座不朽的丰碑。包括地、市、县各级政府，无不如此。地方的经济发展，与企业生产的增长和发展密切相关，地方政府在治污上思想和感情上的矛盾是最大的，他们不能不因此感到心疼，感到不能接受，感到勉为其难，因为每关停一个企业，就等于扔掉一笔地方财政收入，剝掉他们身上的一块肉，都是肉，都是在忍痛割爱啊！

这种切肤的疼痛，这种壮士断腕的悲壮，这种刮骨疗毒的英雄本色，这种为了大我牺牲小我的伟大精神，都是震古烁今的，都是感人至深的，都是有目共睹的。

解振华说：在治淮过程中体现的是一个这样的格局，党委重视，政府负责，人大监督，环保部门统一组织协调，各部门分工负责，企业治理，新闻舆论支持，老百姓参与监督。几乎是全社会总动员，都在办这件事。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特色，只要中央政府下决心，没有办不成的事。可是当时不行，当时连外国人也说，你们三两年就想削减污染的 40%，这怎么可能呢？都觉得不可能，连曲格平主任也觉得不可能。1997 年底他跟我们下去，好好看了一圈，然后很兴奋地说：过去我不太相信，现在一看，觉得真能干成点事，你们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我们环保局为淮河问题至今已经下去了多少次？我都有点记不清了，几乎是无数次的。现在还有一个副局长带人在下边查，如果保持这样的劲头继续不松劲，各省各市的污水处理厂一经建成投产，我估计 2000 年淮河变清没什么问题，再用十年的时间来恢复生态，恢复环境，最终恢复原样。

笔者感觉到：从觉得不可能到可能，从信心不足到信心百倍，这是一个何等艰难何等巨大何等华彩何等让人感奋的充满着希望的生命和思想的飞跃啊！

淮河流域的企业将治污工程当成企业的生命工程，因为不治污要关停；淮河人民视治理淮河污染为百姓的生命工程，因为继续污染下去人民的生命

财产都会遭到严重的危害；中国政府和全社会都把淮河治污看作是中国人未来生存和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工程，它直接关系到今后长江、黄河以及所有河流、地下水、山川、大地、海洋、大气、森林、地下资源、生态的治理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讲，淮河治污的成败将决定中国环保的未来，关系到中国人的生存未来，也关系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是中国环境改善曙光之所在，也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未来希望之象征，是关乎国计民生未来子孙的生命工程。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不会在危险来临时，不去正视它，不会像鸵鸟一样胆小地将自己的脑袋埋在沙子里，以此来眼不见为净，逃避现实。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都是敢于正视现实的。虽然现实是严酷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如同是一扇通向万劫不复的地狱的大门，这扇大门不小心被我们打开，可是我们不怕，我们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部下定决心，要为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重新关上这扇地狱之门！

不怕困难，解决问题，这就是中国的特色，也是中国希望之所在。

十一、蚌埠宣言 立此存照

黑河和政府照了张相

所以，河南省副省长张洪华在淮河沿岸污染

区越看越生气，怒不可遏，一针见血，掷地有声地

愤然说：只管他们自己赚钱，不管别人的死活，这

跟图财害命有什么两样！

1993年继小黑河小洪河污染两岸的报道之后，引起了以李鹏为总理、朱镕基为副总理的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成立了淮河污染防治领导小组，组成了以国务委员。

国务院环保委主任宋健为组长，国务院环保委副主任、国家环保局局长解振华为副组长的，有水利部、化工部、轻工业部、重工业部等有十几个有关部委领导以及淮河流域四省省长参加的淮河污染防治领导小组。

1994年5月19日，受国务院总理李鹏的委托，以国务委员宋健为组长、国家环保局局长解振华为副组长的有关部委领导，会同淮河流域四省省长，赴淮河流域现场办公，实地考察，以求一举解决淮河流域的水污染问题。

宋健一行先到了李风1993年就报道过的那条黑河和那条洪河。正是五月扬花的季节，黑河两岸绿油油的一望无际的麦田，与酱油似的黑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些麦田可以作证，几年前抗旱，人们无可奈何地引黑河水灌溉了两岸的麦田，结果许多亩麦子枯死绝收，大面积的麦子减产。

从此之后，当地不论遇上天有多么的干旱，宁肯让小麦渴死干死，也不敢再引黑河的水浇灌自己的麦子，这些可怜的和村民们一样守着黑河没水喝的麦子呀！

宋健和解振华以及部长、省长们静静地立在一座残破的水泥桥上，

望着这条稠乎乎乌咚咚的已经死亡了许多年的河流，在浊水恶臭中相对无语。

黑河两岸，小鱼当饭的日子早已成为往昔的光荣岁月，曾经风景秀丽的惟一见证，便是那几株在黑河边上半死不活依依扶风的老杨树，老杨树的半中腰挂着一缕缕去年盛夏的洪水忘记了带走的河柴，昏昏的怀想着过去的时光。

宋健眉头皱得像两把生锈的锁头，急于寻找一把钥匙来打开。

宋健找到一把开锁的钥匙，这把钥匙的名字叫做：黑河和政府照张相。

宋健半真半假严肃而风趣地说：我们一起在黑河边上照个相吧，当地的领导同志都来。这就叫立此存照。就拿这污染的河流做背景，过几年我们再来这里看看，也要站在现在这个地方，再照一张相，看看河水变清了没有！

宋健是受国务院总理李鹏的委托来淮河现场办公的，足以代表中国政府，河南省的张洪华副省长和当地的市长、市委书记都是当地的父母官，亦足负起黑河变清的使命，于是他们便在黑河桥上站成一排，和黑河一同照了这一张相。

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瞬间。

淮上苦初透

十几位部长们，皱着眉，轮番接过那只水碗，去瞅去嗅，那水的味道嗅着都让人恶心，那颜色在碗里瞅着都让人恶心，更何况去喝了。部长们看过嗅过，虽然没有依样去喝，可神情已显得十分沉重，个个是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

5月22日上午8时20分，宋健一行来到淮河上游的主要支流沙颍河，看到的景象让人触目惊心。这条十几米宽的沙颍河，河面上漂浮着厚厚的白色浮沫和一层黑油油的悬浮物，一路流来，激溅有声，散发出扑鼻的恶臭，两岸风光黯然失色。

位于沙颍河边的河南省淮阳县豆门村，整个被包围在一片浊水恶臭之中，还没有等宋健、解振华一行进村，大家便已经被臭气熏得人人皱眉，个个蹙额。

世代居家在沙颍河边的农家媳妇牛凤琴把宋健一行让进自家院子里，未语先长长地叹了口气，操着一口地道的河南话对宋健说：俺家祖祖辈辈都住在河边，原先这河真是好得很咧，河里有鱼有虾的，俺们还养了好大一群鸭子，也就是四五年不到的工夫，这河就不中了，河里的鱼、虾都死绝了，俺家的鸭子也都死完了。

宋健看到院子里有一口轧水井，就关心地问：你家就是喝这井里的水吗？

这位朴实无华的农家女牛凤琴闻问，眼圈便红了两轮，说：这井里的水以前好着哩，现在不中了，用这井水浇菜菜死，人喝了闹头痛、拉肚子、眼花，我家的两个娃，原来学习好着哩，自打喝了这井里的水，常喊肚子痛，小脸总是发白哩，这井水不中啦，不敢让娃们喝，我们喝水都到远处去拉水，拉一趟得小半天工夫哩！

宋健听得心尖儿一颤一颤的，眼圈红了，却自持着，不肯让自己失态。

牛凤琴一边说话，一边就从轧水井中压出了一股水，那水呈褐黄色，比啤酒的颜色还深，一股刺鼻的怪味，牛凤琴接了一碗水端给宋健一行看，

说：你们看看，嗅嗅，这股子味道，呛人，不中了，这水喝了要生病的！

紧随宋健身旁的解振华先接过那碗水，放在鼻子底下嗅了嗅，觉得还不够过瘾似的，将水碗凑到自己的嘴边，不由分说地尖起嘴巴喝了一口，慌得牛凤琴一迭声地制止。解振华却不管不顾，皱着眉头细细品味，那水入口一股怪味腥味，又苦又涩，含在嘴里像含着一枚苦胆，委实难以下咽。可是解振华这个在小兴安岭里苦过累过，在苦水里泡过，在山野摔打出来的汉子，却硬是将一口污水咽了下去。

宋健这位年近 70 岁的老人，也毫不含糊，不等解振华说出他的感觉，便慨然从解振华手里接过那只水碗，仰脖慨然喝了一口，咂嘴品味了半天，咕的一声咽了下去，皱着眉头，把水碗递给身后的十几位随行的部长，那意思分明是在痛心地说，我们的人民喝的是什么水？你们这些部长和省长们也不妨尝尝看！

只是宋健没有明说，只难过地说了一句：这水又苦又涩，人怎么能喝呢？

十几位部长皱着眉，轮番接过那只水碗，去瞅去嗅，那水的味道唤着都让人恶心，那颜色在碗里瞅着都让人恶心，更何况去喝了。部长们看过嗅过，虽然没有依样去喝，可神情已显得十分沉重，个个是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

解振华局长过后和笔者说起过他当时喝那口水时的感觉，说：真难喝，又苦又涩还有股子怪味，后来我喝了好几瓶矿泉水，去冲淡那种恶心人的味道，漱了好几次口也漱不去那股子怪味道，亏的是喝了一口，要是喝一碗你试试，不闹出点毛病来才怪。我当时真是担心宋健同志，他毕竟年纪大了些，别把自己喝出病来。

解振华局长进一步对我补充解释说：你要是不亲口尝一尝，光是靠眼睛看，靠鼻子嗅，你就不知道那水有多难喝，就很难知道我们淮河的老百姓平时喝的是什么水，那还能叫水吗？那简直是穿肠毒药啊！

正说话的当儿，隔壁的郭秀芝大娘走了过来，像看到大救星也似，一把拉住宋健的手，满脸悉是沧桑苦难的褶子，堆叠着难为情的笑意，过意不去地说：你们都是从中央下来的客人，是远道来的贵客，本应烧锅水给大家泡茶喝的，可是你们看看，这水又苦又涩的，不能喝呀！

说到这里，郭秀芝大娘那两只布满鱼尾纹的老眼，已经满含热泪，泪花莹莹闪动着无限信任和无限渴盼，说：这河水不中了，俺们这些大人们也还能对付，连娃娃们也没有水喝，你们快想想办法，早些让这河水变清吧！

郭秀芝大娘的话让宋健听得心里一酸，眼圈就又红了一回，在场的部长和省长们都眼睛发潮，低下头去，尽皆神情肃然，无不感慨万端，倍觉心情沉重。

我们这些亲眼目睹生态灾难的政府大员们，一边抚膺自责，一边扪心自问：看看我们的人民有多么的好呀，让我们这么好的人民天天喝河里的臭水，我们这些当官的能对得起谁？守着淮河没水喝，岂非咄咄怪事？谁是污染淮河的千古罪人？是那些大大小小的污染企业吗？难道我们这些管理企业管理地方的官员就没有责任吗？不管谁是具体的责任人，我们这些当官的，首先就应该引咎自责啊！

往下的污染情形比宋健一行在上游看到的还要糟，沈丘沙河闸汇集了豫东所有的污水，一条大河，浩荡东去，黑浪滚滚，浊涛翻卷，白沫浮沉，

恶臭逼人。

沈丘槐店苦难多

这个藏污纳垢的防洪闸，闸住了一河污水，
使沈丘县瘟疫流传，地下水污染，民怨沸腾，受害
匪浅，万名群众自发签名的万民书不知已经辗转
几回，四处抛洒，上诉状、告状信、请愿书真如雪
片也似，飞向郑州市、北京市、中南海。

沈丘是河南省与安徽省接壤的一个大县，人口众多，县城就建在流量充沛的淮河最大的支流之一沙颍河两岸。

沙颍河的发源地是位于淮河流域的嵩山，嵩山乃天下五岳之中也。中岳嵩山七十二峰横列如屏，以峻极峰为主峰，海拔 1440 米，山势险要。嵩山位于中原，历代帝王，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到圣迹满天下的风流皇帝乾隆，无不把登嵩山、览峻极作为其炫耀文治武功的一项壮举。这里有东汉建筑的太室，少室，启母阙，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石刻篆书。北魏孝明帝时建筑的嵩岳寺塔，是我国最高的砖塔。孝文帝时始建的少林寺，寺内有各种形状组成的碑林，以真、草、篆各体镌刻了 300 多篇碑文，记载了历代的典章制度和佛家的清规戒律，寺院的兴衰，游人的题记。我国古代著明的高明书院建于嵩山脚下，东西有峦峰环拱，前后有山溪汇流，真个是人杰地灵。山溪洞泉与地表水汇流而下，便形成了颍河的发源地。

过去沈丘县得天独厚，沃野千里，喂水而居；绿树红花，麦寂飘香；风光旖旎，莺飞燕舞，景色宜人；渔歌唱晚，银鳞上岸，是个有名的鱼米之乡。

可是如今步入沈丘县，首先迎接你的便是一股扑鼻的臭味，这气味最浓时能导致人头痛、气喘、喉部痉挛、眼睛流泪、失明，至于其它因此而引起的种种奇异疾患更是不胜枚举。很难想象一座围水而居的县城竟然没水喝，而一座没有水喝的城市，它的景象不用多说，亦可想而知，绝好不到哪里去。

县城中可见一座巨大的蓄洪泄洪闸，原本是为防洪而设，可是防洪闸如今成了纳污问，沙颍河成了藏污河，积聚的都是从许昌、漯河、周口、项城、界首等地的味精厂、造纸厂、化工厂、皮革厂、造酒厂泄下来的污水，水色浓黑如雀巢咖啡也似，味道同样也苦涩，气味熏人似王致和的臭豆腐，但不香却呕人。

昔日得天独厚的鱼米之乡，如今成了个藏污纳垢之地。

县长蔡勇介绍说，上游味精厂排放的污水中，还有活的酵母，到这里还在发酵，再加上皮革厂、造纸厂等大小数百家企业的污水，至使水中的硫化物超标多倍。由于污水常年在河道、沟渠积聚，沿岸 1500 米内的浅层水均被污染。不久前县里对污染区内 100 眼水井抽样调查，全部都不符合饮用水标准。

就是这个藏污纳垢的防洪闸，闸住了一河污水，使沈丘县瘟疫流传，地下水污染，民怨沸腾，受害匪浅，万名群众自发签名的万民书不知已经辗转几回，四处抛洒，上诉状、告状信、请愿书真如雪片也似，飞向郑州市、北京市、中南海。

这个纳污闸，让沈丘人一边受着上游的污染，一边又污染着下游。

有时间内污水积聚实在太多，无法承受，便须开闸放水，只要这座闸

一放水，便会沉渣泛起，臭气冲天，污水团如毒龙也似一泻几百里，翻腾起伏，直下安徽境内，所到之处鱼虾绝迹，生灵涂炭，水源污染，弄得天怒人怨，狼藉一片。

比邻而居的安徽省因为污染问题，与河南省的矛盾纠纷不断，连两省交界处的平民百姓也因此敌对仇视，见了面，每每就红了眼，一言不和，就扑上去撕打在一处，往往打得双方头破血流，不可开交，不甘败北时，还引朋呼类，相互械斗。

沙颍河最大的污染大户是周口莲花味精厂，沈丘群众最恨的就是周口莲花味精厂，沈丘一县有百十万人，百十万人拒食莲花味精，愤愤说：什么他妈的“莲花味精，滴滴香浓”，看看他们把沙颍河的水糟害的，这样只顾自己发财升官不管别人死活难过，以牺牲这么大一河流为代价，昧着良心黑着肚肠造出来的什么莲花味精，你们说，哪里会是滴滴香浓？明明是滴滴黑臭呀！

据当地愤怒的群众对笔者说：周口莲花味精厂的总经理李怀清，因此而从来不敢公然走入项城和沈丘的地界，害怕当地被污染害苦了的群众揪住他痛打一顿。

那几个沈丘当地的毛头小伙子，眼里烟烟冒火，恨恨不已地说：要是见了那个莲花味精厂的李怀清，我们几个非要揪住他，问问他为什么要这么祸害沈丘人？问问他自己还是不是个人？有没有人的良心？如果他说自己不是个人，我们就三拳两脚地打死他，也算给项城、沈丘和沙颍河除上一害！

竖子多童言，童言多无忌，无知无识，惟血气方刚而已。

从来匹夫之勇，横蛮之气，礼义不足取，大量如李怀清总经理，自然也不会有所计较。但个中情状，与是非厉害，却很是发人警醒，相信李怀清先生看到这里，心情一定沉重，扪心自问之余，一定会有所觉悟，并且已经有所表示和有所作为。

对李怀清先生与莲花味精厂的是是非非，笔者还会在下文一一谈及。

车拉着人沿河驰骋，腿驮着身走村串户，眼带着心看了一路，宋健和解振华他们一行人，都觉得人困车乏，身体也累，心里更累。

沿途不时遭遇围观的人群，围观的全是沿岸的老百姓，这些老百姓因为长期饮用污水，致使健康受损，人人都有一张面色焦枯的脸子。

这些老百姓中，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是女人还是男人，见了宋健和解振华他们一行人，都像见了救星一样，眼巴巴地望着他们，无声地泣诉着什么呐喊着什么。

沿岸男女老少，无数双大大小小的眼睛里，都诉说着一个企盼，无数张不重样的人脸，都重样着一个共同的心愿：啊，可把你们这些救星盼来了，你们这些救星来了，这淮河水就有望变清了，你们快施一个什么法术，让这淮河水早点变清吧！

沿途的一些村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用净土垫了道，路面还洒了水，有点黄土垫道，净水泼街的郑重，但是这一切并不能掩盖村子里的贫穷和落后。穿过村舍间的土路，一条浩荡而宽阔的大河便赫然入目，河面足有一百多米宽。

宋健走上堤坝，又下到河滩，他伫立在滩地上，迎着猎猎劲吹的河风，深沉地望着眼前这条正在死去的淮河，难过而又坚定地对着随行的部长们、当地的地方官员们说：老百姓说得好，有清官才有清水，我们共产党人不做清

官谁做清官？我们一定要在本世纪内把淮河水变清，你们都是父母官，你们说能不能做到？

没有人敢于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有位官员如是说

那位地方官员放声大笑，说：中国这么大，还缺你这壶酒钱？淮河沿岸那几千个企业能挣几壶酒钱？他们挣的钱加起来恐怕也没有这一回中央和地方为治污投入的钱多吧？

有个地方官员和笔者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污染，说到底其实也是一种政府行为，只不过是地方政府所为。解铃还须那个系铃人，要想纠正和根除污染，必须以大政府的行为干涉小政府的行为，现在中央政府出面治理淮河污染，让它在 2000 年变清，那太没问题了，准行！

那位地方官员还笑话一位信心不足的环保局的同志说：你们别充内行，说什么时间太短，淮河变不清，跟你说，这在别的国家想也别想，可搁在我们中国就能成。

真正的内行不是你们环保局，而是我们的中央政府。别说是用七年的时间变清，就是想用一年的时间把它变清，那也不成问题，只要我们中央真正下了决心，把沿淮的污染企业统统地、爱你没商量地全部关停了，你看淮河，它变清不变清！

环保局的同志不无担心地反驳说：那经济问题还要不要考虑？

那位地方官员放声大笑，说：中国这么大，还缺你这壶酒钱？淮河沿岸那几千个企业能挣几壶酒钱？他们挣的钱加起来恐怕也没有这一回中央和地方为治污投入的钱多吧？不说别的，这淮河的水患治理你说这四十年国家投下了多少钱？怕是几百亿几千个亿还不止吧？可是一下子污染了河流，饮水污染、养殖业完蛋、灌溉也不成，这么一大帮子淮委的人和这么大一摊子水利设施都成了废物，辛辛苦苦治理好的这么大的一个淮河流域，里边淌着一河的臭水，你说是哪个大，还是哪个小？

环保局的同志道：万一引起社会不安定因素怎么办？

那位地方官员哧哧地轻蔑地冷笑道：你也不想一想，这是在为 1.5 亿老百姓办好事，为这么多的人民得罪几个家伙算什么？在这件事上，绝没有哪个狗胆包天的敢出来闹事的，别说是国家会收拾他个鸭子凫水，就连老百姓也不会放过他，一人吐口痰就能淹死他，借给他们十个胆子他们也不敢，你以为这也是闹学潮？狗屁！

连笔者也不得不信了地方官员的话，以为他真知灼见，洞微烛幽，很是明白中国的国情，这确实是近年来中国政府为老百姓所做的最大的一件好事，谁敢跳出来反对，别说淮河流域 1.5 亿人民不会答应，就是全国的老百姓也绝不会答应。

宋健蹲下身，轻轻地伸手从河中掏起一把污染的水，向地方官员详尽地询问水质的各项指标和村子里的饮水情况，深情地说：要多打些深井，先解决人们的饮水问题，要像救灾一样尽快解决这件事！

随后，宋健走向对岸的另一个村庄，进入一户一户人家，了解他们的生活和生产情况。这个村子里的人，祖祖辈辈都在淮河边生活，不少人是世代靠捕鱼为生的渔民，只是如今这个村子里已经连一个渔民也看不到了。

宋健问村民们：你们最后捕到鱼是什么时候？

村民们七嘴八舌地回答：有些年了，大概是 1990 年吧？那时还有鱼，现在不中了，村里渔民都改行了，种地的种地，打工的打工，河上连一条船也没有了！

宋健默然，解振华默然，部长们默然，省长们默然。惟有那条浩荡东去的酱汤色的大河，在一片恶臭浊水之中，愤懑不平地激溅起三万六千声悲响。

越看心情越沉重

这无形中产生了一种潜移默化的微妙的心

理误导，成为一种可怕的行政长官的暗示，种种

优厚待遇暗示这些厂长们说——只要给地方挣

来大钱，污染一条河流也没什么了不起，不会因

此影响对你的提拔和重用，你就放。心大胆地污染吧！

1992 年 6 月，宋健陪同李鹏等一行 60 多人，代表中国政府出席里约热内卢环发大会，向全球发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呼吁，与会 102 个国家的首脑，代表全人类发表了地球宣言，宣言主要内容是——竭尽全力为今世后代把地球建成一个安全而舒适的家园。

然而说归说，做归做，各国政府要想真正把地球宣言，名副其实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面临的局面都会十分棘手。李鹏总理和宋健国务委员所代表的中国政府对全世界和全人类做出本国的环境承诺之后，更是觉得任重而道远，颇有点屈原诗中那种“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意味了。

因为中国政府需要面对的绝不是一个小门小脸小身体，方便管理的弹丸小国，当然也不是一个工业发达经济稳定的超级科技大国，而是一个政府体制和经济体制都处于转型期的、幅员辽阔却地薄人多的中国。

更为棘手的是这个时期的中国，各省各地的经济发展，都在突飞猛进，土的洋的一起来，可谓奇招迭出。一些地方政府互相攀比上项目，显得有点心浮气躁，着着都想占先，却置全盘于不顾。

他们不择手段地摇旗呐喊，招兵买马，振臂一呼，便使无数设备简陋土法上马的乡镇企业揭竿而起，仓促上马，有的占山为王，有的落草为寇，靠山的吃得山穷，靠水的吃得水恶，没山水可吃的连牧牛放羊的草场也不肯轻易放过，吃成了一片不毛的沙荒。一时间，有些地方罕见绿水，少存青山，周遭尽是一些让人们触目惊心的生态窘境。

从宏观的角度上讲，中国正处在一个群雄逐鹿经济起飞的初始阶段，事实证明这一阶段极易导致经济发展过热造成的无政府状态，光有那些小打小闹的乡镇企业揭竿而起也还罢了，更可怕的是，还有许多国营的、集体的、中外合资的大中型企业，也只求经济效益，而不管环境污染，变本加厉污染环境，使生态问题雪上加霜。

从微观的角度上讲，这些大中型企业的大厂长们，个个雄霸一方，人人秣马厉兵，热衷于经济竞雄，发展地盘。他们个个都是地方上腰缠万贯的财税大户，人人都是地方政府头一份的经济支柱，论功行赏，无一不是地方上的功臣，几乎人人都得到了变相的提升，享受着省、地、市、县甚至更高一级的兼职或当地最高级别的政治待遇。

这无形中产生了一种潜移默化的微妙的心理误导，成为一种可怕的行

政长官的暗示，种种优厚的待遇暗示这些厂长们说——只要给地方挣来大钱，污染一条河流也没什么了不起，不会因此影响对你的提拔和重用，你就放心大胆地污染吧！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无形的暗示和倚仗，更加助长了他们财大气粗的自恃，助长了他们肆无忌惮向河流中排污的嚣张气焰，使得他们变成了《镜花缘》中两面国中的人物，只要轻轻掀起他们的浩然巾，便会露出两边脸，一边脸富丽堂皇，有模有样，是地方财政有力支柱，当之无愧的功臣；另一边脸却厚颜无耻，十分的不好看，因为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淮河流域污染河流的大户，是使1.5亿淮河人民遭遇身心健康诸种不幸的罪人。

所以当河南省副省长张洪华和宋健一行从淮河沿岸一路看将过去时，张省长是越看越羞愧，越看越心慌，越看越生气，正义感终于在铁的事实面前战胜了地方主义，人类的良知终于反叛了人类的自私。

张省长先是检讨了自己所在省过去不注意环境污染，乱上项目的做法，然后就怒不可遏，一针见血地对自己属下那些淮河沿岸的污染大户公然下了最后的判决，说：只管他们自己赚钱，不管别人的死活，这跟图财害命有什么两样！

听了张省长如此这般的判词和如此强烈的谴责，不知那些有两副面孔的人，会作何感想？他们一定会觉得心里十分委屈，一定会责怪那些地方领导，你们干吗要用心理性的暗示来误导我们，现在你们怎么不说话了？不就是你们这些地方长官，天天催促我们企业多给地方财政挣点钱吗？不就是为了完成你们定的经济指标，我们才这样费力地进行大规模的生产，从而不得已进行了大规模的污染吗！

但是，这能光怪我们吗？

面对中国的经济现状，面对中国的国情，面对有的人什么都懂，可就是要明知故犯，有的确实是认识糊涂，以为自己的企业挣钱事大，污染下游河流事小，自己的前程和升迁事大，中国的环境恶化不恶化跟自己关系不大——面对这样一些宁要短暂的蝇头微利、蜗角功名，也不肯要长远的绿水青山的鼠目寸光的人，比面对这样一条河流和流域的如此污染又如此严重，更让宋健觉得头疼，觉得难以对付。

宋健和部长们谈自己的体会，忧伤而严峻地说了一句：越看心情越沉重！

中央政府对治理淮河的果敢决断，是多么的及时而且正确啊，让大家都来看看这条哺育过灿烂的华夏文明和无数中华儿女的母亲河吧！她已经快要病入膏肓，如果再不理睬她，不治理和救助她，用不了几年，她就会像淮河里那些翻着白色肚皮成批死去的鱼一样。这些死鱼在阳光和空气中一点一点腐烂。发臭，烂得只剩下一根网状的一具鱼的骨架。

这样一具放大的鱼的骨架，不就是淮河流域河流分布图的形状，和淮河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不幸情形的预见性的描摹与警示性的写真吗？

这样的悲剧，绝不能发生在我们中国，因为中国是人民的中国，淮河是人民的淮河，政府是人民的政府。

看着淮河的现在，想着淮河可能遭遇的将来，让宋健感慨万千，愈加觉得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此行受李鹏总理的委托，李鹏总理临行前的嘱托，压在肩上好似千钧重担，搁在心里如同磐石一般，何等庄严而又神圣的一种感觉啊！

蚌埠宣言

甲省、乙省、丙省、丁省的官司往往一打就打到了中央，这些上游污染下游，下游又污染更下游的事时常发生，积年纠葛造成的夙怨，使四省省长都各自为了各自的省份有了一些嫌隙，每每双方发生纠纷时，见了面不免要红几次脸。

因为安徽省、河南省、江苏省、山东省四省之间经常发生跨省污染纠纷，是是非非，非非是是，非也是是，是也非是。往往乙省刚刚状告上游的甲省是为富不仁的大量排污，污染了自己处于下游的地盘，严重影响了自己省里的省计民生。这边才闹起来，位于更下游那边的丙省，却又状告上游的乙省，为了自己发财污染了丙省的河流，使丙省上千万公斤在网箱中养着的鱼死了个精光，沿岸城市守着河流没水吃，水贵如油，人心惶惶，民生国计受到严重损害。正闹的不可开交时，处于最下游的丁省却又状告丙省，大量的污水使几个临河城市的饮水水源污染，当地喝了污水的群众头痛的头痛、肚痛的肚痛、得癌症的得癌症、忽啦躺倒了一大片，人畜无水可喝，有水不能浇田，使粮田大面积减产，这么巨大的损失总得有个说法吧？

甲省乙省丙省丁省的污染官司往往一打就打到了中央，这些上游污染下游积年造成的夙怨，使四省省长都各自为了保护各自省份的利益有了一些嫌隙，每每双方发生纠纷时见了面不免也要红上几次脸。

他们之间虽然并无私怨，对工作上的纠纷也不认真往心里去，但因为各为其省，营垒却也分明得很，各自都暗中有各自不调和的立场，都准备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面前，抓住邻省污染自己省份河流的无可辩驳的事实，或曰把柄，当场狠狠地重创对手，让国务委员宋健来评理。

为了把各怀异心的淮河流域四省省长的思想和各有各的看法的有关部委领导的心思，都一一合拢到治理淮河污染的这个大业上，宋健可谓费尽了心机。

在蚌埠市的碰头会上，宋健的眼圈再度发红，他大睁着两只眼睛，莹莹泪光在眼里闪烁。他显得神情很激动，但是讲话的口气却不是命令式的，而是充满着感情的规劝和意味深长的请求。宋健说：近几年，我接到群众的许多申诉信，说淮河两岸的人们没水喝，我起初不信，怎么守着淮河却没有水喝呢？我非常惭愧地向李鹏总理要钱，为的是在污染重灾区打井，让我们的人民有水喝。人民是我们的上帝，孩子是我们的未来，现在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了污染，各级政府有责任将我们的人民从污染的环境中解救出来。要尽最大的力量爱我们的淮河，爱我们的人民，从根本上解决淮河流域的水污染问题。

宋健站在其色终年呈棕褐色的泉河边上，久久逗留不去，思绪万千地对随行的大家说：环境污染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制约经济的发展。历史上中原的前途很大程度决定着中国的命运。现在我们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该轮到解决污染问题了。淮河流域的经济正在起飞，可淮河地区生态非常脆弱，它已经无力承受经济发展带来的严重污染。治理淮河污染，必须上游与下游一齐动手，互相配合。

宋健说话时，神情间颇有志士仁人英雄好汉遭逢末路的悲壮和无奈，加重了语气沉重地一字一顿地对大家说：我们只有一条淮河！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淮河千歧百折如扇面也似打开，露出一幅被污染弄脏了的水墨画。

淮河似根须一样伸展开去，长出一株华夏神州千叶离枝的文明树。

淮河若蛛丝也似网罗密布，网罗出一批优秀的中华儿女，这些儿女像静脉血管也似分布全身，曲张着向动脉集聚，并最终回归于心脏。

淮河的主河道，在像胰脏一样小巧的蚌埠转了个弯，回护一番，继续东向流去，入长江和洪泽湖，然后取道入海。

大海才是自然生态的真正的脏器之所在。

站在蚌埠的观淮楼上，夹江对峙的涂山与荆山直入眼底，这是淮河流域下游最后两座山，是古涂山国的所在地。4100 多年前，夏部落的治水英雄大禹，经过这里时与涂山氏女联姻，劈开涂山与荆山导淮，镇支祁，斩防风。留下了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美好传说。在淮河北岸的荆山上，大禹的塑像高高耸立，似乎在放眼古今。

没有了涂山氏女与大禹的联姻联手，还会有大禹的劈山导淮的事迹吗？没有了三过家门不入的大禹，还会有新一轮治水战役，轰轰烈烈地打响吗？还会不会有新一尊中国现时代的大禹之像，在 2000 年，淮河变清之时，由万民之手，再塑于荆山之上，于大禹之后呢？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1994 年 5 月 24 日是个历史性的时刻，来自河南、江苏、安徽、山东四省的领导来到了蚌埠，与宋健国务委员、国家环保局长解振华、各有关部委的领导共商治理淮河大计。在宋健国务委员的主持下，四省都相继提出了治理淮河污染的方案，制定了流域管理措施，如实行排污总量控制，用 3 年时间关停并转一批企业，对所有未能达标的企业限期治理，并且确定了第一批关停的 200 家企业。

宋健这位声名卓著的控制论专家动了感情，肩负李鹏总理和亿万淮河父老乡亲们的嘱托，痛心疾首却又是低回婉转地向四省省长和有关部委的领导，发出了这样情意绵绵的呼吁和情真辞切的恳求：让生活在淮河两岸的孩子们有口清水喝吧！

宋健在蚌埠召开的治淮动员大会上，慷慨激昂地代表李鹏总理和中国政府，向淮河流域的人民，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做出了一个神圣而又庄严的保证和承诺——紧急动员起来，苦战 7 年，让淮河在本世纪末变清！先用 3 年的时间，让淮河治污在 1997 年先取得突破性进展，然后在 2000 年让淮河变清！

十二、善与恶的较量

善与恶的较量

我吃惊地发现，成片成片的罪恶之树，已经相继结出了灾难之果，没有人能抵抗潘朵拉那些美丽的诱惑，这些诱惑已经使人们不顾一切甚至已经发疯了。

在淮河流域走访期间，面对因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所导致的种种生态和环境灾难，每每浮现在我的眼前，我禁不住又在问自己同时也问我们整个

人类：我们如此富有智慧的人类，为什么却识不破潘朵拉小小的诡计？

我时时刻刻都能从空气中嗅到她身体内散发出的那种特有的呛人的气味，明明看见她驾着一匹浓烟滚滚的骏马在空中冲我窃笑，可是一眨眼的工夫，她便像那团浓烟一样消失在大气中。她骑着黑臭的大江大河，越过光秃秃的群山和荒芜的平原。

她几乎无所不在，你可以听见她躲在汽车的马达中发出的超分贝的肆无忌惮甚嚣尘上的笑声。有时她还躲在冰箱里，挥发着弗里昂，让它去腐蚀臭氧层。

她得意洋洋肆无忌惮，似乎是在故意羞辱我，有意轻视我的存在，不时地和我捉迷藏，在我的身边频频提示，提醒我她的真实存在，却不肯痛痛快快地现身和我见面，让我和她，索性结结实实来一番较量，论一个短长，做一个了断。

令我悲哀的是，虽然我找不到潘朵拉，却到处都可以找到许多已经打开或正在打开潘朵拉盒子的愚不可及的人们。

那天我看见他们站在浓烟滚滚的土焦炉前，人人嘴里叼着半截烟卷，吐着一口一口的浓痰，他们用奇怪的眼神望着我，好像我是个外星人。他们疑心地瞅着我大声问：你找我们的潘朵拉想干什么？是向她求婚吗？

我说：不，我才不会娶她！

他们听了相顾大笑，个个笑得泪花莹莹。

你说什么？哈哈，他们弯下腰，冲着黝黑肮脏的土地大声笑说，你说潘朵拉是个恶魔？你不要娶她？哈哈，恐怕不是你不想娶她，是她不会嫁给你，你知道她有多么漂亮和富有吗？你这个穷酸小子，怕是简直无法去想象！

我冷笑着，傲然道：我当然不会知道，难道你们会知道？

他们诡秘地瞅着我说：我们当然知道她，她是我们的福星，是她让我们从农民变成了乡镇企业家，她教会了我们怎么发财致富，她是个非常聪明非常漂亮非常迷人的女人，她的头发像淘洗过乌兰煤的乌兰木伦河里的水一样黑亮绵长，你懂得我的话吗？乌兰煤是黑三角最好的煤，乌兰河所以黑得像她的头发，就是因为洗过乌兰煤，黑亮的乌兰河像她的头发一样绵长，一直飘进黄河里去了。

为首的老大听了摇头，说：老二，你说得还不大像，依我看，潘朵拉的长发像我们炼焦的黑烟那样黑那么绵长，看这烟，黑得多地道，黑得多飘逸，黑得满山遍野的，又是多么的茂盛茁壮，绵密细致，比乌兰河强多了，你们说是不是？

老二点头表示同意，继续对我说：你知道她的皮肤有多么白净，说出来怕你也不会信，就像云贵山区那座让硫磺熏过漂过千亿万遍的山石一样白净。你一定不知道那座山，那是一座有硫矿的山，人们在那里土法炼硫磺，烟气把一座黑石山漂得跟女人的皮肤一样白净，可是再白净的皮肤也得长几根汗毛，那座山白净得连一根草都不长，让男人见了就想搂上一搂，是不是，老大，这一回你没意见吧？

老大颌首，说：说到她的眼睛，那可真是明亮，明亮得像两块小秦岭出产的金子，那地方人人都在挖金子，用氰化物炼金子，家家院子里有一个溶金池，山上掏得都是洞，真是大大的发财。那溶出的金子亮得跟她的眼睛一样，见了太阳，晃的直打闪。她的嘴唇红得像是烧红的焦炭，血红血红的，

比涂了胭脂还要好看哩！

我冷笑，说：这样的小姐，难道还不是一个魔女么？

他们听了个个勃然大怒，冲上来要和我撕打，可是他们刚刚伸出肮脏的手扯住我的衣服时，一个个便突然像中了雷殛似的缩作一团，折断了一般弯下身子，脸冲着自已脚面，咳得喘不过气来，他们长期在浓烟中工作和生活，又酗酒和吸烟，已经患了极其严重的肺部和支气管疾病，只要稍微有一些剧烈活动，便会引发可怕的哮喘。他们哮喘得像要死一样，一个个拿手扼着自己的喉咙，翻着白眼。

我厌恶地离开了他们。离开了一片乌烟瘴气，走向隐没于黑暗中的光明。

我吃惊地发现，成片成片的罪恶之树，已经相继结出了灾难之果，没有人能抵抗潘朵拉那些美丽的诱惑，这些诱惑已经使人们不顾一切甚至已经发疯了。

在河南省医科大学一间破旧的教学楼里，我见到了年过花甲的刘华莲教授。这是一个终生都在与潘朵拉做斗争的品德高尚富有人格力量的中国知识妇女。她颤抖着声音和灵魂，与李风这个裸露着真诚和激动的大孩子见面。

至此我才明白李风此行的真正目的，绝不是为了陪同我，而是为了能看一眼这位在李风生命中打下血红烙印的刘华莲教授，还有那两条从潘朵拉的盒子里流出来的黑河和洪河。那两条龌龊的河流在刘华莲教授和李风之间搭起一座桥，这座桥在五年前沟通了两个天南地北年龄悬殊的人，两个不同性格不同性别的人为了两条同样被污染的灾难深重的河流，走到一起为之奔走呼号为之梦牵魂绕。

这是一个值得人们尊敬的人，也是一个自己可以心安的人。

有这么一位妇人

对驴而言，是因为还有对它更有诱惑力的事物存在，比方说路边的青草比嘴边的青草更加肥美，比方说后边恰巧有一头母驴正在远处呼唤它，它无法抵御荷尔蒙对它产生那种致命的诱惑，因为它毕竟是一头畜生，毕竟是一头驴子，根本就不懂得什么责任感和义务感这些人类的劳什子。

有这么一位妇人，有这么一位教授，早在 1992 年初就开始了黑河污染及其对人群健康影响的调查研究，并设立了课题组。她从医学的角度，以科学的方法，通过全面的长期细致的对黑河两岸 500 米以内 17 个自然村、3 万人以上进行调查研究，对照区为距黑河 7 公里以上的和店及党乡的部分村庄的 3 万人；调查了从 1990 年到 1992 年 3 年期间常住人口的死亡人数及死亡原因，深入村村乡乡，共调查了 211685 人次。

历时一年，她写出了淮河流域抑或是全国第一份资料翔实、证据确凿。有理有据的有关黑河污染对人群健康影响的医学调查报告。

这份医学报告从七大方面着手，透过一组数字，说明黑河污染对当地人群健康造成的严重影响。黑河污染区的死亡率明显高于对照区几倍之多，死亡原因大部分都是恶性肿瘤。黑河污染对妇女妊娠结局的影响：两区共调查妇女 2612 孕次，污染区妇女不良妊娠率为 61.18%，对照区为 14.73%，污染区显著高出对照区。出生婴儿的畸形率：污染区是 212.12%，对照区

为 90.91%，高出将近 3 倍。健康体检：污染区成人肝肿大率为 61.71%，对照区为 21.96%，高出 3 倍多。儿童生长：污染区的儿童肝肿大率是对照区的 3.4 倍。

1993 年李风所采写的那三篇有关黑河和洪河的新闻报道，其中翔实可靠的数字资料便是刘华莲教授提供的。刘华莲教授当年对李风的影响绝不仅仅是几个数字，而是这些数字背后一个一个有关刘华莲教授的生动感人的故事和这些故事所蕴含的那一种不求名利、一心一意救死扶伤的坚韧不拔的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

淮河不会忘记刘华莲教授，这位出生于南方、毕业于上海医学院的中国妇女，将自己的一生都无私地献给了医学事业。她的高足范清堂如今已经是医学院的老师，他只要一谈起刘华莲教授就热泪盈眶，不能自禁。

小范告诉笔者，每一次走进黑河进行人群调查，刘老师都要大病一场。

有许多次刘华莲脚肿得都走不动路，却硬是不肯去休息，小范只好和同学们轮番背着她走村串乡，访家问户。那天晚上在黑河岸边一个小村庄里住下，小范走去给刘华莲教授打洗脚水，走回来时发现身材瘦弱体衰多病的刘教授躺在床上，两只脚搭拉在床下，已经斜倚在墙上睡着了。

在昏黄的灯光下，小范望着身体瘦小的恩师蜷缩的身影，忍不住抱着刘华莲教授那两只血泡压血泡的双脚，撩着水小心翼翼地刘教授洗脚。

小范一边洗，一边禁不住嚎啕大哭，边哭边鼻涕眼泪地嘟哝着说：刘老师，我就不知道你图个啥？刘老师，你又不是本地人，你自己是一个外地人，又是一个大学的教授，何苦要为一些认也不认得的农民，这样折腾自己呢！

刘华莲教授却丝毫没有察觉，因为她已经疲惫至极，已经完全睡去了。

这样一位坚强的老人，见到李风竟然会如此感动，这个中的缘由，绝非寻常人可以想见。李风约略地告诉笔者一些当年的事情，当年李风跑去找到刘华莲教授采访黑河污染有关事宜时，刘华莲听了也像今天这么激动。她一无遗漏地向李风讲了她所调查了解到的所有被污染人群的健康状况，讲到动情时，她热泪盈盈地说：

上蔡县都向上边反映过无数次，可不知为什么就是解决不了黑河的污染问题，那儿的人们都已经快要绝望了。可不能再这么污染下去了，黑河两岸的人群每天都在疾病和死亡的阴影下生活，这样下去黑河的人群都要骂共产党了！

李风忧郁而有些激动地对我说：她不是对我有什么感情，她是对中央电视台有感情，她觉得我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而中央电视台代表的是国家的形象。她以为上蔡县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中央电视台一定可以解决。我们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都有这种感觉，下去以后群众都眼巴巴地瞅着我们，以为我们有多大的本事。那种信任和巴望真让人觉得心里沉重。当年刘华莲教授那样说，让我觉得真是汗颜，肩负这么沉重的一种责任，一种渴求，有时候真让我们这些当记者的觉得承受不了！

我觉得潘朵拉对此理当无言，因为这是她最害怕的，如果我们的那些企业家和厂长们多少有几分责任感和义务感，淮河的污染问题就好解决了。潘朵拉却哧哧的冷笑着像一只解开了绳子的汽球，一边向空中冲去，一边大声地嘲笑我的书生气，说：你嘴里正在反复咀嚼着的可不是一根可以拿来压断驴子脊梁的稻草。

对此我像潘朵拉一样明白，只是话到嘴边，我不得不说。

没有人天天教导刘华莲教授，做人行事要有责任感和义务感，但是她却有。

赶驴上山一样的又是在前边拿青草诱惑又是在后边拿鞭子赶它，它仍然不肯乖乖的上山，这样的驴子在驴子里边也有许多。

对驴而言，是因为还有对它更有诱惑力的事物存在着，比方说路边的青草比嘴边的青草更加肥美，比方说后边恰巧有一头它所心爱的母驴正在远处呼唤它，它无法抵御荷尔蒙对它产生的那种致命的诱惑，因为它毕竟是一头畜生，毕竟是一头驴子，根本就不懂得什么责任感和义务感这些人类的劳什子。

可是如果是一个人类，是一个什么都懂的人类，那么我们就很值得认真地去分析调查一下他何以非得如此的原因，任何一个正常受过几年教育的人，要他自动地摒弃责任感和义务感时往往都是这样的，必须有一个前提，必须有一个理由，这个前提和这个理由就是有一个更实在更肥美更巨大的诱惑在鼓励着他在等待着他，权衡利弊，计较得失的最终，令他毅然舍弃做人的责任感和义务感，不惜铤而走险。

当然绝不是一根稻草的诱惑，也不是一头发情草驴的呼唤。究竟是一个什么样诱惑，会具备如此巨大的力量？确实是很值得人们深思的。

畸形女婴和生态悲剧

她患的是作为一个女性最致命的生殖器畸

形，画面上推出的女孩的生殖系统的特写，我让李风拍了下来，这个女孩竟然没有什么外生殖器和通道，只有一个小小的尿道口长在一片平坦板结之中，一个原本应该拥有却不幸没有生长出来的红色的象征物。

河南省医科大学电教室有一盘十分钟的电视专题资料片，忠实地记录了刘华莲教授当年做黑河污染人群健康调查这个课题时一些重要的发见。

这个资料片里的一些情形李风有的当年已经知道，有的也是第一次见到。

我和李风坐在电教室，静静观看了这部资料片。

黑河两岸污染区的畸形率，是对照区的 2.49 倍，资料片中一共记载了 5 名具有代表意义的典型的畸形儿童，有三名男婴，两名女婴，一名是面条也似的无骨儿童，一名是四肢均如海豚足肢式的严重畸形儿童，还有一名是兔唇。这些儿童的父母都是非近亲结婚的，经医学检验，亦无遗传基因的健康的双亲，惟一的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因为污染造成畸形。其中一例是女婴，这位只有 3 岁多一点的女孩，从外表看什么也看不出，似乎一点毛病都没有，健康可爱，可她患的却是作为一个女性最致命的生殖器畸形，画面上推出的女孩的生殖系统的特写，我们立即拍了下来，这个女孩竟然没有什么外生殖器和通道，只有一个小小的尿道口长在一片平坦板结之中，一个原本应该拥有却不幸没有生长出来的红色象征物。

我不知这个女孩长大了将拿什么东西来充作一个女人的资格？将如何像她周围的女孩那样结婚、生子？如果女孩长大后知道自己是一个这样的畸形女人，她将何以面对自己？面对这个薄情寡义的世界？面对自己的花季和漫长的人生之旅？

因为河流的污染，地下水的污染，当她的双亲喝着含有致畸物质的污水幸福地交欢的时候，当她还是子宫里的一粒卵子的时候，当精子拖着细长的尾巴努力地钻入卵子之中并发出胜利欢呼的时候，当珠胎暗结的时候，当脐带哺育着她，当羊水浸泡着她的时候，当她成形并生长出一个畸形的器官时，她一生似乎便已经注定。

从她降临人世发出第一声呱呱的啼哭起，她的终生便被不公平所注定，要在以泪洗面中的痛苦中度过，她的原本应该像玫瑰花一样相继开放的青春季节，便已经被不幸的阴云严丝密缝地笼罩，甚至连一点希望的微光也无力透出去了。

资料画面上的母亲，悲哀无奈的眼睛和那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孩睁着亮丽的大眼睛怯生生地瞅人的样子，看得都催人泪下。

我禁不住问自己也问别人：她一个幼小的生命又有何辜，要忍受这样先天畸形的痛苦？这个责任究竟要谁来负？谁又能负担得起？谁又能赔偿得起？

我望着画面上那个被定格了的可怜的天真无邪的女婴，心情倍觉苍凉无奈，突然明白，过去总以为最可怕的不是正面的厮杀，而是背后官小之辈的暗箭伤人，看了这个可怜的女婴，我简直觉得暗箭伤人其实一点也不可怕，至少你还知道这是你的仇人干的，至少你还知道他伤你是因为你在什么时候得罪过他，你心里多少还有一些估计和约摸，差不多也能猜出一种可能性，大海捞针也有针可捞。

现在我才知知道，最可怕的莫过于像畸形女婴这种悲惨的在娘胎中就遭了毒手和暗算的情形，甚至连传说中杀人于无形的剑侠巫术也没有什么可比性，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女婴从来没有得罪过谁，招过谁，惹过谁，却生成这样一种生不如死的先天的畸形，却上告无门，入地无路，连一个害自己的真正的敌人也遍寻不见。

在她的面前，这种污染现象也不是谁有心专门要这样做，而是无组织的互不相关的沿河许多工厂在为自己生存发展和经济利益有意无意地为恶，你永远也找不到一个可以状告和绳之以法的具体责任人。

如果有这种可能，我有能力也有决心在大海里捞起这一根针，可是我最终却悲哀地发现，根本就没有这种可能，根本没有这根针，根本就没有捞针的大海也没有。

最终她只能自怨自艾，最终她只能自悲自怜，最终她只能责怪她自己的命运如此不济，只能怨天尤人，只能责怪上天不公道，埋怨造化欠考虑，潘朵拉太可恶。

哦，好一个十恶不赦的潘朵拉，你也是一个女性，你难道就能这么的忍心？

我听见潘朵拉从我头顶疾掠而过的声音，她的两只黑色的羽翼发出阵阵尖锐的翘响，盘旋出多个愤怒的弧线，用古老的阿刺伯文字在空中写下了这样一行字：

不要总是这样责备我，这样的坏事连魔鬼都不肯做，你虽然已经找到一根足以压断骆驼脊梁的稻草，可是你却找不到一匹合适的骆驼去驮它！

——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也是一个莫大的悲哀。

人之初是一块钻石

现在我先告诉大家，是谁打开了那只潘朵拉

的盒子？是他和她，那个他和她不是别人，一个是居里，一个是居里夫人。千真万确！如果大家不信，那就听我慢慢地从头告诉你，这一切的内幕和真相。能量，恶的能量一已释放，便不可收拾。

可是我前几天，准确地讲是在 1998 年 6 月 13 日上午，我正在看电视《居里和居里夫人》，我看着看着，眼前突然一亮，竟然从电视上发现和认出了那两个打开潘朵拉盒子的人。天呀，就是他！就是她！

就是这一对男女，外加上一个爱异想天开的老头。

这个老头把各种石头拿到阳光下晒，以为吸足了阳光物质的石头会使底片感光，可是他试验了无数种石头，统统都失败了。

试验中，老头无意发现了那只潘朵拉的盒子，它的形状像一块黑色的石头，名叫铀石。就是这块黑色的石头无意中使黑色的底片感了光，在底片上印下了一把钥匙的形状。这个多嘴多舌满脸胡子的胖老头，没有收好那只盒子，却把这个发现和那只潘朵拉的盒子一齐交给了他和她两个人。他和她仅仅是出于一种科学家的好奇和怀疑，为了证明什么，就煞费苦心研究了一番，两人悍然共同打开了那只黑色的潘朵拉的盒子，放出了一群可怕的魔鬼！

追踪纪事：李斯亦应惊起

秦王言曰：卿何其多事也，尔伏身于九泉之

下，为人间污秽所困，惶惶然奏告于寡人，求寡人

为卿排忧解难。奈何斯时非昔时矣，寡人陵寝久

已坏朽，骨泥尚日日浸泡于臭浆废水之中，自顾

尚且不暇，那有闲工夫，管你上蔡县的鸟事！

从 1985 始，我便开始追踪那个名叫潘朵拉的女人，我先后在生态系列《猎天》。

《猎地》。《猎人》、《天猎》、《地猎》、《天欲》、《地欲》、《人欲》等长篇小说中对其行踪与其丑行有过寓言式的无情的揭露与批判，但小说这种文体总有天马行空的造车之嫌，总有夸张之处，虽然很是博取了众多读者的喜欢和有识之士的推崇，但难免失之于毫厘，谬之于千里，得赏于世人之时，也赚取了一些莫须有的误解。

我因之而苦恼，因之而搁笔经年，欲谋定而动，欲就实而避虚，欲实实在在地揪住那个无所不在的邪恶妇人，做一通切肤切骨的鞭挞文章，这便是我四月间接受王厉子之邀，欣然从命赴京的真正原因，有此一个正大光明的缘由，之后因那些潘朵拉的亲戚们（原以为魔女多孤独，殊不知泱泱中国，竟有潘朵拉无数远亲近邻相帮于她）挑唆而生发出一连串的蝇营狗苟的鬼蜮勾当，均可忽略而不计，悉数不予理睬。

在此期间，我走去位于上蔡县的黑河流域，遭遇了一位满脸沧桑的老农民，这位老农民黝黑的额头上布满龟裂如干旱土地一样深刻的皱纹，诡秘地憨笑着，张开露出红色牙床的嘴巴，走风漏气的为我念出这样一段顺口溜：

六十年代，淘米洗菜。

七十年代，农田灌溉。

八十年代，鱼虾绝代。

九十年代，害上加害。

九六九七，治理三废。

淮河变清，李靠朱代。

前边几句顺口溜，我以前就听过，可后边几句却是我从没听说过的，尤其是最后一句，更是让我满头雾水，莫衷一是。

我只好疑疑惑惑的，凑拢那位老农民的黑油油的耳朵，扯开嗓门大声地向他发问：大爷，请问您啦，“李靠朱代”是什么意思呢？

那位大爷用枯焦的手掌拢了黝黑的耳朵，诡秘地笑着，做出一副使劲听话的样子，却终于也没有能够听得明白，就那么摇着一颗凝霜积雪的白头，讪笑着，背了一双枯焦的手儿，慢慢悠悠地走进一座静悄悄没有狗吠鸡鸣之声的村子里去了。

我醒悟过来，连忙跟进村子里去，可是找遍了全村，却无有踪影，那位老农民已经追寻不见了。

我在村子里徒劳无功地打听了半天，也没有能找到那个相貌高古行为诡秘的老农民的影踪，只好垂头丧气一无所获地怅然而归。

原本这段在淮河流域广为流传的顺口溜，是没有后边几句的，后边几句显然是被人刚刚续上的。难道会是这个其貌不扬的老农民所为吗？实在让人不敢相信。

我惟有讶异：莫非真的遇上了什么世外高人？

这句近似于谶语般的“李靠朱代”，到底会是什么意思？

我胡乱猜了半天，虽然略有所悟，可到底也没有找到一个确定答案，也只好暂时弃之脑后，束之高阁，索性不去想它了。

我记不得那个村子叫什么名字，只确切地知道，那个村子里有一座很有名的古墓，村人世代相传，香火不断，把那座古墓称作——李斯墓。

难道连那个秦国的宰相李斯，也被从墓中惊起了吗？

那天黄昏，黑河鸣鸣，洪河哀嚎，上蔡县泫然有雨。

春秋战国时，出身于上蔡县的李斯，与韩非子同是荀子的高徒。

李斯不被楚王重视，西入秦，任秦相，变法强国，死后归化于故里上蔡泉下。

泉下有知的李斯，此刻却蓦然惊起，拂衣整冠，佩剑上殿，就上蔡县境内黑洪二河被污染之事，向秦王奏本进言，不料秦王听了袍袖一拂，将李斯挥下殿去。

秦王言曰：卿何其多事也，尔伏身于九泉之下，为世间污秽所困，惶惶然惶惶然奏告于寡人，求寡人为卿排忧解难。奈何斯时非昔时矣，寡人陵寝久已坏朽，骨泥尚日日浸泡于臭浆废水之中，自顾尚且不暇，那有闲工夫，管你上蔡县的鸟事！

最后一句顺口溜，八成便是被秦王抢白训斥的灰溜溜的李斯，情系于乡人，又苦于无能为力，只好站在奈河桥上，杜撰一句顺口溜，以警示世人，也未可知。

当然，这只是一个潘朵拉式的荒唐无稽的笑话罢了。

十三、李风打响第一枪

李风是一棵树

每逢工作的时候，李风都恨不得变个牛魔王，有通天彻地的本事，身上长出三个牛头十二双牛腿，就忙得屁颠屁颠的，连铁扇公主也顾不上理睬。好在李风的铁扇公主从小就读得一手的好书，一不留神，就读到美国去了。

形象的感觉是，李风是一棵树，而且是一棵独立生长的树。

树的品种有很多，如松如杉如槐如柳如钻天杨什么的，而且所有的树木几乎都喜欢共生，喜欢一棵挨一棵地挤在一起，形成一片森林。喜欢独立生长的树在树木王国中很少见，几乎没有。只有极少数的树才喜欢独自生长。这类树大多非松非杉非槐非柳非钻天杨，而是一种结果子的乔木，如野生的银杏树和白果树一类。

这类乔木，一般树冠都很大，三三两两兀立在各自的领地中，树与树之间，总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独立着一个思想，营造着一个行为，完成着一个自己。

在我的印象里，李风就是这样一棵树，一棵独立的生长在希望田野中露珠晶莹生机勃勃的树。这棵树因为独立而高大，因为高大而独立，虽然不会像美人松云杉或是钻天杨那样一门心思的入云参天，但却充满生机，有自己独立不羁的思想空间和行为准则，能够自成一体，顽强地体现自身存在的价值。

我想，绝没有人会怀疑，这是一棵能开芬芳花朵，会结美味果子的树。

这棵树是敏感的，它的每一片叶子都充满了感觉。

李风的细心，李风的礼貌和周到，在李风的身上像树叶一样比比皆是，不胜枚举，“新闻 30 分”的记者们、李风周围的人们，没有人不知道。

这棵树也是自尊的，每一根结实的枝干上，都结满了自律的果实。

我写过一篇文章，认为报纸也好电视也好电影也好戏剧也好，都是语言文学这株大树上结出来的品种不同的果子，所以我从来都把传媒界引为同类，对报社记者的印象有好有坏，对电视台记者的印象也有好有坏。

李风很敏感地察觉了这一点，对我说：你大概对我们电视记者有一个错误的印象吧？记者总是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到处收红包，是不是？别的地方我不敢说，在“新闻 30 分”那可不行。我们有明文规定，“新闻 30 分”的记者不许收红包，要是偷偷收了红包，一旦知道，那就没有二话好说，马上卷铺盖走人，您爱哪去哪去吧！

我稍许表示了一点诧异，因为收红包这种事，我早已司空见惯，说来惭愧，连我自己都收过红包，也派过红包，社会风气如此使然，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向李风表达了这层意思。李风大摇其头，说：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收了人家的好处费，就等于出卖了自己说话的权利，“新闻 30 分”绝不容许！

我听了有些不信，后来我私底里问过许多人，才知道这类话，不光经常挂在李风嘴上，也挂在所有“新闻 30 分”记者的嘴上。

以 32 岁的制片人做领班的“新闻 30 分”，它的记者们平均年龄才二十七八。嘴上虽然没毛，但是办事很牢。这些年轻的记者们还不曾被社会的烟油和世俗的污垢所沾染，生气勃勃，个个都有股初生牛犊不怕虎、风风火火闯九州、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梁山好汉的劲头。

虽然也有人背地里悄悄告诉我说：别听他们吹牛，他们不收红包是因为他们不敢，不想因小失大，因为台里和“新闻 30 分”都有纪律，谁要是敢收红包，谁就得自己让自己滚蛋。一点不开玩笑的，二话不用说，饭碗马上就砸啦！

我替他们辩护说：其实敢不敢还是其次的，我觉得他们所以不收红包，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都很热爱很在乎“新闻 30 分”这份工作，这些记者哪个不是人精，到哪不能工作？要是搁在别处，不等你开除他们，他们就先炒了你的鱿鱼了！

我这样一说，竟然得到了那位朋友的认同。

记者是些什么身份，得自己先弄明白，李风说，很多人以为当记者就是当大爷，想捧谁就捧谁，想踹谁就踹谁，那可不行。说起来我们记者和跑街的也没什么两样的，国外就是这样的，记者就是跑街的，一门心思好好跑你的新闻，什么也别贪，什么也别想，这样才能成个好记者！

作家和记者都是语言文学这棵大树上结的果子，原本是一个旅类的，说记者是社会的良知，说作家是社会的镜子，都不嫌过分。只是记者们不想吹牛，作家们也不想牛吹。这年头说大话拾小钱的主儿人们见多了，自然是什么也不信。

不信就不说，其实说与不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行动。

“新闻 30 分”从来不吹牛，虽然记者们个个很牛。

但是做起事来，“新闻 30 分”却很牛，不光有牛的力气，牛的正大光明，牛的厚道和正直，还有牛的吃苦耐劳和牛的韧性牛的坚定。

“新闻 30 分”为午间新闻，每天中午 12 点分秒不差，准时播出。

全国人民都过星期天，可是“新闻 30 分”没有休息日。

“新闻 30 分”所有的采编人员，每天都要牛不停蹄，牛不卸磨，想方设法，保质保量，供足半小时的新闻，绝不可有些许的懈怠和片刻的贻误。

作为领头牛的制片人李风，一身的牛气，一身的牛劲，不光要为每天的电视新闻统稿审稿改稿，还要策划明天后天以及下一步的新闻报道。

李风和他的铁扇公主

王厉子在一边马上插嘴说：你来之前，李风

刚出院几天，淮河行动后“新闻 30 分”累趴下一

大拨人，李风更是祸不单行，两个多月时间，动了

两次手术，先是割去了阑尾，后来连他的胆囊也

让人家给摘除了！

如今“新闻 30 分”已经是偌大一个部门，杂事横生，头绪繁多，都需要李风亲自过问，仅此一端，便可见李风不用扬鞭自奋蹄的吃苦耐劳精神。牛得不光很有牛劲，而且牛得很是地道了。

兼之李风在做事上，偏又少了一种牛的粗枝大叶，多了一种唯美主义倾向，对自己严格得近乎苛刻，总想将周围举凡大事小事，鸡毛蒜皮，都做到位，才算是功德圆满。所以每逢这时候，李风都恨不得变个牛魔王，有通天彻地的本事，身上长出三个牛头十二双牛腿，忙得屁颠屁颠的，就连铁扇公主也顾不上理睬。

说是李风燕尔新婚之夜，依香偎玉之时，一时高兴，便跟新婚的妻子信誓旦旦地保证说，从结婚这天开始，我要把所有的工作都留在八小时做，然后下班回家来陪你，当时妻子感动得不知说了多少甜言蜜语，给了李风多

少个香吻。

可是事过之后，李风却不由自主一头扎进工作里，忙得四脚朝天，连家也回不去，一个星期，才有机会和妻子在一起吃一顿饭，一个月才和妻子有机会过一次夜，气得妻子不住地埋怨，拿李风新婚之夜的保证要挟李风，李风无言以对，只好讪笑而已。

好在李风的铁扇公主，从小就读得一手的好书，一不留神，就读到美国去了。

剩下李风一个留守男士，真就成了一个牛魔王，乐得逍遥自在，索性一头扎进工作里，再不肯出来，连个定时联络的热线电话也常常忘了给铁扇公主打，常常被夫人的芭蕉扇扇起的小凉风吹得时常感冒。

以至连许多记者也为李风叫屈：李风这人太累自己了！

别人说归别人说，李风自己觉得不亏，这就足够了。

李风是个明白人，心里有一杆秤，比方老潘，在李风心里和嘴上，便很有些斤两，不时要说起，尤其是谈到淮河报道时，更是如此。

第一次见面，李风就和我讲：你该见见老潘，不过，老潘在淮河行动后累得犯了病，现在还住在医院里养病，恐怕一时半会你还见不到他。

王厉子在一边马上插嘴说：你来之前，李风刚出院几天，淮河行动后“新闻 30 分”累趴下一大拨人，李风更是祸不单行，两个多月时间，动了两次手术，先是割去了阑尾，后来连他的胆囊也让人家给摘除了！

对自己在淮河行动时不慎生病的事，李风似乎很有几分不好意思，自我解嘲地笑道：你看，我这人本来胆子就小，现在可好，连胆也没了！

记得李风是这样向我说起老潘的绰号潘淮河的。

李风很幽默地笑着说：老潘是负责跑环保新闻的，动不动就报道污染的事，所以当时大家都叫他活污染，中央下决心让淮河变清，救了老潘，大家改叫他潘淮河。

据说老潘听了咧着嘴乐，说：潘淮河比潘污染好听！

首届中华环保世纪行对中国的污染问题和淮河的污染问题都投下了至关重要的一瞥，就那么蜻蜓点水走马观花，简单而随便的，甚至有点漫不经心的一瞥，便几乎使上上下下所有的人们都吓了一跳。

那时的人们对中国的环境保护问题还所知甚少或是懵懵无知，而对那时还在悄悄腐烂发臭的淮河投下最前一瞥，并通过新闻联播广而告之的新闻人，便是现任中央电视台“新闻 30 分”的制片人李风。

李风是人大新闻系首届广播电视专业的高材生，大学四年当了两年班长，毕业后分到中央电视台新闻部工作，去淮河前，是个名副其实的大小孩，年龄虽然不大，却已经拥有了四度春秋的电视新闻记者的生涯。

据说到中华环保世纪行组委会领任务那天，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们都去晚了一点，选题被先到的记者挑捡一回，把感兴趣的都选走了。剩下的几个选题中有一条很是吸引了李风。那个选题事实上只有没头没尾一句话，大意是——河南境内有一条小洪河，因为近年来河流被上游工厂严重污染，两岸农作物连年减产，每年造成上亿元的农业经济损失。

李风当时迷迷糊糊鬼使神差地就要了这个选题。

我问李风，是不是一种职业性的敏感，使你捉住了这个重大选题？

李风是个老实人，对撒谎有一种本能的厌恶，自然是老老实实以诚相告。

那时李风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淮河，环保局提供给他们选题，通篇也没有提淮河这两个字。当时他们只知道河南境内有一条小洪河，脏得厉害。

去了以后他们发现小黑河也脏得厉害。

后来他们顺着小黑河和小洪河一路追下去，追了好长时间，才追出条淮河，这才明白，敢情小黑河和小洪河，都是属于淮河流域的支流。

在调查中他们还发现，那时上游污染下游，下游又污染下游，下游再污染下游的现象，在淮河流域已经相当严重，相当普遍了！

李风这个大小孩根本就不想虚张声势为自己脸上贴金，断然地微笑着告诉我道：我根本就没有什么职业性的敏感，其实可以这么说，是撞上的，如果非要有个什么说法，我觉得也只能说，那是天意！

相信自然也是有灵性的，只要人类真心实意地亲和自然，自然也会努力地亲和人类，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和自然是双向选择的。

所以在李风选择了淮河的同时，淮河也同时选择了李风。

于是，李风走向了淮河，淮河也走向了李风。

谁打响了淮河行动的第一

曲格平教授充满激情地叫起来：哎呀，真不

得了，那河水跟黑醋一样，看得人心里真不知是

啥滋味，我一边看电视一边就想，这个李风，简直

是太棒了，真是太棒了！

1993年10月8日7点的“新闻联播”的播音员播报说：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一些地方的环境污染日趋严重，这次由全国人大环保委、中宣部、广电部、国家环保局联合举办的“中华环保世纪行”，就是要向环境污染宣战，向违反保护环境法规的行为宣战，以救救我们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这片净土，这片蓝天，我们中央电视台的六个采访报道组已经奔赴河南、河北。天津、陕西、甘肃、辽宁等地采访，从今天起，我们将在新闻联播中连续播出他们从各地发回的报道，下面请看本台记者从河南发回的报道。

这篇从河南发回的报道，便是由李风采拍的有关小黑河和小洪河被严重污染造成两岸人民深重灾难的连续新闻报道。

电视屏幕上出现了李风的图像，27岁的李风那时原本应该比现在更像个大小孩，可伫立在黑河和洪河岸边的李风，数日之间，却似乎苍老了十几岁，脸上连一丝笑意也没有。他手持话筒，面对摄像机镜头，神情严峻得近乎忧郁，偶尔转动的深邃的目光中，流火般迸溅出忧郁而悲愤的火星。

这些火星烛亮了他十几天的采访和思考。

在李风的背后是一条银龙般蜿蜒而来又蜿蜒而去的雪堆素裹的河流，令人遗憾的是这条银龙般的河流身上足有几米高的凸起物，并不是真的龙鳞而是污水的肮脏的白色浮沫，在这些浮沫的下边，流淌着一河墨汁般臭气熏天的污水。

心情悲愤难捺的李风，当年就是这样，站在黑河岸边，背对着不幸变黑变红的两条河流，背对那些窒息了河流生命的面貌狰狞气焰浮嚣的白沫，强自抑制着自己的激动，向全中国全世界播报淮河流域的情况。

李风：我现在所站的地方是河南省上蔡县，我身边的这条河流，名字叫做黑河，就和它的名字一样，现在这条河流颜色已经完全发黑了。黑河两岸，小鱼当饭。70年代以前，黑河是当地群众的母亲河。1971年漯河第一造纸厂投产以来，由于造纸废液不加任何处理就排入黑河，这条小河就开始

一天天变黑变臭，污染了当地的地下水源。1985年，上蔡县对流经本县的黑河沿岸的情况提供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河水污染使鱼虾几乎绝迹，偶尔捉到小鱼，均头大身小，躯体黝黑，鱼肉有毒。相反黑河成了蚊蝇孳生地，子子满河，蛆虫很多，大的有3厘米长，到处乱爬，使人望而生畏，不堪入目。蚊蝇的大量繁殖，使已经绝迹多年的一些恶性传染病在河区重新开始抬头，黑河变成了一条毒龙……

李风激动地继续播报：

河南省医科大学刘华莲教授领导的课题组，为我们提供的一份最新医学研究报告中披露，黑河所到之处，恶性肿瘤的发病率比附近未受污染地区高出一倍多，死亡率高出1/3。在黑河岸边的村庄，每3个成年人就有两个肝肿大，每10个儿童就有9个肝不正常，因为肝病和传染病，上蔡县有些村庄已经连续7年征不上一个合格的兵员。污染甚至于导致遗传基因的突变，当地有6%的母亲生的是畸形儿，还有不少小生命来不及出世，就已经胎死腹中。在黑河流过的上蔡县车张村我们见到了这位已经6岁的男孩，他的父母是一对纯朴的农民，既不是近亲也没有遗传病史，但是他们惟一的儿子生来就是这个样子，为治好儿子的病，他们已经花了3000多元，儿子还是成了个废人，母亲每天一口一口地喂儿子吃饭，但是母亲永远也不可能听儿子叫一声妈妈……

从黑河岸边的普通农民成长为漯河市创利大户的第一造纸厂的厂长韩国忠对记者说——画面上是李风采访韩国忠，韩国忠用浓重的地方口音说：从利税上讲，我是人民的功臣，从污染上来讲，我是人民的罪人。因为我是黑河上游的污染大户，稻草制浆要用烧碱，这些含着大量烧碱的黑液，污染了黑河下游……

画面上李风在采访漯河市市长……

李风：新一任漯河市市长也表达了治好黑河的决心，黑河两岸的人民期待着黑河不黑的那一天早日来临——这是本台报道的。

资料镜头之二：李风拿着话筒，正在采访刘华莲教授。

刘华莲教授是个50多岁的中年妇女，面容清瘦，拿着一根教鞭戳点着挂在教研室墙上的一张张表格，其中有人群全死因组死亡率与污染区死亡率比较、两区男性主要死因死亡率比较等表。

刘华莲教授激动地说：污染区男女人群全死因组死亡率明显高于对照区，其差异有显著性的意义（ $P < 0.01$ ）。两区男性主要死因死亡率，污染区明显高于对照区，1990 - 199年两区对照表明，污染区的呼吸道疾病死亡数为112人，而对照区只有98人，恶性肿瘤死亡数，污染区为127人，对照区为54人，高出两倍多，新生儿疾病污染区死亡数为33人，对照区为17人，其它疾病也都高出对照区几倍，这就说明，污染区是呼吸道和恶性肿瘤的高发区……

李风专注地听着，摄像机沙沙地响着。

资料镜头之三：李风走进黑河岸边的车张村，村民们像过节一样围观，孩子们围追着他们，一边嘻嘻哈哈打打闹闹。

李风走进一间低矮的屋子，屋子里一贫如洗，一个青年妇女怀里紧紧抱着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半睡半醒的像一团稀泥似地粘在母亲的怀里。

李风问：这孩子多大了？

母亲答：都6岁了。

李风：生下来就这样吗？

母亲黯然神伤：生下来就是这样……

李风同情：治过病吗？

母亲眼里全是泪水，说：治过，花了 3000 多块钱，跑了好多地方，都说这病治不好，也不知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好好的生下来就是这么个废人，不会吃不会说连哭都不会，全靠我一大天抱着他，一口一口地喂着他，一把屎一把尿的……可怜的到哪年哪月才是个头呀，呜，呜……

母亲哽咽良久，终于将头埋入孩子怀中，痛哭失声。

李风见状，扭过脸去，不忍再看。良久之后，母亲才啜泣着上了悲声。

李风这才转过脸来，问：您能不能把孩子放在床上，让我们拍一下呢？

母亲很不情愿地小心翼翼地把孩子放在床上，四肢畸形的孩子软得像面条，一放到床上就像被抽了筋，浑身瘫软，不成形状，软体动物一样搐动不已……

资料镜头之四：李风在采访漯河市第一造纸厂厂长韩国忠。

韩国忠是四十五六岁的中年人，中等身材，质朴中透着精明，说一口方言：我是黑河上游的污染大户，稻草制浆要用烧碱，这些含着大量烧碱的黑液，污染了黑河下游。我是从小在黑河下游长大的，黑河过去下游的水很清很清，我小时候天天要瞪着水过河去上学，天热了我就在里边洗澡、游水。摸鱼，那时的鱼多咧，一摸一大堆，还有虾子……漯河造纸厂一投产，小黑河就真的黑了，我现在都没脸回家去，村里人都骂我哩，我真是不敢回去，也没脸回去，我对不起他们……我一定要下定决心好好地治理污染，给我家里的人和下游的人们一个交代……

举着话筒的李风脸上是若有所思的神情。

资料镜头之五：李风身穿一件印有九 亚运的黄色 T 恤，手拿话筒，神情忧郁地顺着黑河往下游走，脚步沉重而蹒跚，扛着机器的摄像师张保明跟在他的后边。

与他们同行的是那条漂着肮脏浮沫的小黑河，在阳光下，小黑河像一条鳞甲闪闪的毒蟒，迤迤而去，直没入在天的尽头。

漯河第一造纸厂的污水口，哗哗地喷吐着浓黑的污水，这些污水举着白沫和固形悬浮物的牙齿，如同一张巨口，咂咂有声地吞咽着，迅猛无比地向黑河扑去，将黑河扼在爪下，吞入口中，嚼出一河污黑的涎水，向下流游去。

在一个水流迂缓的地方，河面布满了一尺多厚的白沫子，河流完全被窒息。河流在窒息中腐烂发臭，正常生命的迹象荡然无存，连子子也被窒息而死，只有硕大的蛆虫欢欣鼓舞地在河岸上四处乱爬。这些厚厚的白沫子在太阳的烘烤下竟然已经发黑，其形状如同龟裂的土地。李风瞠目结舌地望着如此怪诞的河流，让摄像准备好，自己找来一根长长的树棍使劲搅那些沫子，棍子一搅之下，那些干透了的沫子，竟然如同灰尘和粉末一样纷纷扬扬地迸散开来，细烟一样带着恶臭的粉末钻入了李风的鼻腔，呛的李风掩鼻而退，抱头鼠窜，咳嗽不已。

河边上几个孩子在呆呆地瞅着他们忙忙碌碌，表情十分木然。

李风走向那几个孩子，问：小朋友，你们觉得这河臭不臭？

一个看起来只有五岁的小男孩奶声奶气地说：臭！

李风问：你们有人下河游过水，或是洗过澡吗？

一个七八岁的男孩仰着小脸，懂事地说：爹说过，我一生下来这河就臭了！

李风问：你爹呢？

男孩不语，低下头，眼里有泪花闪动，渐渐饱满，扑地滚下脸颊。

旁边一个小女孩低声地代他回答道：他爹病死了。

李风吃惊地问：什么病？

小女孩说：我妈说他爹得的是噎食！

另一个大孩子纠正说：不对，老师说，是食道癌！

李风伸手抚住男孩的头，默然良久，问：你们见过不黑的河吗？

孩子们尽皆茫然。男孩想了想，眼一亮道：见过的，那边就有一条不黑的河。

李风鼓励地望着男孩问：不黑的河？是什么颜色呢？

男孩挂着泪花的小脸在阳光中像带露的花朵一样圣洁，天真地说：那条河不是黑的，是会变颜色的，有时是蓝的，有时是红的！

小女孩抢着说：不光是蓝的和红的，有一回还变成黄的呢！

大孩子纠正他们说：那条河叫小洪河，红的时候多，变颜色的时候少！

李风问：这样的河流你们喜欢吗？

大孩子想了想说：老师说，有一条河叫五彩河，五颜六色的，挺好看的！

那个两岁多的小男孩在一边冷不丁的冒出一个字：臭！

大孩子有点尴尬的不好意思的笑了：是挺臭的，要是不臭就好了！

李风默然，喉头哽咽了一下，又哽咽了一下，无法再继续问话，转身离去。

阳光朗照着死鱼一样翻白的小黑河，朗照着几个孩子天真木然的小脸，几个孩子就那样呆呆地站在死亡的河边，目送着李风的背影渐渐远去。

资料镜头之六：夜。招待所房间里。

李风伏在桌前写新闻稿，写了撕，撕了写，烦躁得坐不住在地上乱走。

李风坐在床上，背靠着墙，把稿纸摊开在展平的双腿上，凝思了许久，笔尖在纸上落下又拿起，半天写不出一个字，心里郁问得要死，眼前老是晃动着那个畸形的小孩和那个失声痛哭的不幸的母亲的身影。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忽然间，那枝笔像有了灵魂，在稿纸上飞舞起来——每天，母亲一口一口喂儿子吃饭，可是她永远也听不到儿子叫自己一声妈妈……写到这里时，李风胸口憋闷得像是要爆炸，喉头上下反复错动，硬咽的嗓子生疼，按捺不住满肚子的悲愤和辛酸，泪水山洪爆发般汹涌澎湃，夺眶而出……

稿纸上布满了斑斑泪迹，洇的字迹都模糊不清了。

过后李风和我说起他流泪的事，很是有点不好意思，觉得流泪有失一位新闻记者冷静自持的职业风度，也有些许顾虑，觉得这似乎像过去的一些东西，已经害人不浅，万万不要再拿到现在，过去那些假大空高大全的东西吓坏了他。

他的过分的审慎和不好意思使我很是为之感慨。

那个村子里还有许许多个畸形儿，比李风见到的那个孩子的情形更糟。

这些无辜的小生命只因为投错了娘胎，投到了这个污染区，就成了废人。

那些孩子们有什么错，大人们有什么错？凭什么要让他们遭这么大的罪？

那些污染河流的企业，难道就没想到这是图财害命吗？

这不是犯罪是什么？这不是造孽又是什么？说什么都难辞其咎！

更惨的是还有许多刚出世的孩子，一生下来就被父母发现是畸形儿，父母怕别人笑话，就含泪忍痛狠狠心悄悄的把他们弄死，丢到河里或是埋到地里去了。

这些畸形儿的数目是无法统计的，只能算是一些刚刚出世便被流产的生命。

那些生下来的孩子虽然给不慎的父母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和一生的心病，但毕竟享受到了父母的真爱，拥有过父母无私的怀抱，活着的他们虽然于人于己都是一种痛苦，都是一种负累，但毕竟他们到人世走了一遭，也算是不虚此行了。

那些连天日也没能见到的可怜的小小的冤魂们，他们招谁惹谁啦？

在娘胎里就被污染畸变了他们，在人间迎接他们不再是父母溺爱有加和娇纵爱怜，而是父母牵肝动肺的惊恐和畏惧，是双亲无奈哭泣的绝望的泪眼，是扼杀亲生骨肉的一双双颤抖的手，是一辈子负疚的回忆和终生痛苦的玩味。

等待这些畸形儿的不是温暖的怀抱，只有一条冰冷浊臭的河流和一杯在污染中发臭的黄土，薄情寡义的人间，根本就没有他们这些畸形儿立足的地方。

他们的命运较之那些生下来的孩子，是不是更惨？

最终我还是如实这样写了，所以固执己见，是因为我深为痛切地感到，我们现在的中国，太需要良知了，我们现在的时代，太需要崇高了。

只要那些地方政府的官员们，多一份崇高的心态，便会少几个为害地方的企业。

只要那些企业的老总们，多几许仁厚和良知精神的陶冶，多几个韩国忠那样痛心疾首幡然悔悟的老总，中国的土地上便会少几条污染的河流，河流里便会少许多暴死和慢性中毒的野鬼孤魂，少许多畸形的孩子和许多哭泣的母亲。

人间多少不平事，只恨无人报君知。黑水日夜说冤屈，还有红河在哭泣。

接下来，李风遇到了比黑河更难对付的洪河。

十四、把根留住

李风是个大小孩

风教会了树枝如何摆脱风的追杀，而教会了树叶如何抛开雨的纠缠，雷电教会了树如何躲避雷电的轰击，社会和生活教会了李风如何保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于是含蓄淡化了李风的微笑，微

笑又含蓄了李风的个性。

对此我绝不敢妄言崇高，因为刺探有关内幕时，你必须像个训练有素的间谍一样，既要深藏不露又要行动迅速，所以从接到内线王厉子的两次情报，到我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走入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钟的大本营时，前后只用了三天时间，两天密谋策划，一天用来赶路。当然这是说笑的。

未见到李风之前，我先从王厉子编辑的一本月刊中，看到了王厉子所写的有关李风的一段十分有趣的文字：

夫人不在，李风像匹脱疆的野马，每日为淮河报道的事上蹿下跳。天天都要熬到半夜，顿顿饭都伴有电话，忙得隔天洗一次脸，周末刷一次牙，一个月时间才换了一身衣服。但他心里却充满了欢乐，真所谓如鱼得水。

谁料盛宴亦有散时。淮河报道终于完了，李风郁闷多时，到了除夕夜，李风孤独地站在京信二楼的办公室里，寂寞、痛苦，百无聊赖，来回踱步，来回叹息，来回不知所措。熬到凌晨一点钟，终于灵机一动，找出全部淮河报道的带子，饱看一遍。最后，在朦胧曦微的晨光之中，他合衣躺在一排椅子拼成的“床”上，香甜的入梦了。

这篇文章提供给我的信息至少有如下几条：

其一，李风显然已经结过婚，目前夫人不在家。独处旷居的李风，为人们提供了想象的空间。其二，李风似乎总在想方设法地找事做，一旦没事做时就浑身不自在，无疑是个敬业精神很强的人。其三，李风生活过得很是简单或日粗枝大叶，很有些得过且过的嫌疑，似乎除了对工作倾注热情，对自己这个人是很不放在心上的，大有做一天生命的和尚，就撞一天生命的钟。

以我的人生经验，大凡这类人，只要多少有几分聪明，运气不要实在太坏，一般都是可以成事的。对这类人，我一向是引为同类的。因而便先有了几分敬意。

那天我在房间中等候李风时，想象李风是个外表有点邋里邋遢的中年人，至少看起来不再年轻。可是走进房间来的却是一个风风火火，佻佻脱脱，年轻英挺，舒展大方，玉树临风一般的大小孩，让我很是吃了一惊。

李风留着一个小平头，眉眼说不上清秀却十分的生动悦人，尤其是那一脸不卑不亢、真切谦和、儒雅蕴藉的大小孩也似的笑容，委实的可掬可捧，可亲可近，可圈可点。身高足有一米八零，看着有些单薄，衣服穿在身上显得晃晃当当的，给人一种假象，以为属于那种天天俩鸡子一斤奶养大的豆芽菜之辈。出门在外，如遇什么坏人劫道，准保软得像面条，吓得尿裤子，得有人保护他才是。

这个印象一直持续了很久。

后来有一回我们俩作彻夜谈，他脱了衣服洗澡，我才猛然发现这个家伙体形殊异，肩阔、背厚、腰细，脖颈结实得像牛的项子，还长了两条足球运动员一样的粗壮结实的腿，浑身上下，一身的喊肉，形体匀称而结实，有点像那个轰动一时的出演《第一滴血》的电影演员。

我心说这家伙骗得我好苦，以为是一苗瘦人，却是个准兰博。

那天我疑心地望着面前这个年轻的像个大小孩似的制片人，跟他一边

握手一边寒暄，发现他不光是个大小孩，还是个生性腼腆的人。

从他脸上多少有点不好意思的孩子气的笑容中，可以隐约感觉到他的稳健持重和有所保留，从而知道这是一个天性纯良少年老成性格内向的人，绝不会轻易地对任何人任何事轻易下结论，也绝不会轻易地否定一个人或是轻易地肯定一个人。

后来我知道他是北师大人的子弟，从小便中了书的毒，耳濡目染的都是为人师长的清雅脱俗的谈吐和学子恭敬纯良的仪表，读书自然也读得好，一时的兴之所至，误入人大新闻系首届电视新闻专业，毕业后又错上中央电视台的“贼船”，以至使中国的高等学府中少了一位读万卷书吃粉笔灰的诲人不倦的年轻夫子。

当然，这只是几句玩笑话。

事实上李风热爱新闻如同热爱自己的生命，之所以报考人大新闻系，便是出于这种天然的热爱，正如爱因斯坦所讲，爱好胜过责任感。

不论从冷静还是多思，敏感还是怀疑，任何一方面的素质，都注定了李风天生就是个干新闻的坯子。许多同事包括笔者在内，都不止一次地批评过干工作玩命的李风——你干吗那么累？有些事干吗不可以让别人去干？你自己歇一会？找工夫干点自己的私事，至少也玩一玩，闹一闹，工作可是永远干不完的！

寻常说时，李风只是个笑，有一回我又说他，说得他急了眼，才跟我说了自己的心里话，他神情像个大小孩似的冲我笑着说，说着笑着：你不觉得我是个干新闻的料吗？新闻人是不会轻易相信什么的，得要证实了才相信，跟你们作家不一样，这份冷静我天生就有。我觉得我这人天生就是干新闻的料，你觉得我干得挺累，可我不认为这叫累，因为我喜欢。因为我在干我喜欢的事，干自己喜欢干的事，你说那还能叫累吗？你不让我干我喜欢的事，那才真叫我觉得累。我这一辈子活得肯定不累不亏，有些人一辈子干自己不爱干的事，那才叫亏，那才叫累呢！

除了认同，自然无话可说，做新闻的原本和写作的差不了许多，有些人以为当作家苦得要命，累得贼死，可许多作家却偏偏喜欢这样。以我为例，几天不写，手心痒痒，几月不写，心里惶惶，跟屁眼里憋着一个蛋的老母鸡也似坐卧不安。

有一个小小的插曲也足以证明这一点，认识他以后我们曾一起去淮河，与某地方长官谈话，地方长官之舌，可谓如笙似簧，三吹两哨便煽惑得我信以为真。

李风却冷静得像个局外人。

过后李风笑我说：你们这些作家真是好哄，我们搞新闻的要是都像你们作家这样爱动感情，人家说什么信什么，那里还能搞出什么好新闻来？

最终事实证明李风是对的。

那天人家确实是欺我什么也不懂，又爱轻信，在那儿像哄小孩似的信口雌黄地糊弄我，真个和玩闹似的，一见面就架起锅子来随心所欲地涮我吃我，而我一边让人家涮我吃我，一边还怕汤不够宽，火不够旺，猛给人家往锅子里添鸡汤加木炭。

当然，这是后话，在后边的章节里我还会详细写到。

认识李风后，我觉得李风的笑是很有意思的，很值得研究一番。

我发现李风在不笑的情形下，每每就喜欢皱着个眉，环抱着一双手臂，

自己拥抱着自己，放平着一张脸子，眨巴着两只小眼睛，有时做思索状，有时做苦恼状，有时做若无其事状，有时则做深沉状，严肃状，成熟状，于是就像个大人了。

真的好像是一株树，无风时便静默着一份独立的自己，有风时便婆娑出许多别人的姿态。独立的自己是恒久的真，便顽强地固守着，像那些结实的枝条；别人的姿态是暂时的假，就随意抛掷着，似那些乍绿还黄的叶片。

只有真正发自内心的笑起来时，李风才会显得无所顾忌，才是个天地无垢心无垢的纯良少年或日烂漫着天真的大小孩，这时的李风才是最可爱的。

有时李风的笑会让你觉得他心事重重的，有时又会让你觉得他的笑很是尴尬很是无奈，那一定是他遇到了什么烦心的事，碰到了什么让他心烦的人。

当李风投入工作的时候，他的笑容便会很职业化，便会省略成一个简单的情感符号，真心实意但却是很慎重很凝练的派送每一丝礼貌的微笑给需要它的人。

透过李风绿叶婆娑的笑，我发现了隐藏在叶片下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秘密，李风不是一个简单意义上的人，是一个表面随和，可骨子里却很原则的人，是一个天性纯良，感情丰富，头脑清楚，爱憎分明，甚至还有一点小小的固执己见的人。

风教会了树枝如何摆脱风的追杀，雨教会了树叶如何抛开雨的纠缠，雷电教会了树如何躲避雷电的轰击，社会和生活教会了李风如何保有自己独立的人格。

于是含蓄淡化了李风的微笑，微笑又含蓄了李风的个性。

正如悄静才会引出蜗牛的触角一样，只有真诚才能唤出李风真正的笑容，他那大小孩般诱人的微笑，原本就是让人无法拒绝的一种武器，可他却每每让它闲置在武器库里生锈，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感觉。

我和李风说起这种对他的感觉，李风顿时就又笑得像个大小孩了，在我的面前他是从来不加掩饰的，因为我们之间有了一种默契和信任。

最大的原因是我这个人从不说假话。

李风在我的眼里绝不是个完人，也是有缺点的，至少我可以这么说。

因为当我引李风为朋友时，我就开始努力寻找李风身上的缺点或曰毛病；我从不隐瞒，我这个人一向毛病很多，自然也无法容忍一个没有毛病的朋友。

以我寻微见著的本领，挑人的毛病，并不是什么难事。

老鼠拄木（牟秋）

似乎连人世间最正常最美好的人类情感的流露都是需要稍稍加以掩饰的，稍微具有一个人性的行为或是言行，也会招来嘲笑，正常情感的流露竟然也常常会被误解成一种做作的崇高，领会成一种不真实的功利主义的表露。

俗话说，老鼠拉木（牟秋），大头在后边。

当年李风一行，在采访黑洪两河之余，逆流而上，追根溯源，发现黑洪两河的上游河水已经严重污染，属于超五类，吃也吃不得，喝也喝不得，

连灌溉也有了问题。李风还发现，这一切都是因为上游的当地政府不注意防微杜渐，放任沿河的工业发展所致。这种上游污染下游，下游再污染下游的事，在当年这里的沿河地区已经屡屡发生，司空见惯，成为当地政府最头疼的一件事了。

然后李风一行每日驱车 300 公里，穷追到底，这一追可真是老鼠拉木（车秋），拉出个大问题。小黑河在坡张闸入了泥河，泥河入泉河，泉河入颍河，颍河入淮河，小洪河在新蔡的班台汇入大洪河，大洪河曲曲折折地也入了淮河的干流，这一追竟然追到了淮河，原来小黑河和小洪河都属于淮河的支流。

这是李风一行报道组所始料不及的。

在 1993 年 10 月 10 日 7 点“新闻联播”中华环保世纪行洪河启示录中，在这篇报道的开篇中，李风就明确提到洪河和淮河的关系。

李风站在与黑河相隔只有二里之遥的小洪河边，小洪河比小黑河水流充沛，河面宽阔，在天光云影之下，像一条红色的缎带，浩浩东流。

两岸靠近水面的河堤已经被染成红色，连河里的石头都是红色的。

李风穿一件花格汗衫，声情并茂地播报：本台中华环保世纪行报道组在河南中部进行采访时，遇到了一笔长期得不到清算的账，从西向东流入淮河的洪河，在舞阳舞钢两县市被小造纸厂的黑液污染，流到下游的西平上蔡等县时，已经成了这个样子。有关专家警告说，洪河很可以成为这一区域中的第二条黑河，从洪河的流域面积和人口来看，它所造成的损失将远远超过黑河。目前，洪河沿岸人民恶性肿瘤发病率已显示上升趋势，先天畸形和痴呆儿童也有所增加。污染使驻马店地区 40 年来花费 7000 多万元在洪河灌区兴修的水利设施全部报废，因不能用洪水灌溉造成农业减产，每年损失都在 1 亿元以上。

屏幕上出现李风做现场采访的镜头。

资料镜头之一：洪河灌区，所有的滴灌设施都闲置着生锈。

李风问一位水利局的干部：这些都不能用了吗？

瘦小的县水利干部，蹲在那里，神情激愤地说：咋不能用，这些设施都是好好的哩，是水不能用啦，水坏啦，这水里有烧碱，不浇还好些，多少能收成些，浇了水庄稼就被它一下烧死啦，农民们颗粒无收……

李风问：损失多少？

水利干部：光这些设施，就是 7000 多万元哩，这个不算，洪河沿岸每年因为不能浇水，农业减产，至少是这个数——

水利干部竖起一根食指，戳点着天空，天空上有烟云在流动。

李风：1000 万？

水利干部头摇得像拨浪鼓：1000 万就好了，是 1 个亿，这是连续好几年统计出的数字……

李风惊得张口结舌，半天才问：这种情形有多久了？

水利干部道：你说有多久了？都七八年啦！

李风默然无语，静默得面对脚下那条红色的河流，站成了一尊石像。

李风继续播报：小洪河的污染已经得到河南省人大、河南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但是这条河的污染已经持续了七八年，为什么到现在还得不到解决呢？逆流而上，我们找到了舞阳市和舞钢的主要污染源，造纸厂的废液就是这样一年四季不断地倾泻到洪河里的。据了解，舞阳、舞钢两县市在 1989

年以后，总共扩建和新建了五家小造纸厂，既没有按国家环保法规定，进行环境影响评价，配套治理污染的设施，也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属于非法生产。五个厂每年上交县财政不超过 1000 万元，只相当于给下游造成损失的 1/10，给下游人民带来的健康方面的损失，就更难以金钱来衡量了，这个账本来很容易算清楚。一个副省长也曾明确表态，要根治小洪河污染，必须关停相当一批污染源，损失自负。然而，五个污染源不但没有关闭，反而扩大了污染。

资料镜头之二：李风现场采访舞阳县县长，那是个中年人：关一个厂子不仅仅是一个厂子的问题，整个县里的财政运行都会受到很大影响，如果这几个厂一停，我们全县的教育、医疗、卫生和别的什么的，都会遇到严重的大问题……

资料镜头之三：舞钢市负责人之一，一位富态的中年人：嗯，按道理讲，应该停下来进行治疗，但是现在纸厂达到这样一个规模，嗯，要是让纸厂马上停下来，恐怕造成的这个影响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如果工人失业，没有活干，造成社会不安定，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最后，李风以慷慨激昂的反问句结束了本次报道：保住县财政的收入固然重要，工人的饭碗也不能打碎，可是洪河沿岸百万群众的幸福和社会的稳定就可以置之脑后吗？这笔账应该有个结果了。这是本台报道的。

李风的新闻确实做得很结实很地道，像一个填满确凿事实和不可辩驳道理的炸药包，很可以震聋发聩，惊功利主义的好梦，醒实用主义的昏眼。

在这样一个功利的实用的拜金主义的有病的年代里，地方政府每每着眼于短期行为，企业家又每每邀宠于上司，不辜负于地方，为了自己的好活，不顾沿岸百姓的死活，一边是在桑那浴按摩宫酒池肉林里浸泡着肥白的肉体和高贵的灵魂，一边是在污泥浊水中苦苦呻吟着的槛楼的肉体 and 卑微的灵魂。

有些地方的领导人，连上边的话也敢当耳旁风，眼里只有地方，没有中央，只有具体，没有全面，老子天下第一，我行我素，其奈我何，甚至公然对抗政府，明目张胆地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真是胆大妄为得可以，狂妄自大得不正常。

更有甚者，似乎连人世间最正常最美好的人类情感的流露都是需要稍稍加以掩饰的，稍微具有一个人性的行为或是言行，也会招来嘲笑，正常情感的流露竟然也常常会被误解成一种做作的崇高，领会成一种不切实际的功利主义的表露。

正常的反常了，反常的正常了，这真是一种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社会现象。

毫无疑问，这是中国的一个大悲哀，也是时代的一个大尴尬。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河污水向东流。

额头上的保险柜

李风很骄傲地笑说：下回要是再拍编辑部的故事，可以让他们到这里来拍，我们这里可是个真正的编辑部，这里发生的故事，真是太多了！

我很想这样问他：存放故事的保险柜在哪里呢？

说煌煌书卷之气已经不幸熏入了李风的骨头，温文尔雅的作派已经植根于他的肌肤，似乎一点也算不上夸张。这种深入骨髓的先天的影响和后天

的教养，使李风总是在忙于做好工作，忙于与人为善。具体表现为，他在熟人和同事尤其是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面前，总是表现出一种过分的礼貌和过分的细心，生怕稍有不慎便害了别人，这种过分的礼貌和周到，额外耗费了他许多精神，使他活得很不轻松。

不论是来自记者们的求援，还是来自外边的朋友的求助，李风都会认真地满腔热忱地予以帮助，不辞劳苦，一遍一遍地为其出谋划策，一次又一次地苦口婆心地启发诱导，想方设法为其排忧解难。至少也会耐心细致地听完对方的话。

这种孜孜以求诲人不倦的工作态度或日人生宗旨，委实让人既钦佩又觉得有点儿不可思议。至少我认为这样做实在有些过分，可以称之为李风的缺点了。

“新闻 30 分”流传着有关李风本人这样几则笑话。

“新闻 30 分”经常加班加点，按时吃不到饭更是常事。一日李风加班后与大家一起吃饭，刚拿起筷子李风的电话就响了，李风只好放下筷子接电话，先是客套一番，然后切入正题，听对方讲话。

对方的话不知何以有那么长，李风自始至终都嗯嗯嗯的有礼貌地应答着。

对话总算说完了问题，轮到李风谈自己的看法，谈完了怕对方有意见，就接着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

李风做完工作，觉得该收线了。

可对方又开始反法和质疑，李风无奈，只好继续诲人不倦。

李风将电话贴在脸上讲话，久了手腕发酸，脸部发麻，桌上几盘菜在众人的大力扫荡下已经风卷残云，眼看快要见底，肚子里又在咕咕乱叫。

李风不免就有些焦急，却又不好意思随便几句话打发了对方，于是就笑说：

哎呀，您能不能过一会，等一下再打过来，我听电话听得太久了，这半边脸都麻得受不了啦，您让我休息一下好吗！

总算收了线，再看桌上，已经杯盘狼藉，没什么可吃的了。

还有一回，一名记者拍了一条不到位的新闻，李风甚为不满，便打电话和记者细聊，李风做事做人的原则是从来不强加于人，纵然不满意也只是和对方讨论，怕态度生硬伤害了对方。

所以李风便曲意迂回一番，举了很多别的例子，以此来点醒对方，对方喏喏连声的，似乎是听懂了的样子，至少连身旁的那个同事也听出了李风的意思。

李风自己也觉得说得够明白的，该说的差不多都说了，只要对方按他点出的地方法稍稍一改，这篇新闻便大功告成了。

李风就结束道：明白了吧？

对方说：明白啦！

李风说：明白了就改呗！

对方似乎吃了一惊，反问道：那你说怎么改？！

李风听了，不怒反笑，问：我说了这半天，你怎么还不明白？

对方振振有词道：你说的都是别的事，没说我的稿子该怎么改呀！

李风过后又笑又气地和人们说：你们看，我说了半天，愣是不明白！

一时在“新闻 30 分”传为笑谈，人们都笑说：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吗？

说那么细干什么吗？自己的工作让他自己干不就得了，反正他要是没本事，完不成一个 A 八个 B，你就可以扣他的工资，费那么多神干吗？要不就简单点，他要问你，你就干脆来个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管他受得了受不了，不就结了吗！

我向李风也表达过这层意思，他却大摇其头，说：要那样，就不是我了！

李风越是对自己看重的或是相熟的记者，越是不客气，对他们的稿子，要求更是严格，直来直去，刺刀见红，一谈就往要害上谈。

对有些自尊心强的记者，李风就要委婉得多，怕伤害了他们。李风有时候也是很尖刻的，好几回把几个记者小姑娘骂哭了，骂哭了李风就觉得后悔，就赶紧设法去哄她们高兴，说：唉，别哭了，哭个什么劲呀，等会我给你买冰棍吃！

一个 A 八个 B 是“新闻 30 分”的术语，一个 A 代表一篇深度报道，八个 B 代表八条简短消息，每个记者每个月必须完成一个 A 八个 B 的任务，完不成是要扣发工资的，可想而知记者要是完不成任务，会是一副什么沮丧的样子。

在对待工作上，对待稿件的质量上，李风从不通融，绝不客气，一视同仁，真有点一夫把关，万夫莫开，要想过李风这关，必须拿好作品来。

但李风有时却会不遗余力地帮助记者们完成任务，这说明李风与人为善和心地善良，也表明了他性格上的双重性。

我其实很欣赏李风这种对人的尊重态度和不遗余力帮助别人的做法，可我也赞成大家的说法：对有些人，你总这么着帮他们，要是苦累自己也不是个事，他自己不行，你帮他也不行，你总不能这么着帮人家一辈子吧？

李风默然，似乎有所触动，眼神里有几分怜惜，也有几丝无奈。

我和李风最初见面时，是在京信宾馆三层的一间客房里，而“新闻 30 分”的大本营便在我的楼下。我很失望地发现这里似乎没有存放秘密文件或是什么内幕新闻的保险柜，占了整整半层楼的“新闻 30 分”的大本营，竟是上百平方米一座大厅，甚至连一堵隔墙也没有，除了长长的过道之外，摆满了一个单元接一个单元的办公桌。

除了李风的办公室装了通天彻地的大玻璃并挂了百叶窗，整个大厅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谁谁谁在做什么，某某某来了没有，李风站在室里，或是随便站在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一览无遗，有点像部电影的片名：罗马，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李风很骄傲地笑说：下回要是再拍编辑部的故事，可以让他们到这里来拍，我们这里可是个真正的编辑部，这里发生的故事，真是太多了！

我很想这样问他：存放故事的保险柜在哪里呢？

且看那些梁山好汉们

且看今日之中国，谁是真正的上帝？既非佛

菩萨也不是救世主更不是人民群众，而是财富的

渊藪，是红了眼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大杂

烩。

新闻联播过后，李风仍然悲愁难捺，方兴未艾。

在 1993 年 11 月 23 日《中国电视报》第 47 期·第 12 版“热点纪实·热点特写”栏，以整版的篇幅推出了李风撰写的一篇热力四射的题为《把根留

住》的重磅文章。编前按语这样写道：

本台“中华环保世纪行”采访组在河南的14天里，以日行300公里，每天采拍14小时的紧张节奏完成了这次报道任务。从污染受害区，到造成污染的地方，我们的时空被无情地压扁揉碎，我们的心时时刻刻体验着情感的错位，情与法的冲突，光荣与耻辱的相悖与离奇的统一所带来的剧烈的纠葛。那些畸形的儿童，垂泪的老太，愤怒的青年，唇枪舌战的两地政府，还有冷漠的污染肇事者，充满矛盾的两位“功臣”……他们身上放射着发人深思的灵光。

这一篇采访纪实，比“新闻联播”播出的三条电视新闻更加内容翔实生动，更加有理有据，情事并茂，血泪进流，通篇不著一字华彩，却如同一柄名副其实，锋芒内敛，可以伤人于无形的，以科学的论据和生命的热力铸造的碧血宝剑。

五年前的电视新闻播完便已经归档入库，不可能再播一回。

可是这篇五年前发表的文章墨香依旧，可以用来唤取过去，印证现在，留此永久为淮河的往昔存证——借以昭彰日月，昌明历史，彪炳社会——将一干现在时生发出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以及旧事与新事，好好坏坏，是非曲直，咸言淡语，原原本本地昭告于未来时淮河的子子孙孙们。

以便将来守着淮河没水喝的啼饥泣寒的儿孙们，揪住那些曾经作孽的先人们的小辫子，如那些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控诉万恶的旧社会一样，押他们上历史的审判台声讨控诉，让那些吃子孙饭造子孙孽的先人们，在九泉之下都得不到片刻安宁。

那时你们干吗不听人劝？干吗要鼠目寸光？干吗要为芝麻绿豆大一只纱帽翅而邀宠于上司而辜负于地方呢？干吗要贪图眼面前那一点蝇头微利，而不惜毁弃子子孙孙最长远的也是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呢？你们悔了吗？

与其到那时悔之晚矣，不如现在就防微杜渐！！

时过五年之久，这篇文章让人读来仍然如同隔日，仍然可以撼人魂魄，感人至诚，发人深思，仍然有冰水和醒甜的双重效用，可以醒世人杀鸡取卵的昏眼，安社会竭泽而渔的浮躁。且看今日之中国，谁是真正的上帝？既非佛菩萨也不是救世主更不是人民群众，而是财富的渊藪，是红了眼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大杂烩。

为了让那些现在还活着的造孽的先人们，有一天悔恨的连肝和肠子都发青发黑，寸寸皆断，碎成片片，特将这篇文章在这里据实照录如下，以飨读者。

把根留住

——黑河的呼唤

一条杀人河

16年议而不决，杀出一匹黑马

早年间，河南省上蔡县曾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黑河两岸，小鱼当饭。”

自从70年代初漯河市第一造纸厂投产以后，黑河就开始一天天变黑变臭。现在黑河，人一挨上就起大疙瘩，一挠就化脓生疮，喝了河水的畜禽更是在劫难逃，河里鱼虾绝迹，却成了蚊蝇孳生地，自然界以其固有的规律对人类的行为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在西洪乡，黑河从一个名为车张的小村庄中间穿过，村里人说，解放以来消灭多年的疾病传染病1984年以来不明原因地流行了好几次，更有许多中年人死于癌症，仅从今年春节到现在就已经死

了4人，记者在一座低矮、简陋的农舍前见到一个全身赤裸的6岁男孩，四肢严重畸形，表情木然。孩子的父母是一对普通农民，既不是近亲，也没有遗传病史，可是他们惟一的儿子生来就畸形而且弱智。为了治好儿子的病，小两口节衣缩食，四处借钱，已花了3000多块，儿子还是成了个废人，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村支书说，这样的孩子村里有好几人。

河南医科大学预防医学系环卫教研室主任刘华莲教授为我们提供的调查报告揭示出了一连串惊人的事实：黑河沿岸人群的死亡率比一般水平高出1/3以上，其中恶性肿瘤死亡率高出一倍以上。人群的健康状况普遍下降，每3个人就有2个肝肿大，每10个儿童就有9个肝不正常！人们的神经行为功能、免疫水平等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更令人忧虑的是：黑河岸边约有6%的新生畸形儿，还有一些小生命来不及出世就已胎死腹中。河水污染已导致遗传基因的突变！

虽然黑河的污染问题已经成为河南省人大会议连续16年的议题，要求省政府和漯河市采取果断措施治住污染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可黑河却变得越发名副其实了。

1984年9月，漯河市曾把黑河污染列为政府要解决的20件事之一，据介绍，从1985年底至今，漯河全市的经济产值已提高了两倍，而排入黑河的污水从每天6万多立方米增至8万多立方米。可以说漯河市几年来治理污染功不可没。但是现在河水中污染物浓度比8年前要高得多。而且黑河底泥中沉积了大量有害物质，所以黑河污染从总体上说还是在日益加重。

黑河污染尚未解决，在同一地区又杀出了一匹“黑马”，再次掀起轩然大波。

“黑马” 洪河，后宗居上
一段重复的故事
多少辛酸向谁诉

说来也巧，记者到上蔡采访时，县领导并没有急着领我们看黑河，而是先带着我们来到离黑河仅几华里之遥的洪河边。河水的颜色比醋要更深一些，而且气味令人作呕。

洪河由西向东注入淮河，流经河南省南阳、平顶山、漯河和驻马店等4个地区，是一条比黑河更长、流域面积更广的河流。1987年以后，隶属于漯河市的舞阳县先后扩建和新建了3家万吨级小造纸厂，粘稠墨黑的造纸废液带着刺鼻的怪味汨汨涌进了洪河。这一行为激起了相邻的舞钢市以及下游的西平、上蔡等县的强烈不满。当黑河问题在河南省人大会议上曝光10年之后，洪河被污染的问题又成为代表们议论的新焦点。

如果说黑河中的污染物在十几年中是缓慢增长的话，洪河里的污染物则像海啸一样狂涨。记者在洪河沿岸所到之处，群众都争相控诉。在上蔡县西洪乡陈桥村，记者被引入村支书陈保老汉的家。陈家距洪河村仅二三十米，院里的井轧出的全是浑水。陈家长孙已近2岁，连哭都不会，两眼歪斜，舌头半吐，不能行动，是个典型的痴呆。据说孩子出世7天，家里人就发现不对劲，县、地区医院都跑到了，钱花了1000多，可药只开出一元钱的。大夫们见了孩子只是摇头，爱莫能助。孩子的奶奶拉着记者的手伤心垂泪道：“这孩子将来肯定不会说话。不能走，可叫我们咋办啊？”陈保则忿忿地说：“近几年，村里的畸形。痴呆儿已达9例，还有9个中年人死于癌症，大牲畜不明原因地死了30多头，这都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当记者问及是否要索

赔，憨厚的老汉说：“这是政府决定的事。损失这么大，最好能给点赔偿。”

西平、上蔡两县政府则明确要求上游立即关停污染企业，并给下游以赔偿。可以想象，以几家企业每年区区几百万元的利润，不要说赔偿，就是全部拿来治理污染都不够。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环境的账只能越积越多，直至摧毁当地的自然生态。

误区在哪里

一个没有自来水的春节

洛阳纸贵的奥秘

河南是农业大省，自然环境是大多数河南人的饭碗。对此，省主要领导始终有清醒的认识。

为了治理洪河污染，河南省原省长程维高责成原副省长刘源解决此事。刘源同志亲临现场解决问题，并先后两次明确批示：“只有关停一批污染源，才能根治污染，关闭工厂造成的损失自负。”可是批示已3年，领导已换届，这些污染源不但没有停产治理，反而顶着“压力”扩大了生产规模，污染也相应增加。这些新的建设行为既没有依照“国家环保法”的规定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也没有实行环保与生产设施同时设计、施工、投产的“三同时”制度，受到了省建设项目“三同时检查办公室”的通报批评，但仅仅是批评已经丝毫不起作用。漯河市一位主要领导对我们交底说：“在我们这，经济发展是硬任务。”言外之意，环境保护则是软指标。

新任舞阳县县长为县里3家纸厂继续生产辩解说：“纸厂停下来，我们的政权运行都会受到威胁，县里的医疗、教育等公益事业也会受到影响。”

舞钢市一领导强调：“纸厂关闭，工人失业，会影响社会稳定。”市政府一位领导抑制不住激动，质问记者道：“你说我们违反环保法，难道我们政府每天的任务只是搞环境保护吗？我们要遵守的法还多着呢！如果你们到其他地方看看他们的小造纸厂，相信能做出公正的判断。”

的确，80年代，河南省许多地方把当地丰富的麦草用来造纸，这曾经被认为是扬己之长，启动农村工业的捷径，河南出产的包装纸、印刷纸、卫生纸等品种的纸张，在南方有不小的市场，有的甚至远销海外。于是一些地区县里办、乡镇办，村里也办，纸厂林立，造纸产生的废液则随便排放，从农耕经济中脱身办厂的人们习惯地认为：环境有着极大的容量和无限的自净能力，一时间，省内众多的河流成了大大小小造纸厂的排放沟。有时大水不免冲了龙王庙。

1990年春节前夕，漯河市家家户户正在洗着过年的鸡鸭鱼肉，水龙头里忽然涌出带着刺激味的黑水，原来是漯河市饮水水源沙河的支流被污染了。

在其他一些地区，由于乡与乡、县与县之间相互污染，百姓有苦说不出，只好相安无事。恰如一位省领导给省城建环保部门的批示中指出的：“这类问题太多了，关键是缺少治本的新观念、新认识，其次是资金和科学办法。”

据知情者说，河南生产的纸在沿海好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南方一些地区不允许小造纸等重污染企业开工，例如以富裕而闻名全国的广东省顺德县，就宁可花大价钱从外地进纸，也不愿污染自己的环境，因为这样可以避免花更多的钱去治理污染和保持身体健康。

听了这一番话，记者不禁想起了这次采访中被当地人视为功臣的两位企业家。

荣誉乎？耻辱乎？

没脸回家乡的人民代表

环保战士与污染者的神奇错位

韩国忠，漯河市第一造纸厂厂长，市人大副主任。韩厂长本是河南项城县人，他的家乡有一条名叫泥河的小河，小时候他经常下河摸鱼、洗澡、涓涓清流给了他多少童年欢乐的记忆，光阴如梭，年已 50 开外的韩国忠如今的漯河第一造纸厂是国家级企业，各项经济指标居全国同行业第 3 位，每年上缴漯河市财政 1000 多万元。他的工作成绩获得了人民的肯定，于是先当选市人大代表，继而成为人大副主任，得到了似乎应得的荣誉。

然而正是漯河市第一造纸厂，对黑河的污染负有主要责任，而这条黑河流经下游的项城县时就叫做泥河。

黑河污染激起民愤已历时 16 载，韩国忠对此非常清楚，两年前，他回家乡一趟，丝毫没有感到衣锦还乡的骄傲。久别重逢的乡亲故友，没有亲切的话语，只是不断地问他，这污染什么时候能治住，这泥河什么时候能再变清。

我们见到的韩国忠，是一位个子不高，身体结实，质朴中透着机敏的汉子，在厂子的一角正在兴建集中制浆和碱回收等治理废液的巨大装置前，他诚恳地对我们说，对漯河市来讲，我是人民的功臣；但反过来讲，我又是人民的罪人，每年有七八千吨碱要流下去，更有许多对人民有害的东西污染了下游。我是没有脸再回自己的家乡啊！所以决心要治好污染，对家乡父老有个交代。

公正地说，韩厂长这个决心下得不易。因为一下子拿了 4000 多万元来治污染，上至市领导下到全厂职工必须一同下这个决心。有谁能保证漯河的人们对他的功罪观都有一致的看法呢？因为韩国忠本人就是一个矛盾。

另一位颇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叫孙海明，舞钢市第一造纸厂厂长、市政协的副主席。

舞钢市第一造纸厂是洪河的主要污染源之一。从建厂之初就一直受到市环保局的反对和限制。这位厂长在此之前，正是市环保局副局长。由于这种背景，我们与孙厂长的会见不免令他有些许的尴尬。

孙海明向我们介绍说：3 年前，舞钢市迫于上级某领导的压力，在对造纸废液毫无处理能力的情况下，一下办起 3 家小造纸厂。当时担任市环保局副局长的孙海明提出了几条折衷意见，但均未被采纳。不久，孙海明被调离环保局，到一个仅有十几个人的濒于倒闭的乡办小厂当厂长，名为“挂职锻炼”。在这个位置上，海明显示出他的精明与经营才能。于是在市领导的殷切期望下，他在市第一造纸厂经济环境效益双双不利之时受命出任厂长。

俗话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曲。”孙海明当了工厂的总管，并没有被从前的角色捆住手脚，反而在市环保局一直把着不批的纸厂扩建项目上，获得了纸厂申请贷款所需由市环保局出具的证明。为了企业，孙海明可谓殚精竭虑，终于使第一造纸厂成为一个市经济效益最好的企业。就在我们到来前不久孙海明光荣地成为市政协副主席。

从环保战士到环境污染者，从挂职锻炼者，到市政协副主席多么神奇的错位。

当我们告别舞钢市时，孙海明显得十分激动；他拉着记者的手大声说，千万要笔下留情，现在这两个纸厂是舞钢市的支柱企业。如果纸厂关掉，舞

钢市这届政府就得下台，请相信我，我是懂环保的，在治理污染问题上，我们正在做最大的努力。

正因为孙海明对这一切太了解了。所以在他的。心中，荣誉是否同时意味着痛苦和耻辱呢。就在我们看孙海明办公室里挂满一墙的奖状时，听到他在一旁若有所思地低声说，你们拍完了，我也就该把他们摘下去了。

把根留住

春天会寂静吗？

两个不同含意的把根留住

多少岁月，中华民族一直在圆着一个未竟的乐土之梦。

当中原大地上的人们刚刚从土地上吊起头来，见到的是沿海地区天文数字一样的经济收入，不禁有搭上末班车的感觉。

饥不择食，慌不择路。河南已经成为全国小型造纸行业污染最重的省份。然而我们的一些基层干部竟连环境保护的基本常识都没有，甚至还有人认为只要是经济上去了，即使违反环境保护法，也可以免于追究法律责任。当我们回首本世纪 60 年代初期，美国女海洋生物学家 R 卡逊出版的全世界第一部环境保护专题著作《寂静的春天》时，也曾遭到百万社会许多人的攻击。但环境污染毕竟在每个人身边发生，工业污染、农药在食品中的残留、植被破坏、土地沙化与流失、气候变坏、大干旱与大洪水、疾病流行……对环境采取保护的态度，还是继续进行掠夺性利用，这已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不可回避的选择。

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已经给环境带来了极大的压力，环境是我们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根，如果稍有疏忽，它将遭受严重破坏，我们的乐土之梦何以能圆？

令人欣慰的是，一份治理黑河的计划已经公之于众，漯河市将投资 4187 万元为市内 3 大纸厂建设集中制浆工程以便于集中回收制浆废液中的主要成分——碱，以减少污染，提高资源利用率。

然而，洪河的污染者又如何说呢？

把根留住！一位洪河污染者劝记者不要要求关闭他的厂子时说的。

把根留住！这也是记者送给所有破坏环境者的一句忠告。

十五、永远的怀念

老而弥辣的潘晓峰

东西南北的人都喜欢它，达官贵人庶民百姓
都离不了它。南方人拿它调味，山东人拿它当菜。
煎炒烹炸不能没有它，葱花儿烙饼煎鸡蛋没有人
不爱吃，切了细细的葱末儿与细盐一道拌，滚油
一泼，拿来调面下饭，喷香。

老潘的真名叫潘晓峰，安徽省安庆市人氏，现年 51 岁，是至今为止“新闻 30 分”采编人员中序齿最大的一个，所以大家都叫他老潘。老潘很有事业心，他来“新闻 30 分”之前，是安庆电视台的副台长，在当地也算是一

个呼风唤雨的人物，可他竟舍得下妻子儿女和地方上的许多的好处，跑到“新闻 30 分”来当一名普通记者。

老潘属于那种老而弥辣的族类，这一族类首推辣椒其次便是葱、姜、蒜。

老潘不属于辣椒，因为辣椒只是辣，辣得直截了当，辣得全无味道。当然也不属于老姜和老蒜，老姜和老蒜虽然都是调味的高手，但前者辛而后者熏，老姜者非寒不食，容易上火；老蒜者吃后便须独处，非得嚼食一撮茶叶，方可去了蒜臭。

老潘属于老葱一类，很不起眼地长在地里，冻不死也晒不死，干了外皮里边还鲜活着自己，打春时随便往土里一插，照样能活。说它辣它也辣，说它不辣它也不辣。正如俗语所说的，辣椒辣喉，大蒜辣口，大葱辣心。不喜欢吃辣椒的有之，不喜欢食姜的有之，不喜欢嚼蒜的也有之，但不喜欢炒菜放葱的人却很少。

东西南北的人都喜欢它，达官贵人庶民百姓都离不开它。南方人拿它调味，山东人拿它当菜。煎炒烹炸不能没有它，葱花儿烙饼煎鸡蛋没有人不爱吃，切了细细的葱末儿与细盐一道拌，滚油一泼，拿来调面下饭，喷香。

我印象里的老潘，就是这样一棵老葱。

如果说李风是因为 1993 年中华环保世纪行与淮河结下不解之缘的，那么生于长江边从小吃长江水长大的老潘，早先只是从李风 1993 年所做的那三条对小黑河与小洪河的报道中，才真正了解到淮河流域的污染问题。

安庆属长江流域，离安徽境内的淮河流域尚有 300 公里的路程，老潘从安庆一蹦子跳到北京，进入“新闻 30 分”的第一件事，就是接着做李风已经开头，但路漫漫其修远兮，一时半会也做不完的有关淮河流域污染问题的报道。

什么时候才算做完呢？李风说，淮河一日不清，报道一日不停。

老潘走来时，正是中央电视台改版之时，也是“新闻 30 分”的草创之初。

李风荣膺重任，领着从新闻部分出的八个人，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如期在中央电视台的荧屏上亮出了“新闻 30 分”的牌子。

用李风自己的话来说：当年真是逼上梁山，名副其实是个草头王，只有七八个人来八九条枪，为了如期完成台里规定的播出任务，可是玩儿了命啦！

现在的“新闻 30 分”，已经搬入了京信大厦的二楼，今非昔比，早已鸟枪换炮，人强马壮，盔明甲亮，使的都是清一色的长短“武器”，记者们能打会拼，摄像们奋勇争先。这批现在已经在“新闻 30 分”崭露头角的新闻人，悉是来自各省市电视台和各地报社乃至社会各界的精英，都是在江湖中历练过一番的好汉，独标一枝，各有所长。更为可贵的是，在单兵作战时，个个都能独挡一面，协同作战时，人人都甘当马前卒，是一支军容整肃号令严明个人素质很高的可以打硬仗的队伍。

如果用拳击打比方，“新闻联播”是打场次的，“新闻 30 分”是打点数的。

短、平、快是“新闻 30 分”外在的风格，稳、准、狠才是它真正的特色。

淮河行动不仅体现了这两个风格特色，还正式推出了一种新打法，那

就是利用短、平、快的风格和稳、准、狠的特色，打立体新闻式的组合拳。

组合拳“新闻 30 分”以前也曾经不止一次打过，但因为经验不足，所以打得稍欠火候，淮河行动一举克服了以前的一些不足，得心应手漂漂亮亮打了一个场次。

安徽阜阳造纸厂弄虚作假

那天，督察组走入这家造纸厂时，厂里和车间空旷无人，往日繁闹的生产景象已如明日黄花，荡然无存，只有厂房中那些巨大的造纸的铁家伙缄默无言，冷漠地迎接督察组一行，似乎每一只齿轮每一个滚筒都轻蔑着不能诉说的诡诈。

从 1993 年小黑河和小洪河报道之后，李风曾在 1994 年 5 月间与国务委员宋健和国家环保局局长解振华一行，再访淮河，并再度播发了有关淮河流域小黑河小洪河治理情况的新闻报道，再次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1995 年李风忙于草创“新闻 30 分”，忙得屁滚尿流，无暇也无力抽身重访黑洪两河，奈何缘深难解，情系淮河，只好遥遥助力，梦缠魂绕而已。

冥冥之中似乎真有个神灵，要促成淮河的好事，急忙就送来个老潘。

老潘出现在“新闻 30 分”似乎早有规定情节，是专门来接李风的。

老潘起先来“新闻 30 分”，李风考虑到老潘年纪大，不适合在下边跑，就放在通联策划组，搞通联和策划。

老潘当时也并不知道李风便是当年小黑河和小洪河的报道者，在策划选题的过程中，老潘发现关于淮河污染的报道，还没有固定专门的记者去做。

老潘当即和通联组的组长唐国东说：国东，关于淮河污染这个事好像还没有重视起来，我觉得淮河污染这篇文章是可以大做的。

唐国东一听就说：哎，你想到的这个事情，李风早就说过，但是没有合适做这方面报道的记者，有些记者对这个问题兴趣不是很大，所以一直没有定下人来！

唐国东告诉老潘：李风就是当年那个报道小黑河和小洪河的记者！

老潘一听，大喜过望，说：哈，我是看过那几篇新闻报道的，拍得都是很不错的，真没想到就是咱们“新闻 30 分”的制片人李风！

老潘很兴奋，兴冲冲地跑去找李风，说：没想到你就是那个拍小黑河和小洪河的，咱们一定会谈得拢，我觉得有关淮河污染的报道，咱们应该好好抓一下！

李风听了正中下怀，乐不可支，马上拍板说：这可是好事，您可以下去看看！

正好国家环保局的督察组要下去检查淮河流域关于 19 家企业的关停情况和限制企业排污的事情，老潘就背一个简单的包，跟着下去了。

老潘是 7 月中旬下去的，一路检查下去，到了安徽省阜阳造纸厂。

阜阳造纸厂是阜阳市造纸行业中的污染大户，属 19 家大造纸关停企业之一。

那天，督察组走入这家造纸厂时，厂里和车间里空旷无人，往日繁闹的生产景象已如明日黄花，荡然无存，只有厂房中那些巨大的造纸的铁家伙们缄默无言，冷漠地迎接督察组一行，似乎每一只齿轮每一个滚筒都轻蔑着不能诉说的诡诈。

厂方告诉督察组说这家企业已经按国家的规定关停有两个多月了。

督察组对此结果自然很是满意，你让人家关停，人家已经关停，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呢？只能是说几句淡话走人。可老潘总觉得厂里有什么地方不对头，东走走西看看的，终于给老潘看出了一些破绽。

老潘不觉为自己的发现欢欣鼓舞，可脸上却淡漠着一份糊涂，当下也没多说什么，很平静很沉着地与督察组的同志们一起和颜悦色地告别了厂方。

临走时老潘笑眯眯地望着那几个喜形于色的厂方负责人，在心里冷笑一声，暗暗道：哼，你们几个也别高兴得太早了，你们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我老潘，看我老活下一回再来时，捉你个死的！

老潘是相当稳得住神的，他是大模大样地随督察组一起回京的。

老潘的意思是要那些心怀鬼胎的厂方放心大胆地干他们想干的事——瞅瞅，他们这种走马观花式的督察组，你们不是见得很多了吗？还不都是官样文章？还不都是些聋子和瞎子吗？只要你们稍许用一些心计，骗他们还不容易吗！

可是这一回经验主义害了他们，他们彻头彻尾地想错了。

老潘回京的当天，就找李风做了汇报，说可以做几方面的报道，一是关于小造纸厂的，一是关于大造纸 19 家企业在关停问题上阳奉阴违的。

李风当即就说：好呀，你发现的问题，就由你来做吧！

老潘是 7 月二十几号赶回北京的，又在 7 月底偕同摄像郭晓冰悄没声地出发，先坐飞机去了河南郑州，拍了一条河南加大力度治污的片子。

然后在 7 月 31 日又悄悄地潜回安徽阜阳市，悄悄地住下，美美的休息一夜又半天，一直等到下午 5 点钟才出动。

老潘，又捉了个死的

到了厂门口果然警卫不让进门，老潘亮出证件和警卫商量，人高马大的辽宁摄像师郭晓冰则乘机偷偷溜进厂子，真像打仗一样，一路狂奔，直奔生产车间，进得门去拿摄像机瞄准一个正在张牙舞爪旋转的蒸球，一抠扳机，突突的好一顿猛扫，霎时间子弹日日的乱飞，把几个开蒸球的人都打得慌了神，直问摄像你是干什么的？

老潘所以选择这个时候出击，是因为每天下午 5 点多钟，正是农民给造纸厂送草的时候。果然不出所料，通往阜阳造纸厂的路上，一派繁忙景象，人力车畜力车机动车，满载秸草，络绎不绝地开进阜阳造纸厂的大门。

老潘心知这一回真要提个死的，便拎着话筒拦住一辆满载秸草的车子现场采访，摄像师郭晓冰则围着那些送草的车子大拍特拍。

老潘问一个送草的农民：大爷，拉这么多稻草干什么呀？

大爷说：给造纸厂送去造纸的！

老潘问：多少钱一斤？

大爷就窃笑，以为这人没见识，说：这是论吨的！

老潘也不计较，一笑了之，迅速和摄像郭晓冰赶往厂门口。

按原定计划由老潘出面，缠住警卫，郭晓冰则冲进厂去抢拍一些镜头。

到了厂门口果然警卫不让进门，老潘亮出证件和警卫商量，人高马大的郭晓冰则乘机偷偷溜进厂子，真像打仗一样，一路狂奔，直奔生产车间，进得门去，拿摄像机瞄准一个正在张牙舞爪旋转的蒸球，一抠扳机，突突的

好一顿猛扫，霎时间子弹日日的乱飞，把几个开蒸球的人都打得慌了神，直问摄像你是干什么的？

老潘这当口也赶到，拎着话筒像拎着根哨棒，举着话筒一顿现场采访，把一只弄虚作假的活老虎，往死里好一顿痛打，等到有关领导闻风赶到，徒唤奈何，活老虎这时已经成了一只原形毕露的死老虎，变作了一只人人喊打的假老虎。

老潘得胜回朝，新闻编好在“午间新闻”一播，一则是表扬的，一则是批评的，真是有人欢喜有人忧，欢喜的自是欢喜，不用去说它。

批评的那一则新闻，在全国都产生了相当程度的震动，那个弄虚作假的造纸厂被强行停产，那个厂长当时根本没有把中央的三令五申当回事，以为政府又是在走过场，玩花活，做样子，厂子从没有停过一天工，只因为应付检查才停了产，等到督察组一走，觉得风声已过，就又大模大样，原封不动地让造纸厂运转起来。

那个厂长是从来不肯为别人想一想的，满脑袋的损人利己思想，以为污染别人是别人的事，只要自己的厂子得利，倒霉的爱谁是谁。

万没有想到中央政府这一回是下了大决心的，一点也不玩花活不留情面，自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应了这样一句老话，种玫瑰者得花，种蒺藜者得刺，恶果只能自食。没几天就很没面子地灰溜溜下了台，怕是悔得连肠子都青了。

当然，这是后话了。

与老潘相识后，我好奇地问老潘：你是怎么发现那家造纸厂弄虚作假的？

老潘操着浓重的安庆普通话告诉我说，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家已经被勒令关停的大造纸厂的蒸球车间里，那几只巨大的形如黑色地球仪也似的蒸球，并没有按照关停规定那样子落地，蒸球的表面摸着还是热的，运转蒸球的几个钢铁的齿轮表面的机油闪闪发亮，也留有明显的新近啮合过的锃亮的痕迹，说明它刚刚还在运转，而厂方却信誓旦旦地告诉督察组说，已经按规定关停了达两月之久了。你想想看，两个多月时间，那么走风漏气一个厂子，上面的灰尘也该落满了的，可它没有！

老潘笑模悠悠地对我说：所以，当时我就知道的，这回一定能捉个死的！

我以为老潘这件事之所以做得出色，至少得益于这样两点：一是深思熟虑，知己知彼，二是短平快，稳准狠，打了个时间差。

其实我这之前已经从李风那里知道，这样的行事方式或曰做事的原则，也是“新闻30分”自成立以来，众位记者弟兄们一以贯之的作风和特色，所以老潘成功的经验，也就是“新闻30分”几年来之所以成功的原因了。

只是，有了以上两点，老活如老葱般喷香有味的老辣，由此便体现得愈加鲜活生动，愈加翔实可人了。对老潘的兴趣我也像食葱族一般愈加的浓厚，相信老潘往下的故事也一定会越来越精彩，越来越具有揭秘的勇毅精神吧？

从此，老潘便与淮河结下了不解之缘。

十六、历史不会忘记

无法省略的过程

解振华局长是北大荒知青出身，整个人像北大荒的黑土地一样蕴藉深厚，思想的地力肥沃得一攥一把油，给人一种质朴而精明的感觉，工作起来从不知疲倦，作风扎实得像过了细箩的精苞米粉，清清爽爽，细细密密，不带一点渣子。

李风对老潘格外器重，大凡老潘有什么要求，应之惟恐不及，只要是和淮河治污沾点边儿的事情，李风都无一呼百诺，说什么应什么。

有制片人做坚实后盾，老潘自然也愈加来了精神头儿，有点像老农民种包产到户的自留地，上心下力地像伺弄自己的婆姨，只因情有独钟，吃苦受累也心甘情愿，兴趣越来越浓，倾注的心血和精力也愈来愈多。

从 1995 年到 1997 年淮河行动之前，三年时间，不论春夏秋冬酷暑严寒，有事没事，老潘都要像个地道的老农民一样，隔三岔五去淮河流域看看自己的自留地，看到淮河的水变清些，便舒心惬意的憨笑，晚上吃饭都能多吃两碗，嗅见槐店闸弥散熏人恶臭时便满肚皮的气，到晚上都心慌气促得睡不着觉。

短短几年，纵横四省沿淮广大地区 89 个城市，都留下了老潘的足迹。

1993 年起，中央电视台关于淮河污染问题的从未间断过的呼吁和报道，便是由李风发端，老潘为继，一直延续到淮河行动之前的。

1997 年，从沿淮污染地区风尘仆仆采点归来的老潘，正式向制片人李风提出了淮河报道的可行性建议，与李风的想法不谋而合，李风当即拍板，并会同“新闻 30 分”的有关人员，共同拟定出淮河报道的可行性计划和报告。

那几天“新闻 30 分”的制片人李风，大脑皮层处在极度的亢奋状态，为了让淮河报道的计划准确无误地落在实处，并得以如期实施，真可谓绞尽了脑汁。

淮河报道得偿李风多年前的夙愿，很让李风牵肝动肺，所以做事认真细心的李风，在运作这次行动时抱了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决心，对每一点潜在的会导致行动流产的危险和可能招致失败的因素，他都殚精竭虑，——考虑在内了。

为确保万无一失，李风希望首先得到国家环保局的支持。

老潘和李风先找了国家环保局的宣教司司长王耀先、副司长商慧。

商慧是一位 40 多岁的女同志，北师大中文系毕业，秀于外而慧于中，仪态端庄，言谈清越，表情恬静，举止得体而富有活力，办事果敢，从不拖泥带水。

商慧看了“新闻 30 分”有关淮河行动的报道计划之后，马上就掂出了这个计划内在的分量，当即就表示全力以赴的支持。

商慧副司长马上给解振华局长打了个请示报告，详细做了汇报，并在结尾提出请求，请解局长抽时间约见“新闻 30 分”的负责人李风等人。

商慧知道解局长是个大忙人，要是专门去找，往往是会扑空的。

但是这并没有难住商慧。

商慧知道解振华局长有个很有意思的工作习惯，每个星期，或是每过

一段时间，虽然没有个一定，但却有个共同的规律，只要局长秘书不再给解振华局长送材料批阅，解振华局长就会和小赵打个招呼，说：没事，我转转去！

然后便走出自己的办公室，在办公楼内推开一间一间办公室的门，有时司长开会，处长出外办事，只有几个一般工作人员在办公室，解局长也会毫不犹豫地走进门去，与之寒暄问暖，聊上几句工作，甚至谈上几句家常，神色间毫无一丝局座的疏傲怠慢。

解振华局长在环保局的口碑所以极好，一方面是因为他务实，踏踏实实干工作，另一方面，还得之于这种以平常心待人接物的极富人情味的民主作风。

解振华局长常对秘书讲，咱们局小门小户的，千万不要讲究排场，弄那些虚东西，要多办实事，光说不办不如不说。中国有许多事情，大家都在那儿说，可就是没有人去办，本来只要有人去办，一下就解决了，可就是没有人去做。所以我这个局长，可不是说嘴的，是要办实事的。

解振华局长办公有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从来都是只强调结果，不问过程，不论是哪一级干部，只要是解振华局长交办的事情，见面时总是先谈结果。有了结果再谈过程，没有结果，免谈过程。

解振华局长常说：一个廉价、高效的政府，要的就是办事效率，要的就是最终的结果，只有提高办事效率，缩短办事过程，才会节省人力物力，才谈得上廉价！

解每每这样问他的属下：事情办得怎么样？

属下正确的回答应该是：事情已经有了结果！

那就可以坐下来从容汇报了，如果答复是中性词，或是含含糊糊的，没有个结果，解就会皱眉，挥手打发来人出去，说：我不听你说什么过程，好坏你都得给我办出个结果来，好了当然好，不好我们再想办法，不能老是纠缠在过程中！

虽然做事情有一些无法省略的过程，但这个过程之树必须开花结果，哪怕是一个失败的果子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过程之树永远在开花，永远却不结果，让人们在一无所有的等待中耗尽时间和生命，这是任何一个人或是一个政府必须注意的。

解振华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转楼的过程，并不是为了转楼，更多的时候是在抽出时间，现场解决一些工作中急需解决的大小问题。局机关都知道解局长的这个特点，所以老早就把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留着，专门等解局长走来时，当场请他处理解决，久而久之，这已经形成了一个工作惯例。

以商慧的女性的直觉和敏感，觉得明天解局长很可能要来转楼，原因是解局长明大既没有会议安排，也没有出外的任务，所以商慧事先就给李风和老潘打了个电话，希望他们在家里等她的电话，说不定明天就可以和解局长当面谈谈。

商慧给李风和老潘打电话时，李风为内部的事和准备淮河行动报道的事，里里外外正忙得飞飞的，内心不无忧虑，担心计划流产。老潘却兴头得很，正和记者四组的组长吴光秋、周文几个人，在一起紧锣密鼓地商讨具体行动的每一个细节。

商慧这时的电话，无形中等于给李风和老潘等人打了一针兴奋剂。

李风和老潘都隐约地觉得，环保局感兴趣，这事八成能行。

商慧让自己一上午都待在办公室里，为了不放过任何一丝动静，有意让办公室的门大开着，睁大着两只明亮的眼睛，尖起两只秀气的耳朵，警惕地倾听着从楼道里传来的每一丝可能的动静，为了防止交臂错过，连上厕所也尽量避免，水也不肯多喝，尽职尽责，丝毫不敢苟且，像一个忠实的麦田守望者。

一上午解振华局长都没有来，时间一分一秒，安安静静地过去了。

商慧丝毫没有气馁，中午吃过饭，下午继续如法守候。

下午4点多钟时，突然有好事者通风报信，说是解局长转楼来了。

商慧立刻兴奋起来，马上给李风打电话，要他们马上过来，李风和老潘即刻就起身，可是一路上车水马龙，堵车，快到5点钟时还没有赶到环保局，而解局长眼看马上就要转来宣教司，急得商慧坐卧不宁，正急的当口，解局长却翩然而至。

商慧只好先拿工作问题拖住解局长，向解局长汇报起工作来，并说“新闻30分”的负责人李风和老潘，此时正在路上，即刻就到，请解局长一定要坐等。

解振华局长是北大荒知青出身，整个人像北大荒的黑土地一样蕴藉深厚，思想的地力肥沃得一攥一把油，给人一种质朴而精明的感觉，工作起来从不知疲倦，作风扎实得像过了细箩的精苞米粉，清清爽爽，细细密密，不带一点渣子。

对淮河报道的事，解振华之前已经有过赞同的批示，自然十分重视商慧所说的情况，于是偌大一个部级领导，竟然真的坐下来，耐心等候李风和老潘的到来。

这种平易近人，稳健持重的工作作风，让原本就有些不安负疚之情的商慧，也为之十分感动，于是善解人意的商慧，便胜任愉快地拿热茶和寒暄，对解局长好一番小心招呼，并努力找些有益有趣的话头聊着，为解局长助兴，以便让解局长不至于觉得时间过得太慢，等候的工夫太过长久。

李风和老潘后来知道这种情况后，也十分高兴，觉得这位部级领导，一点架子也不端，真是难得，国家环保局有这么个干实事的好局长，值得为其骄傲。

李风和老潘赶到时，已经快6点钟，当即表示了歉意，谈话马上进入正题。

解振华局长认真倾听完李风和老潘有关淮河行动的具体构想和汇报，很是为之高兴，当即表示大力支持，并认真地谈了许多自己的看法和设想。

在谈到如何与中央电视台做必要的沟通时，解振华局长当即决定，自己亲自出马，去和中央电视台的有关领导，洽谈有关淮河报道的一切事宜。

此后不久，解振华局长很快就约见并拜会了中央电视台主管新闻的副台长李东生先生。从某种特殊的含义上讲，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性的会面。

好一个李东生

李东生副台长意味深长地说：解局长，我们的记者有时候很认真，要是他们给你认真出一些事来，您这个当局长的到时候可得给我们记者撑腰呀！解振华局长毫不含糊地回答：万一真有什么事情，我们一定给记者们撑腰！

对李东生副台长这个人，笔者至今尚无缘结识，但关于他的故事，笔者却从记者们的嘴里，东鳞西爪，零零碎碎，听说了一些，这里择取要紧的讲几则出来，以便让我们中国的老百姓知道，在我们中央电视台，竟然还有这么个人物存在。

李东生，东北人氏，后举家迁河南平顶山，高中毕业，知青插队，专事修理地球，日日每每，面朝黄土背朝天。未几，恰逢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招生之际，东生有幸搭乘末班车，便从容放下锄头，拍拍满身尘土，摘去一头的高粱花子，打点行装，背起书包，赴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就读。

知青上学有如农民进城，自然倍感珍惜，故寒窗数载，虽然天天食大烩菜，啃冷馒头，却不堕青云之志，常常夜半就寝，闻鸡起舞，囊萤映雪，刺股悬梁，以十倍刻苦学习之精神，修练莘莘学子之身，以便他日做栋梁之用。

在校时，学子之态俨然，一米有八之身躯，于然独立，瘦削筋节，有天然之优势，故嗜好打篮球，往往于球场之中，纵横捭阖，上蹿下跳，十分活跃，故入校队为球员，在校常打场次，出外时有比赛。

以优异成绩毕业，分到中央电视台新闻部，住集体宿舍，跑时政新闻。

东生初来之时，正值中央电视台组织职工篮球比赛，东生不觉技痒，在球场找到组织负责人，要求参加球队。负责比赛之人，乃台里一位普通工作人员，当下便上下打量东生，瞅着东生身体单薄已有些面生，便大为轻而蔑之，操一口京片子，冷言冷语讥讽道：你这德行，还想打篮球？

如此无礼，令东生为之一怔，一时无言以答，急忙忍气吞声，以求保全。

东生来台之后，因其业务功底扎实，谦虚好学，兼之思维缜密敏捷，常有大思路大举措，连年工作成绩卓著。为人又古道热肠，言谈举止间有大将风范，故得领导赏识，始而为组长，继而为新闻采访部主任，又而晋升为新闻中心主任。

1993年中华环保世纪行，李风因为工作上的事情与东生发生了小小的争执，李风素来敬佩东生，东生也从来很欣赏李风。李风不知那天东生又累又烦，还按平素自己那副样子，嬉皮笑脸地和东生顶上了牛，东生心里一急就大发了一顿态度，让李风心里好不委屈。事过几日，一次聚会吃饭的时候，请东生参加。

东生走来，往桌前一站，就坦然的当着满桌记者的面，大声说：我这回来，首先向李风承认错误，那天的事是我做得不对，我向李风道歉！

迄今为止，每每说起这件事，都使李风为之感佩不已，认为仅此一例，便可以证明东生是一条敢作敢为有真性情的东北汉子。

还有一回，那是“新闻30分”过一周年的生日，请东生参加，东生西服革履，打着领带，走来刚刚坐下，就有几个记者小姑娘，上前去揪住西服革履的李东生，扯开他衣服的后脖领子，将一桶冰块，哗的倒进了李东生的衣服里，冰得李东生皱眉，逗得大家哄堂大笑。为保持端庄的仪表，东生索性不去掏，没事人一样，与大家交杯换盏，谈笑风生，任由那些冰块待在体内，靠自己的体温，慢慢融化它们，神态间颇有关羽刮骨疗毒的坦然自若，不能让人不佩服。

这样硬撑的结果，是当天晚上回去，东生就发起了高烧。

只是，玩归玩，闹归闹，改日记者们在台里送审片子，见了面，李东

生连个笑脸也不会多给谁，依然故我，照旧公事公办，不留私情。

这种一是一，二是二，桥归桥，路归路的做法，很见东生的为人和风格。

东生在新闻中心一年之后，晋升为中央电视台主管新闻的副台长。

于东生这一程来说，可谓春光无限，迤迤一路行来，真个如那山东的梁山好汉小穆春一般，前后都没个遮拦，一晃眼的工夫，便很是个人物了。

十年光景，那个当年一言冷语，便打发东生从球场滚蛋的人，却成了东生麾下一名不起眼的手下，每每思及当年之事，不免恨自己有眼无珠，何以当时没有善待那个表面看来不起眼的东生？私底里，便很有些忐忑不安之悔意。

兼之此事，台里台外，人人都晓得，一时传为掌故和笑谈。

此事细细听来，颇令笔者感慨，以为从这个事情中，很可以演绎出一番做人的道理，那就是：当你得意之日，休要猖狂，失意之时，也无须沮丧，只要好好善待你周围的每一个人，你就能把握许多奥妙莫测的人生机缘。

只是东生，早已浑忘了此事，还每每对那人网开一面。

那人天生好酒，常有酒后斗殴之事发生，一日酩酊大醉，误以为自己是一只壁虎类，不顾众人拦挡，跨出二楼窗外，做壁虎爬墙状，缘墙前行，奈何酒醉之人，浑身发软，结果自然是一个倒栽葱摔下楼去，惊得满楼道的人面无人色，此人却只是关节脱臼，接好之后，竟然毫毛不损，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

为此事，东生大为震怒，好歹算是没出事，否则人命关天，如何了得。为令其彻底痛改前非，故停职一年，以观后效，并扬言如果再酗酒，就给人事处打报告，让其去看大门。其人大骇，为珍重新闻事业，砥砺其志，禁酒不饮。

凡一年之久，东生见而怜之，竟网开一面，恢复其工作。

其人感戴之，酗酒恶习，至此绝矣。

东生为人，威严与宽厚，兼而有之。

东生对新闻记者的每一条新闻都不肯轻易放过，为求新求精求完美，东生变得像一只虎视眈眈不近人情的拦路虎，在工作上毫不通融，毫不留情面，时常对记者们采制来的各种“食物”，横挑鼻子竖挑眼，动辄发起虎威，或是虎吼几声或是连数落带批评，打回去重新回炉，重新制作，甚或干脆枪毙。

认真是东生工作和行事的原则，也是做人的根本，他绝不容许有任何一点粗制滥造的或是有损国民健康的“食物”，因失察失职而从他鼻子底下轻易漏网。

为此，几个新闻栏目，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记者，个个刻意上进，尽力求新求精，不敢有丝毫侥幸之心，送节目时，无不胆颤心凉，生怕让东生挑出毛病，一番数落打将回去，将偌大一番辛苦付之东流，还得丢好大一个面子。

笔者道听途说来的这一些细细碎碎的小事，一旦放在一起，便很能见出东生其人——一位年富力强、有个性、有人情味、严厉、正直、智商颇高、业务能力很强、有开拓精神、敢爱、敢恨、敢骂娘的有真性情的汉子的形象，就此矗立。

话说得似乎已经有点远，还是扯回来，说解振华局长与李东生的会面。

当年李鹏代表中国政府，参加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世界首脑级环保会议，负责新闻报道的领队，便是现在的李东生。

李东生副台长，对环保问题，不待多说，早已是十分的关注。

所以李东生听解振华局长说明来意，连一个哈哈也不打，当即就拍板表示支持。

在与各部门的负责人一起，讨论完所有的实质性问题后，李东生笑呵呵地望着解振华局长，意味深长地说：

解局长，有些话得说在头里，我们的记者有时候是很认真的，要是他们给你认真出一些事来，您这个当局长的到时可得给我们记者撑腰呀！

言外之意，不言而喻，等于是将了解振华局长一军。

解振华与李东生同属一辈人，自然心灵相通，一听就明白李副台长这番话的弦外之音，当即对李东生毫不含糊地表示说：在这个问题上你们电视台，尽可以放心的，万一真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一定给记者们撑腰！

说完两人会心一笑，握手如仪，各自回去，布置各自的行动事宜。

淮河行动，如千钧巨石，落到了实处，只等人上马，箭上弦，跃马开弓。

时至今日，“新闻 30 分”举凡参与淮河报道的记者们，只要一提起他们的淮河行动便嗷嗷叫，表现出异于常人的激动和不安的心情，这种心情是双重含义的，既为淮河行动而骄傲，又为淮河能否在 2000 年变清而忧虑，淮河行动给每一位参与者都留下了非同寻常的记忆，为撰写此书，笔者采访了所有参加行动的“新闻 30 分”的记者，绝大多数记者们，都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和忧虑的，笔者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事过许久，李风仍然感慨系之，对笔者说：如果没有解振华局长和李东生副台长会面，淮河报道只能是一纸空文，绝不会成什么气候。

这仍然是中国的国情，故此，笔者也以为然也。

驥尾小议：中国，关上地狱之门

大者如居里和他的夫人，打开了那个黑色铀石的潘朵拉的盒子，将一个被上帝之手镇锁于地下沉睡了数亿万年之久的放射性物质的魔鬼释放了出来，这个魔鬼既可以毫不费力地推动巨大的发电机组为人类造福，又可以化身为可怕的蘑菇烟云以光辐射冲击波和放射性尘埃轻而易举地重创人类甚至毁掉创造它役使它的主人。

科学技术一方面是为人类社会创造财富的最大生产力，一方面也是一把有损有益的双刃宝剑，如果运用不得当，对人类社会造成的伤害是致命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只是科学技术在无意中演绎出的一个最温柔的故事，用于战争的那些高科技手段，诸如热核武器、中子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激光武器等等，则可以轻而易举地在一个瞬间毁灭掉人类自己，这是人类利用高科技手段为自己特意制作出的一部与上帝的创世记恰恰相反的最凶险最疯狂最暴虐最刺激的影视作品。

在这部可忧可怖的影视作品中，也许开始出演的只是一个激情如火的政治演员和几个货真价实的国家人物，同时观摩的是全世界，最终毁灭的却是全人类。

科学技术富有了人类社会，同时也膨胀了人类的征服欲。

大者如居里和他的夫人，打开了那个黑色铀石的潘朵拉的盒子，将一个被上帝之手镇锁于地下沉睡了数亿万年之久的放射性物质的魔鬼释放了出来，这个魔鬼既可以毫不费力地推动巨大的发电机组为人类造福，又可以化身为可怕的蘑菇烟云以光辐射冲击波和放射性尘埃轻而易举地重创人类甚至毁掉创造它役使它的主人。

小者如淮河沿岸星罗棋布的小造纸厂，曾几何时，这样一门利用淮河两岸产麦区大量麦草制纸的技术，使淮河人从世代农耕走向了工业化，刚刚尝到了发财致富的甜头，却又在为自己创造财富的同时，不慎将废水废气和黑液这个黑色的魔鬼释放出来，污染了淮河流域 1.5 亿人赖以生存繁衍的河流和空间，他们为此而受到的致命伤害，远远超过他们既得利益的百倍以上。

诚然，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手段，可以使人类更加快捷有效地从地球中挖掘最后一窑造化的矿藏，从山川中砍伐最后一片原始的森林，从海洋中搜刮最后一尾自然的鱼虾，从土壤中收获最后一粒纯净的粮食，从地下榨取最后一滴没有污染的淡水。

遗憾的是地球上资源有限，而且不会像人类一样死而复生，成倍增加，所以不论我们人类在未来时予取予夺的手段将会如何高明，最终的结果恐怕是取无所取，夺无所夺，获无所获，一无所得，一无所有，智慧的人类假科技之手按照自己的心意重新创造和改变了上帝之手的造物，得之于萧何，失之于萧何，最终少不了要还造化一个公道。到那时，我们悔不当初的人类，惟一的出路，恐怕就只有结束人类这个智慧种群在地球上巧取豪夺的漫长生涯，走向自寻的那条必然的死路。

从古到今，世界各国，人类各族，之所以处心积虑地发展科学技术，其最终的目的，无非是想随心所欲地主宰地球，无所顾忌地奴役自然，更快地掠夺财富，殊不知高科技这个人类的专利，既是一双神奇的上帝之手，又是一把自毁的魔国之剑，既是一把开启天堂之扉的钥匙，又是两扇通向地狱之里的大门。

在浩瀚的宇宙间，地球惟有小小一颗，人类无非芸芸一群，没有上帝的保佑也没有救世主的帮助，人类惟有伸出神圣良知的援手以自救。世界别无选择，列国惟有一途，挥仁义以自警，慎用天堂之钥，举天下为己任，关上地狱之门。

走可持续发展之道路，当仁不让，义无反顾，1997——中国在行动。
奋起上帝之手，摧毁魔国之剑，铸人类经典，2000——世界大瞩目。
生死存亡，系于一念一发之间，何去何从何以抉择，全在人类自己。

